



風雨年代

友誼叢書之四

2002年抄

风雨年代简介

在二十世纪
拉越的风雨年
代，留下了无数
值得讴歌、怀
念的足迹。这
本书介绍了当
年的罢课斗争
、各省份的热
血青年要越界
到印尼去的多
篇令人难忘的
个人回顾，以
及重大历史事
件中大难者的
幸存者之感人
地泣鬼神的事迹
等等。篇篇感
人肺腑，值得一
读。

这些逐步被
人淡忘、模糊
的事迹，鲜为人
知。经人皆知
，皆被朋友人
们捕捉回来，
载入历史册。
这是向历史负
责任的，也为
这风雨年代留
下了宝贵的文
物。

风雨年代

《友谊丛书》之四



风雨年代

《友谊丛书》第四辑

当年罢课

- | | | |
|-----------------------|-------|-----|
| 开展古晋学运，胜利领导“3.30”罢课斗争 | …… 更生 | 1-3 |
| 纪念“3.30”学生斗争三十周年 | …… 求实 | 4-6 |
| 纪念“10.29”罢课斗争三十周年 | …… 求实 | 7-8 |

当年事件

- | | | |
|---------------------|--------|-------|
| 当年的连队起义 | …… 老温 | 9-10 |
| 黑暗的七十四天 | …… 赖子铨 | 11-27 |
| 巴都行记 | …… 赖子铨 | 28-43 |
| 略谈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战斗事迹 | …… 雪飞 | 44-47 |
| 青山事件 | …… 自立 | 48-52 |
| “斯里阿曼”行动后的北加人民游击队 | …… 广平 | 53-58 |

个人回顾

- | | | |
|------------|---------------|-------|
| 撼大地、泣鬼神的史迹 | …… 王麦柯 | 59-77 |
| 第四省同志上印尼边界 | …… 李南春口述 江泓整理 | 78-80 |

阎王殿前潇洒走一圈	力 争口述 梁娇芳执笔	81-84
拉让江第一次越界到印尼	余清勇口述 弘 杨整理	85-88
第一省最大批的一次去边界....	彭梦意口述 腾飞采访整理	89-93
我从死神旁边擦身而过	勤 思口述 展 翅整理	94-100
难圆的赴往中国之梦	利 民	101-104
一个小兵的追忆	新 江	105-117

转载

发扬六十年代精神	田绍熙口述 摘自《横眉集》	119-130
----------------	---------------	---------

人物介绍

传奇性的人物 - 布鲁诺·曼舍 (一).....	雁 飞	131-133
(二).....	向 忠	134-135
献身於交通战线的东兵同志 ...	前战友口述 求实整理	138-140
献身北加革命事业的民族英雄	许贵仁	141-147

编后话		148
-----	--	-----

封面是当年拉让江 1968 年上边区时的 NG.DAP 坡登岸码头旧址

当年罢课

开展古晋学运胜利领导“3.30”的罢课斗争

- 更生

“10.29”的古晋学生罢课斗争，是古晋也是砂拉越学运史上首次的群众斗争，其意义是重大的。但是，由于受到经验和理论水平的限制，领导者在斗争中没有能够提出正确和鲜明的斗争目标；在斗争的后期，更迷失了方向，致使斗争无限期拖延下去，而致陷于自流的状态。由于不懂得群众斗争的原理和方法，不能够使斗争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方针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清醒地、循序渐进地进行。由于不懂得密切联系和依靠学生群众的重要性，不能充分发动和联系学生群众，反而使自己在最后完全脱离了学生群众；由于不懂得争取学生家长、教师、校董以及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而使斗争在最后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等等。总之，由于存在着这一系列的缺点和错误，终于使英殖民主义者有机可乘，所以最后终于在英殖民地当局的干预镇压下，归于失败。

罢课斗争失败的结果是，学校的行政大权，全被英殖民主义当局的教育部官员接管。在教育官员的直接掌控下，学生们不但因此失去了各种合理的自由民主权利，而且还在各个方面受到了重重的束缚。与此同时，一部分的学生领袖则是被捕和被驱逐出境去中国了；另一部分则因为看不到前途，也主动提出申请去中国寻找个人的出路。留下来的学生，有者悲观失望、消极颓丧，从此不问政事；有者，因为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和恐吓，或者受到社会上落后与消极思想言论的影响，产生了恐敌和害怕斗争和逃避现实的思想。一般的学生家长，也因为受到教育部或学校当局的恐吓与压力，惟恐自己的子女会受到伤害或“不良”的影响，也开始对自己的子女们严加管制和约束。一时，整个学府内外，到处弥漫着的尽是一种安份守己、奉公守法、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以免惹事生非的消极情绪。只有极少数的人，还依然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能够继续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和斗

争。

面对着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的这种低潮时期的消极情况，文铭权和砂拉越解放同盟中央经过分析研究后，决定采取从学运入手，通过学生运动的发展带动社会运动发展的的工作方针。于是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从事古晋的学生群众工作上面。一方面展开批判逃避现实，和消极颓丧的思想斗争，和开展留下来，为祖国砂拉越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思想教育，从而为青年和学生们指明了自己的前途和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深入到学生群众中，积极进行团结、教育和组织的工作，培养干部。终于在他们的共同努力奋斗下，使古晋学生内部起了新的变化。一批热情肯干，积极向上，响应组织的号召，决心为砂拉越的革命而奋斗终生的新干部被培养起来了。更可喜的是，在工作发展的基础上，学生们也开始觉醒起来并展开斗争了。“3.30”的罢课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1955年“3.30”的古晋学生罢课斗争，在古晋的学生运动历史上的意义和作用重大的，在推动第一省乃至全砂拉越的革命形势发展方面的意义和作用也是重大的。

和“10.29”时的斗争不同，“3.30”的斗争因为有盟的组织 and 领导，所以，斗争的结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当时，盟是在自己的奋斗纲领与目标的指引下，总结和吸取了“10.29”斗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所以，在斗争发动之前，首先对形势作了充分的分析，对斗争的进程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妥善的计划。

“3.30”斗争的对象是英殖民主义当局及其在中中的代理人，校长黄中廛，斗争的直接目标和要求是解除黄中廛的中中校长职务，收回开除张本仁、王祚英和庄金明的学籍的成命，取消学校当局压制学生学术研究和健康活动的各种不合理的措施，答应改善教学法等等。斗争由始至终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方针，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充分注重发动和依靠学生群众的团结奋斗，注重争取家长、教师和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支

持。所以，終於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胜利，首先是使原来被开除学籍的学生代表张本仁、王祚英和庄金明恢复了学籍；也使学生关于改善教学法的合理要求，得到认同；更使殖民主义当局在中中的代理人黄中廛，被驱出中中，改由林郁初所取代。

这一胜利，也使到弥漫在校园内外的消极、颓丧及恐敌、害怕斗争的思想一扫而空，使大部分的学生因此都被积极动员起来，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到各种不同内容形式的健康进步的集体生活或活动中去。

这一胜利，更培养出了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新干部，为我们继续开展学生运动，以及开展其他领域的社会运动，如工运、农运和民族工作等等，准备了干部的条件。

“3.30”的罢课斗争，是对新成立的盟中央的第一重大的革命实践与考验，在砂盟斗争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组织和领导“3.30”的罢课斗争，砂盟第一次在学生群众，从而也在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人民群众中崭露头角，显示了自己的正确性和生命力、战斗力，并为自己在以后的砂拉越革命斗争中取得领导权或主导权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3.30”罢课斗争的胜利，是砂盟领导砂拉越人民革命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正因为有砂盟的正确组织和领导，“3.30”的罢课斗争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盟的领导作用，对该次学生斗争的胜利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但是，盟在领导该次的罢课斗争中，主要的作用只是发挥在决策的方面，在具体和实践方面，仍得依靠作为实际斗争的学生代表们的表现。故此，当时已是盟中央委员，又是学生领袖和代表的黄纪作，就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纪作的才智、能言善辩的能力，是学生代表在同校方乃至教育部、校董部等方面的斗争中，所以能够坚强有力并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黄纪作本人后来在革命人民中曾享有的威望，也正是通过历次的学生斗争，以及后来的其他斗争实践之后才得以逐步建立起来的。

纪念“3.30”学生斗争30周年

(1985年3月30日)

- 求实

“3.30”学生斗争是“10.29”斗争的继续。“10.29”斗争失败之后，一部分坚持斗争的学生更怀恨反动当局，他们总结了这次的斗争，更坚定更明确斗争的方向，并决心将学生斗争和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在这种斗争的要求下，砂拉越解放同盟于1954年3月20日正式成立。它成立之后，就更有计划更有步骤的领导和推动古晋中华中学的学生斗争和革命斗争。

“3.30”斗争爆发前夕的国内外形势，还是很有利于学生斗争的。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壮大，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斗争仍然处于高潮。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政治局面和星马工农学运的斗争也仍然给我们很大的斗争启发和鼓舞。再加以学生们对英帝反动派和反动教师的压制更感到不满。香港教师，由于为人和教学问题，所以他们的威信是低落的。在这种形势下，重新掀起学生斗争是可能的。於是盟为此积极的进行了各种工作：它在学生中吸收了盟员，以盟员为骨干，组织了大量的积极分子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经常开展反英和反对反动教师的宣传，批判害怕斗争的思想；斗争爆发前几天，黄纪作还在七哩飞机场附近一个农家，召开全校积极分子会议，对开展斗争进行了最后的动员。这为“3.30”斗争准备了必须的盟的干部条件和思想条件，并为斗争创设了胜利的基础。

罢课前夕，当时古晋中华中学初中二年级下乙班的学生，对几何教师蔡永棋的教学法很不满，屡次向学校当局提出改善教学法或撤换教师的要求。但都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反而下令开除该班学生代表张本仁和王祚英。于是该班全体学生被迫于1955年3月某日到学校办公厅前面广场大树下静坐抗议。消息传开后，由高中生黄纪作召集全校各班代表开会，选

出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为代表，向校董会和学校当局提出学生的要求。在罢课爆发之前夕，初中二下乙的全体学生还曾排队到校董会办事处请愿。校董和学校当局，不但没有接受学生的要求，反而宣布开除黄纪作、叶存厚、陈胜新等全校学生代表，以致一场无可避免的学生大罢课被迫于3月30日正式爆发了。全校近千名学生的绝大部分都参加了罢课斗争。罢课期间，罢课学生坚持在同学家里上课，由高班教低班，不但讲解学校课本，也有上政治课，有的还结合开展文娱活动。罢课学生经常组织队伍下乡宣传，还组织男女篮球队参加公开篮球赛，男女的球艺都表现出色，更好的提高了罢课学生在群众中的威信。罢课期间，分两条线指导：一条是公开的，以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负责联络校董会和争取社会人士；一条是秘密的，以杨柱中、陈金美、洪楚廷和蔡珠娥为成员，专门负责对各班学生的团结工作。罢课期间，教师也实行罢教，罢教后还成群结队去石角观光，更激起社会人士的不满。罢课经过了长期（约3个月）的坚持，结果校董会和学校当局被迫接受罢课学生的要求：校长黄中廬被解职，全体学生无条件复课，斗争得到全面的胜利结束。

学生们终于兴高采烈的回到学校上课，革命气氛空前高涨，反动气焰被压下去。盟为了更好地组织、教育罢课斗争所涌现出的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宣布成立砂拉越先进青年会，并把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吸收入会，进行有计划的教育——於是掀起了学习和改造的新高潮。在这时，全校的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不同形式的各种学习小组，进步势力对全校是起了支配的作用。在这同时，还有各种公开组织（文艺研究组、合唱团、各种乐器组织）也得到自由的活动，并团结了好大的一部份学生。总之，秘密和公开活动都有力的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3.30”的斗争具有很大的作用和影响：（一）有力的打击了反动的气焰，大大的提高了学生在群众中的威信。（二）广泛动员了学生和提高了他们的革命觉悟。（三）争取到一定的公开活动自由，主要是文娱的活动自由。（四）更好

地维护了华文教育。（五）推动了砂拉越各主要华文中学的学生斗争。（六）大大的促进了革命的巩固和发展。（七）为以后的工农学、政党、民族工作和武装斗争准备了干部条件。斗争的成绩的确是辉煌的。

没有吸收“10.29”斗争的失败经验，就没有“3.30”斗争的大胜利。此外，“3.30”斗争能够取得辉煌的成绩，主要原因是：（一）有利的国内外斗争形势，使到广大学生们敢于起来斗争，也容易得到校董、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同情支持；（二）盟的正确领导，主要的表现是盟的政策能符合学生的要求和注重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纪念“10.29”罢课斗争三十周年

- 求实

(1981年10月29日)

“10.29”学生罢课斗争已过去三十年了，它是北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从此北加革命就踏入了新的阶段。这是北加革命新的一个大突破。

“10.29”学生斗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非拉反帝反殖斗争，尤其是在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和星马人民斗争的鼓舞下爆发的。也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爆发的北加学生反帝反殖的斗争。

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的国内外形势有力的冲击下，砂拉越古晋中华中学学生的反帝反殖意识呈现高涨；他们通过学生会出版刊物，开展革命文娱活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但是他们的这种革命和健康的活动，却遭到当时英帝的代理人张俊校长的干涉和压制，於是导致学生的不满和反抗。在无可容忍的情况下，于1951年10月29日，当时的一群中学生代表进入校长室，对校长反革命反进步行为表示不满和抗议，并和校长开展剧烈的辩论。在争辩进入剧烈紧张的时刻，校长通知英帝警察来校干涉，并用催泪弹驱散学生。于是一场反帝反殖反对不合理教育制度和争取自由民主的学生罢课斗争正式爆发了。这是北加新民主革命的第一响春雷，也是北加革命新的里程碑。

在罢课期间，学生积极参加当时校外的古晋青年社活动，并积极下乡宣传，走向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罢课期间，英帝提控学生代表并给予定罪，引起学生和社会人士的关注和不满。判罪之后，学生代表蔡高文，为了交付反动派对他罚款的奔走中因车祸而遭受不幸。广大学生和部份左派教师，为了表示对蔡高文的敬仰与悲痛，也为了抗议不仁道的反动派，他们悲痛地参加了出殡行列。在送殡的过程中，他们组成

一列长形的队伍，队伍前头高举蔡高文遗相，手拿花圈和挽联，手臂挂黑纱，肃然哀痛，正气凛然，气势非凡。

反动当局为了结束长期坚持的紧张斗争，施予种种阴谋诡计无法凑效之后，最后派出教育官徐耀东出任中中校长，实行重新入学登记的手法，造成学生分裂；有的回校重新登记而继续就读，有的拒绝重新登记因此失学或到中国去继续深造。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罢课斗争，就此宣告失败。

“10.29”学生斗争，最后失败了，但它的斗争意义仍然是不小的。它第一次有组织有规模的宣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学生和工农中宣传了反帝反殖和争取自由民主的思想，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和广泛的提高了人民的革命思想觉悟，它为学生和人民树立了敢于斗争的光辉榜样，并培养和锻炼了一定量的革命干部。它还带动了砂拉越各个华文中学的学生斗争的广泛开展，更为“3.30”斗争累积了成功的经验。

“10.29”学生斗争的失败，主要是由于轻敌，不够实事求是制订正确的斗争策略。犯了不够重视争取广大学生、家长、教师、校董和社会人士同情支持的过左错误，以致脱离群众的多数而孤立。还有，当时学生们还缺乏明确坚定的为砂拉越的独立解放斗争的思想，不少还以侨居身份帮助当地人民革命的思想参加斗争，这也会使他们在斗争上缺乏长远之计，容易犯上“左”的错误。因此，斗争遭受失败之后，又出现害怕斗争的思想，为以后斗争增加了阻力。同时斗争失败之后，造成大批先进份子纷纷到中国去和大批革命干部的流失。不能不是北加革命史上的一个大损失。

“10.29”学生斗争的反帝反殖和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内容是正确的，但还不够自觉为争取北加独立解放而斗争。学生们是敢于斗争的，但还不够善于斗争，不够自觉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它的斗争是失败了，但是它的斗争意义和影响还是很大的和很深远的，它的历史功绩也将是永不磨灭的。

当年事件

当年的连队起义

—老温

自 1963 年初越界后，我们参加了北加里曼丹国民军（TNKU, Tentera Nasional Kalimantan Utara）。1965 年“9.30”事件后，为了坚持统战和延缓统战的破裂，同志们都还坚持留在连队内，等待进一步指示。

随着印尼国内反共浪潮的升温，在连队内的气氛也日益紧张。为了继续革命，同志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积极作好起义的准备。如积极争取我们二十多位同志不被分散，尽量集中住在一起或附近；时刻注意印尼局势和连队的变化；主动将好的武器（如中型机枪，迫击炮等）掌护在我们手中，将有毛病的枪支机件偷换好；多搞弹药和装备；多和 PARAKU（北加人民军）三支队联络和熟悉路程；先把一些物资运回部队等等。

“9.30”事件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从某些阴险的连队印尼领导人的活动中，以及印尼国内反动政权的逐步稳固，我们分析认为，在印尼国庆之后很可能把我们调回 Sintang（军分区）集中，再将我们缴械后送回给砂拉越政府，同时对我们北加部队发动进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继续斗争，当时连队的负责人（杨会强、郑春喜）决定于 1966 年 8 月 17 日（即印尼国庆日）夜起义。为了部队的配合和到时轻装行动，我们派当时生病的范国强（吴铁）先回部队与总部领导联系，同时又派朱利金於 16 日清晨去第二连队联络那里的负责人安排同时起义，返回 PARAKU 第二支队。

8 月 17 日半夜，连队内的杨会强、郑春喜、江华（老班长），李汉文、赖锦明、苏利亚、吴华松（德兴）、叶厅青（鲁恩）、温尤金、刘伟雄、徐锦木、天善、温丙丁等二十多位开始行动。

起义的那个晚上，我们同住的长屋伊班群众还在叽哩呱啦的谈笑作乐，迟迟还不睡觉。我们都感焦急，后来我们表示疲倦要睡了，大家都挂起蚊帐，躲在蚊帐里，精神抖擞，耳听四方动静，兴奋又紧张地等待午夜十二点的到来。我们身上都穿了好几套衣服，军包里装着重重的军用品等，手握的枪支也在较早时，被偷偷换上较好的零件了……。午夜十二时，我们准时轻悄悄地离开连队。

据说天亮后，印军发觉我们失踪，赶紧整队追踪我们。而我们经过十多个小时急行军和绕过印尼兵营地后，于 18 日中午胜利抵达三支。二连全体同志也同时胜利回到二支。至此，我们和印尼的统战工作完全破裂，和印尼联合组成的连队也到此结束。起义时，所有枪支、弹药能拿的都拿走，包括迫击炮 2 门和 MK II 中型机关枪 2 支等。

黑暗的七十四天

— 记七十四天二十四小时戒严

赖子铨

1970年初，拉让江流域成立了下游武工队，其属下的第一、二、三、四军分区也积极相继展开了武装斗争。

第四军分区，四面是水，东边是伊干江，西边是拉让江，南边是伊干江与拉让江的接头，北方是波澜壮阔的南中国海。它像一个孤岛，在军事上虽不是什么战略要地，但在政治上影响不小。它接近诗巫市区，当地群众包括木桂兰、白花河、王士来、上坡南明厂、英基罗、宋溪美禄和德洛邦河的华族群众觉悟高，不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人联党的反帝反殖时期，都有很好的表现。因此，当局早已蓄意在此找个突破口，从点带面，对下游武装斗争进行一次彻底剿灭。

（一）戒严的前奏

1970年7月，政府在拉让江流域展开了“户口调查”，以图阻吓群众藏匿陌生人（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阻扰家庭成员离家出走（参加北加人民军和地下活动）。当时，拉让江下游武装工作队宣委黄理生，刚好一段时间留驻宋溪美禄地带，他联合第四军分区领导黄招发，先后在油菜岛、福民路等地召开较大型的群众集会，及时揭发了“户口调查”的实质，呼吁人民团结起来，不与有关工作人员合作，并藉此宣传革命真理。这种集会影响很大，风声已有泄漏，因此四处张目的敌特已在该区更加秘密频频活动。

1970年8月中，该区的一位民运工作的重要女干部新峰，因患胃病，在两位先进积极分子掩护下，乘坐电单车到诗巫市就医。可是他们的行踪暴露，约午时十二点在返回途中，经光

民码头被捕。被捕者尚有电单车骑士林某。新锋被捕后，经不起考验而放弃革命斗争。于是政府开始出动野战部队到该区活动。

8月20日，油菜岛园芭边的一个临时住点，住有黄理生的交通员江采辉、刘华荣和张宫女。约于早上九时许，江采辉和刘华荣有事到群众家，临时住点却被敌军突击。当时点内的张宫女听到稀里哗啦的声响时，敌军已是很近了。敌军猛烈的枪声和呐喊声，使她来不及拿走重要文件（包括黄理生的信件），匆忙地向后山撤退。

敌军依据坡中敌特的情报及叛徒的口供，加上缴获的重要文件，已经肯定当地隐藏着重要共产党领导人，而且断定第四军分区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下武装斗争的指挥总站。当时三省政治部警监林XX，黄德峰等为了立功领赏，大力主张派大军镇压。于是密谋已久的军事行动，便迅速展开。8月22日早上七时开始，广播电台宣布24小时戒严令。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终于揭开了。

（二）第四军分区的组织结构

1970年第四军分区民运组武装斗争单位包括（1）宋溪美禄、德洛邦河民运组。此民运组本分为宋溪美禄民运组和德洛邦河民运组。德洛邦河民运组组长是芳，组员有向英、成希、成平、铁英、新兵一位。还有用雨布隔离不准见面的丹莉、方红和五号三位其他单位来的同志。卫生员丹莉（蔡锦香）体弱多病，由边区转到诗巫下游医病并暂居德洛邦河民运组，想趁修养期间，辅导华区卫生工作。而方红与5号（张宫女）便是因学医而暂住在该区。宋溪美禄民运组组长是我，组员有成亮、王美莉、新毅等

。后因宋溪美禄、德洛邦河负责人新峰被捕，黄理生领导机关和特工队转移。领导上对宋溪美禄民运组与德洛邦河民运组进行重整委派我统一指挥宋溪美禄、德洛邦河民运组。（2）英基罗、达山民运组。组长是战明，组员是新华、向红、明红、老弟（女新兵）、细弟（男新兵）、伯父（黄增安）。（3）王士来下坡

民运组。组长是大姐（詹雪娇），组员有忠东、铁兵、红灵、向党（詹赛琼）、老粗。（4）白花河民运组。组长是红姐，组员是新群（吴珍香）、坚（黄华道）、永革、先峰。（5）木桂兰罗马安民运组。组长是红兵，组员有李玉和、刘胡兰、求平、刚铁、坚兵和野人。（6）黄招发队长领导的东方红特工队。队员有八哥、立新、大胜（杨省智）、大嫂、黄文仁等。（7）黄理生宣委警卫组，主要成员是阿刚、黄育开等。

从整个来讲，同志们的武器配备极为落后。黄理生警卫组武器会较好些，东方红特工队队长拥有一支史登枪，其他全部是自制的水龙管枪。猎枪子弹陈旧，很多都打不响。

民运组女同志和新兵居多，即使是组长或老组员，也仅参军不过半年多。他们具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理论知识，但缺乏军事训练和临场对敌战斗的应变知识和经验。大部分同志连枪声都没有听过，更毋需讲打战。从军事角度上讲，他们的武器根本无法与拥有先进机关枪、大炮、直升机等比，也不能跟训练有素的敌军相比。加上长期以来，搞地下工作，工作讲究严密，还未冲破组与组的直接联系以及坡与坡地形的熟悉，造成各民运组只能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活动。因此，面对强大敌人大规模军事行动，便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

然而，就是这样的革命战士，我们凭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和崇高的革命信念，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顶住了二个多月的苦难日子，忍受饥饿与疾病的折磨，冲破层层包围，勇往直前，最后取得反“围剿”胜利。

（三）戒严范围和戒严期间各民运小组概况

据报导，警方发言人自 1970 年 8 月 22 日上午七时开始，已在诗巫县区下述地区，实施 24 小时戒严。受影响的地区是：起自宋溪加英与伊干江左岸交叉点，向西伸延三哩，再向南伸延 5 哩直至宋溪兰与拉让江右岸交叉点，随后沿拉让江右岸直至拉让江与伊干江交叉，再转向沿伊干江左岸至起点。上述戒严

地区包括：木桂兰、白花河、丹章王士来、上坡、南闽厂、英基罗、宋溪美禄、德洛邦河。

戒严区刚好把各民运小组层层包围中，以下概述各民运小组状况。

宋溪美禄、德洛邦河民运组

为了打击政府的“户口调查”，我跟成亮於 1970 年 8 月 22 日，在宋溪美禄福民路、合作社等地张贴标语。傍晚五时许，从群众口中得知，大批政府兵已向福民路、鼎新路等后山进驻。沿途用扩音机大声宣布 24 小时戒严令，同时，砂拉越广播电台也不断地连续地宣布第四军分区已进入 24 小时戒严。

23 日，由于情况已较为严重，领导上委派我和成亮集中德洛邦河民运组，并由我负责统一指挥对敌斗争方案，其余宋溪美禄民运组随领导机关转移。

德洛邦河民运组营地座落在鼎新小学后山的橡胶园中，它离旧住点仅有十分钟左右路程，新峰被捕前住在该处。虽然四周有茂密的橡胶树和草，但因地处低芭，加上雨天，一条因长期跑动而留有痕迹的烂芭路直通外面保干群众家。

24 日晨，一股政府兵有计划向这里搜索。终于在早上八点半发现了这条芭路并跟踪到新住点，驳火终于发生了。

当时住点内的战斗力较弱。芳组长和向英搞群众工作未回，成平、铁英出去保干群众家中了解情况未回，而卫生员丹莉、张宫女、方红等还用雨布隔离不准与其他同志见面，我和成亮赶到该民运组，还来不及召集大家开会商讨，敌兵已搜索到。因此驳火后，队伍很乱。

在撤退中分成三组。先说 A 组成平和铁英，他们当时还在群众家后门的胶芭里，听到枪声后，便向住点方向跑，远远还看见一个敌兵正举枪向住点方向扫射。他们由于经验不足，怕开枪伤到点内自己同志而没有向敌军背后开枪，便主动撤到福民路

菜园芭，隐蔽起来。B组的芳组长与向英在木杰而姑坡工作，来不及赶回，住点已经驳火，她们只好就地隐藏起来。在群众们的保护下，安全无恙，直至戒严令解除，才又回组织。C组是在与敌军正面驳火。成亮同志是第一位发现敌军，并高喊“兵来了！”。同一时间敌军便向我方开枪。成亮同志颈项被榴弹击伤，弹片还夹在皮肉里，半路与黄德惠同志相遇，一起撤到福民路与A组同志集合。

住点内另外四位同志，即我、蔡丹莉、张宫女、方红，驳火后互相鼓励，撤到福民路后段。在沿途中发现多条敌军刚刚跑过的路，并在一处还听到敌军向我们喊话：“Siapa？”在对方还不肯定目标时，我们已巧妙转移。根据这些情况分析，我们尚在包围圈之内，必须迅速突围。大家商讨后，决定转到后山的大森林中，因为那里存有粮食而且回旋余地广阔。25日清晨，大家小心翼翼继续行进。前面是一片又一片的子青芭，前进速度很慢，灭迹工作很困难。约于早上九点左右，当走到一片钩藤芭时，后卫同志就发现有追兵跟踪而来。另一场驳火终于又发生了。这里地形非常不利于战斗，眼前没有一棵大树可以做为掩蔽。在这种危急关头，后卫蔡丹莉和张宫女同志发扬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手持水龙管枪，英勇还击敌人，把追敌拖住。敌军组织了更强大的火力，一轮又一轮向她们扫射。前面的成安与方红同志终于安全撤离危险区。然而丹莉和宫女两个同志却英勇牺牲了。

26日，我撤到福民岛菜园芭并与A组同志结合。

A组同志撤到福民路时，凭着狗的吠声和整夜洋灰路兵鞋的咩咩声，可以肯定敌军已涌向后山的大森林了。此时此刻，最安全的地带已是危险区，而最危险的地区可能是最安全的了，于是大家都隐藏在光秃秃的菜园芭里。

福民岛的菜园地，全处低芭，眼前看不见一棵大树。菜畦与菜畦的中间留有一片杂草，有些地方菜畦荒芜，约有30尺左右宽阔。这些草本是种菜人遮幼苗用的，然而当时就是因为有这些草丛，才使我们白天晚上有躲藏之所。敌军也万万没有想到，

这样的地方竟会躲着许多共产党人。

经过几天对情况的观察与分析，江边已没有什么兵了，大股兵都涌向后山大森林了。这是突围戒严区的好时机，商议后决定先后分二组，各自借用江边群众的小船，划至预定的目的地，然后化整为零，分散隐藏起来，待平静后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26日晚深夜十一点许，成亮带着黄德惠和一位男新兵，划着小舟至刘钦候医院附近时，被一艘顺水而流的巡逻战舰怀疑。在照明弹的照耀下，成亮与男新兵跳水拒捕，黄德惠不识水性当场被水警捉住。二位同志跳水成功游至岸上。在黑暗中成亮跑到马来甘榜（甘榜依礼）时，被一群反动马来人追击，不幸受伤被捕。另一位同志冲出他们的追击，摸黑跑到甘榜南甲的监牢，糊里糊涂的爬上铁丝网，然后跳进监牢。狱卒在半醒半梦中模糊看见有人爬进来，向他开了一枪。这枪声惊醒了他，也使他产生更大的勇气，又重新爬出篱笆，成功来到华侨路后段，夜宿一棵树上，看着兵车在大路上飞驰。26日清晨5点许，一切恢复平静，他才安然转移。

27日深夜十二点多，我、成平、铁英等在同一地点，划着小舟，于凌晨四点多，安全抵达哥乐多。这些同志几经周折，有的在诗巫市，有的转至民丹莪、泗里街，最后通过公开战线与哥乐多同志取得联络，又倒回部队。

1970年9月3日，在各方压力下，宋溪美禄等地戒严令终于放宽三天，时间是从早上八时至下午二时，许多青年趁机从农村跑到城市，甚至避到远方谋生。

1970年10月16日，为了有效打击、消灭共产党，政府当局在宋溪美禄光民中学召开了群众大会。伪组织第四区维治协防理事会代表们在大会上代表民众说了许多效忠政府的话。砂罗越首长耶谷最后在会上当场宣布宋溪美禄、德洛邦河、木杰而姑改为宵禁。三个坡为期56天的24小时戒严改为12小时宵禁。

宋溪达山、英基罗民运组

当宣布 24 小时戒严时，同志们住达山坡超群路后面橡胶芭里。当时组内有二位刚参军才十多天的新同志、四个女同志、一个老同志，战斗力比较弱。战明组长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按兵不动，敌动我不动，我之目标小，不易暴露，比较有利保存自己，而且有足够一个多月的粮食应急这场反“围剿”斗争。

半个多月来，坡中除了大路有敌军例常巡逻外，住点附近并没有发现可疑点。反“围剿”斗争初期，与组织同志们联系不上，各自为战，大家心里都较紧张些。为了平衡生活，大家都很努力学习，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革命老前辈黄增安同志经常找同志们谈心，鼓励年青的同志要坚持斗争。他常说：“既已穿上军装，就永远不要再脱下来，要不怕牺牲，勇于斗争！”这些对同志们启发很大。

1970 年 9 月初，政府军加紧对华区和江边一带重点“围剿”，同时也加强了政治进攻和心理战。光华中学变成当局心理战的中心。有嫌疑的群众都被带到此地受盘问和恐吓，有的被迫签下“悔过书”。

1970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政府当局宣布放宽三日。民运组决定转移到王士来江边扎营。王士来江边是战明同志从小长大的地方，那里的一草一木，他都非常熟悉，于是很快便找到一个理想的住点，并到曼艮船买到很多粮食。这里的群众看见同志们的到来，一方面紧张、害怕；另一方面却很高兴，有的杀鸡煮蛋给同志们。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然而在 1970 年 10 月 17 日的一天，约于早上九点左右，在住点后放哨的立志同志突然听到树枝“咔嚓”的声响，举目一看，发现两个敌军持枪弯腰向住点厕所后面摸来，她立即拉响警报，并撤回住点。

且说，黄增安同志在驳火前一刻，他是去如厕，听到警号声，他也撤回住点，立志喊话叫他一起撤退。但他坚持要留下打阻击，挥手叫同志们先撤。当时他身穿蓝短裤，赤着上身，手持短枪就地伏在一棵大树边，两眼紧盯着前方。突然，他看到一个敌军官，挥着手枪就要走到他跟前。“砰！”他扣动板机，一粒子弹便把他解决了。一场激战终于爆发。我们的老同志黄增安同志在对方密集枪炮扫射下，英勇牺牲了。

再说，立志等同志撤到另一头岗哨（当时战明在此放哨），稍等片刻，还不见黄增安跟来，心里都很焦急。接着就听到猎枪声响、敌军的机枪相继呼啸而过，枪声、呐喊声连成一片。同志们只好撤退。

同志们沿着前面胶芭、板路跑了一段，便向王士来路方向撤退。由于草很长，痕迹很大，撤退速度慢，敌军的增援部队，随后跟踪而来，枪声不断。当接近王士来路时，恰好两边是割胶芭，同志们迅速越过，终于甩开敌军，向北撤到下坡江边。当时天已暗，个个都很疲倦了。但仍坚持连夜摸到一户人家，知悉附近没有敌军，就在后芭住了两天。

由于驳火，敌军逐渐增援，再在此地久留，将会是很危险的。于是决定向东南方向转去白花河后山。10月20日傍晚六时许来到“六哥”家时，狗汪汪对我们吠起来，这可惊动了附近的敌军，他们立即派兵过来侦察，还好我军机警，立刻从后路撤走。大批敌军闻讯赶来，进行搜索，由于没发现什么，一方面天已昏暗，敌军又倒回去。

由于情况紧急，同志们只好调整方向，向西北走。当时夜已深，万籁俱静，同志们赤脚摸黑，一个同志拉着一个同志向前走，互相鼓励，互相照顾，直至凌晨五点，来到恒恒山仑。当时此座山头住有一股兵，放哨敌军听见我们“唏哩沙拉”的过来，不但不开枪，反而向后跑，可能是害怕抑或是去通风报信。这给我们赢得了时间，立刻转向山脚，消失在茫茫树胶园里。

为了避免敌军天亮后进一步搜索，只好又撤回王士来驳火点附近。因为邻近全是割胶芭，跑动方便，容易灭迹。一天，当他们准备小心越过一条小河时，却惊动了一窝蜜蜂，密密麻麻的蜜蜂嗡嗡地铺天盖地而来，逢人便蜇，真是“祸不单行”。一路千辛万苦，终于从江边绕了个大弯，从天罗地网的漏洞中越过超群路，又回宋溪达山。几经转折，终于在白花河中段橡胶园中，静静潜伏下来。

基于驳火，敌在英基罗、白花河等地的24小时戒严便继续展延。然而共产党就像雾水一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1月4日，耶谷在光华中学举行的群众集会上，不得不宣布白

天戒严解除，空前的 74 天 24 小时戒严令终于解除！

宋溪达山、英基罗民运组的同志们，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考验是比较大的，吃的苦头也比较多。驳火后要撤夜行军，寒饥交迫，全身发抖，四肢无力，仍然是坚持再坚持。下雨了，大家只能在大树下避雨，衣服湿了没有得换，晚上只能躺在树根上或睡在草地上。初时，粮食缺乏，每天每餐一汤匙干粮，很多同志因此便秘。干粮完了，每天分一汤匙的糖，补充精力。不久后在群众家捐到一珍马尼饼，每人每餐分几块泡水吃，有的因肠胃不适，一直泻肚。这种生活虽苦，但同志们都把它当作一种磨炼、一种考验。

下坡、王士来民运组

戒严初期，他们住在王士来坡后芭中，由于长期在该地活动，恐怕有所暴露，同志们就转移到下坡树胶芭里。下坡地势低，前面是拉让江，后面是超群路。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他们依靠少数保干群众。为了准备更长期的反“围剿”斗争，同志们省吃俭用，当粮食不够时，同志们几次摸到江边群众的香蕉园砍香蕉芯和生香蕉补充粮食。

从白天和夜间狗的不断吠声，可以断定当地驻扎着相当数量的敌军。时间一久，同志们的活动，难免也留下一些痕迹，引起了敌军的注意。9 月尾，政府当局在当地增加兵力，向这里树胶芭周围层层包围。敌军的地毯式扫荡也在该区展开了。

1970 年 10 月初，同志们都静悄悄地留在营地，主动加强四周的注意力，并严格控制声响。终于早上十点多，突然一股敌军迎面向住点方向而来，噼噼啪啪的断枝声、砍树声，不时还夹着口哨声和呐喊声。由于战斗力弱，同志们不想与敌军正面冲突，于是大家一致决定放弃住点，主动向后山撤退。当敌军发现民运组的营寨，同志们已消失在另一片林海中。

在转移的路程中，同志们越过了数条敌军刚跑过的路，泥水还是湿漉漉的，树根的胶汁还在流。由于下坡地形不好，回旋余地小，若不及时突出，将成为瓮中捉鳖之危。在这危急关头，患难见真情，

全体民运组同志齐心协力，互相鼓励，几经波折，终于安全抵达木桂兰与东方红特工队结合。

白花河民运组

当砂拉越播电台传来戒严的消息时，白花河民运组的四位同志是潜伏在白花河大同学校后面胶芭中。到了九月，情况起了变化，大批敌军开始进芭搜索。九月中，民运组住点被搜索到。由于敌军警惕性很差，他们老远的呼喊声、口哨声和砍树声，仿佛在告诉你，“我来了”。因此住点同志早已做好应战准备。眼看住点已保不住，只好主动撤离，直奔白花河后山，恰好联络上东方红特工队同志。

东方红特工队

东方红特工队是 1970 年第四军分区应时势要求而成立的一支较强的队伍，队长是黄招发。特工队负责对各民运组的联系统一工作，更负责对敌军事斗争，是一支机动队伍。戒严开始，他们从宋溪美禄后山护送黄理生宣委转移至木桂兰，便返回白花河后芭住了一段时间。

由于 24 小时戒严，各地通讯全部中断，各民运组也失去联系，大家孤军作战。此种复杂局面，特工队又与黄理生宣委在 24 甲见面，商讨统一反“围剿”斗争策略。为了联系各民运组和进一步了解情况，特工队奉命又转回白花河、王士来和宋溪美禄一带活动。结果于九月中，恰好联系到白花河民运组同志。

由于敌军主攻重点是在宋溪美禄后山，实际上也是英基罗、白花河和王士来的后山。因此特工队到白花河时，是敌军活动最猖獗时期，大家只好与敌军展开“捉迷藏游戏”。

10 月中，特工队在王士来的住点被搜索到，双方没有开枪。我方主动转移至上木桂兰后山。当天就得悉，敌军也大举在该地进兵。为了避敌锋芒，特工队就转移到下木桂兰后山住下，静观其变。10 月下旬，24 甲警卫队兼民运组、下坡、王士来民运组也相继来到此地——老爸住点，直至反“围剿”斗争结束。

木桂兰、罗马安民运组与黄理生警卫组

黄理生一来到木桂兰、罗马安民运组，就进行了组织内部调整，成立统一指挥、统一工作的整体。戒严初期，他们住在 24 甲地区。10 月下旬，住点附近发现敌军活动。为了领导机关的安全，也为了方便工作，他们就转移到下木桂兰后山“老爸住点”，与特工队等结合。

木桂兰、24 甲等地是砂华党林鹏祥兄弟的地盘。他们经营的公泰板厂也名噪一时。第四军分区戒严，当地也曾进兵巡逻。这位赫赫有名的资本家为了板厂能继续开工，他公然向政府保证：该区民众都是板厂工人，是自己人，共产党根本无法生存，因此戒严无此必要。因此工人白天照常上班做工，农民照常下地劳动，共产党人也正常进行活动，民运组同志还狩猎野味，慰劳各地而来的战友。

政府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布下的天罗地网，却出现了一个这么大的漏洞，成为共产党人的“避风港”。当地同志乘机团结群众，并吸收多位新兵，派往别区和加强民运工作。他们为开辟新的领导机关交通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敌之军事“围剿”和政治进攻

初期，敌军在叛徒提供的情报，重点“围剿”在宋溪美禄后山一带，“8.25”事件，蔡丹利、张宫女牺牲更迷惑了敌军，以为共产主力是藏在宋溪美禄后山一片大森林里。这也是各民运组初期都能在华族群众聚居的地方得以平安无事。

据悉，数以千计的敌军，昼夜不停向后山涌进，然而共军却不在那里。

9 月初，敌之军事顾问专家改变战术，从后山大森林转向江边群众区，划分几个重点行动区采取地毯式的扫荡，妄图消灭我军。如宋溪美禄江边区，敌军将福民路、鼎新路和福民鼎新横路，四方紧紧包围，大路旁每隔一棵至二棵橡胶树都站一个，以防突围的共军。在包围圈内进行梳头般搜索，穿来插去，纵横交叉，并高声呐

喊：“你们被包围了，快快出来投降！”

敌军改变战术，在华区产生了一些效果，这造成了宋溪达山民运组黄增安同志的牺牲，王士来民运组、白花河民运组等住点的暴露和东方红特工队的遇险。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敌军也加紧对广大群众的镇压。很多革命群众、年轻人等被捕，有些监禁在诗巫的“京林乐”，有的则被押到古晋的集中营。

政治进攻与心理战并配合军事行动，也是他们惯用的。召开群众集会和组织民间团体进行反共宣传，以达到反共灭共的目的。

群众集会有召开两次：一次在光民中学，一次在光华中学。

1970年10月16日，由地方头人召集在宋溪美禄光民中学召开群众大会，参加的是宋溪美禄、德洛邦河，木杰而姑坡民，人数约有三千余人。

1970年11月4日，光华中学也召开了类似的群众大会。出席者约二千名，是英基罗、达山、宋溪沙迪、下坡、白花河、木桂兰上半段的坡民。大会通过“群众大会八项誓约”效忠政府，反对共产党。最后由首长耶谷当场宣布放宽戒严令，改为夜间宵禁。74天24小时戒严令终于全部结束。

（五）敌方成立反共组织“维治协防理事会”

1970年10月初，宋溪美禄、德洛邦河、和木杰而姑成立了第四军维治协防理事会。随后相继在英基罗、宋溪沙迪、宋溪达山、下坡、白花河和木桂兰上半段成立第五、六、七、八区维治协防理事会。

理事会负责所属范围的各坡负责人，各坡约每十家一组，由组长负责。如第四区的福民路有14组，鼎新路10组，光民路5组，荣光路8组，油菜岛7组。组长负责组员，并对理事会负责。一家出事，全组都有责任，一组出事，其他组也有责任，彼此连成一片。敌

方成立协维治防理事会，目的在于民间自己进行反共活动，彼此监视，不要涉及共产活动，要对政府效忠。

这些组织初时在农村产生一定作用。群众与群众之间互相猜疑、互不信任。这样，当我军来访时，群众很恐惧，怕被邻居发现。因此支援革命更加秘密了，风声更难泄漏，这对我军往后的斗争却更加有利了。

这个理事会在 74 天戒严令解除后，在我军的警告下，便逐渐自动解散。民众又恢复以往的态度、照样同情支援革命。

（六）戒严期间民众状况

（1）在宋溪美禄福民路逮捕了吴某夫妇，他们留下一群可怜的小孩子（最大只有 14 岁，最小才三岁），幸由老祖母临时看管。吴 XX 是一位技术人员，妻子务农为生，生活贫困，夫妇俩为人诚实，关心政治、富有正义感，热心参与社会事业，在叛徒的出卖下，整整坐了二年牢。出狱后，还限居他乡。这种有家归不得，父母思念儿女，儿女天天盼爹娘的悲伤心情，是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呀！

在木杰而姑的包某一家大小，因“8.25”事件，两个肩负重担的儿子被关到古晋集中营，2 年后才释放，限居古晋。

其他各地，许多革命群众因支援革命斗争，遇到叛徒的出卖，相继被捕，许多在古晋集中营拘禁了二年。

那时，整个戒严区，乌云密布，黑云低压。

（2）1970 年 9 月 23 日，宋溪美禄的油菜岛，由于叛徒的出卖，菜园芭的两个药库和一个文件库暴露。据政府透露，药品之多，足可开一间小药房。当场逮捕了 18 位群众（包括 15 岁的少年，70 岁的老人和大腹便便的孕妇）。

（3）光民中学是一间华文独立中学，学运力量很强，大批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戒严伊始，当局便对校方进行多方镇压。光民中学吴恒惠校长首当其冲。吴校长为人诚恳，博学多才，学校在他领导下，校

务蒸蒸日上。这位备受尊敬的校长也被关进了牢内。其他被捕的老师，还有林友炎、辛泽泓、宋志义、陈爱儿，黄声光老师为避过逮捕而离职，随后转入地下。其他个个老师提心吊胆，仿佛在风雨中飘摇。许多进步学生被捕，学校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另外戒严期间，各中小学全部停课，学生无法上课，许多中小学成了重要军事营地。

(4) 为了生活，许多农民被迫冒着生命危险，下地干活。因此许多人被扣上“不尊重戒严令”而被捕。有的警告了事，有的被捉，关进牢房达一星期至一个月之久。

病人、孕妇只好冒险求当地军警放过一马，发通行证到市区医病或住院。

(5) 农作物损失无法计算。因为戒严，油菜瓜豆遍地都是，一天天看它烂掉，大片农园逐渐荒芜。

鸡农损失更大。宋溪美禄戒严前是著名的养蛋鸡场，大批鸡蛋从当地供应到市场和外地。戒严期间鸡蛋堆积如山，农产品卖不出，使人民极度失望，有的捡起来，索性把它扔到江里去……。

其他地方，民众被通知允许每家的主人或代表将其产品运抵市场，换回日用品。有些地方，尚经有关人员检查后方可带回。同时有关民众需携带身份证到各坡码头（管制地点）报告，返回后也须原地准时（放宽时间）报告，否则将依法逮捕。

菜不用肥料尚可过关，家禽没有饲料可要连本带利一起完蛋的。当时戒严令是突发的，人们全无储备。因此戒严后，普遍住家都缺乏饲料，特别是大农场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9月初虽有放宽三天，饲料、药品供应极为短缺，鸡鸭猪死亡率遍高，损失惨重！

（七）长时期的戒严，得到社会领袖和进步团体的关注

戒严区民众的困境，得到砂人联党和国际红十字诗巫分会的关注，但不被当局接受。

1970年9月3日，副首长杨国斯与第三省5位人联党州立法议员邱炳农、黄家新、周金芬、张兆仁、江仲宵都很关心戒严区人民生活状况，并积极与省长彼得丁刚交换了意见。9月1日，国际红十字会诗巫分会在主席黄顺开医生的带领下，与执委大甘旁头阿邦具特郎，红十字会代表欧孝聚、张上海、王渊仁共同会见了省长彼得丁刚，要求政府当局批准该会募捐，进行救济戒严区。然而，当时的省长只答应给予考虑，敷衍而过，从此没有下文。

我们对以上人士和团体的关怀，表示万二分的感激。

74天的24小时戒严，是举世瞩目的，历史罕见的。政府所耗费的军力、财力也是惊人的。但，戒严并没有吓倒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国内武装斗争力量到了1972年却攀向更高峰。



笔者留影

雙溪美祿發現

大批共黨藥品

數量之多足供開小藥房



24 SEP 1970

(剪報)



戒嚴救寬 購食糧忙

詩巫對面江昨起實施廿四小時戒嚴

包括木柱蘭，白天河，王士來，上城
兩明廠，英基羅，宋漢英株，直落拜也

【本報訊】詩巫對面江昨起實施廿四小時戒嚴，包括木柱蘭，白天河，王士來，上城兩明廠，英基羅，宋漢英株，直落拜也。



9-1-1

報日新西馬



羣衆大會概況

詩巫對面江昨起實施廿四小時戒嚴，包括木柱蘭，白天河，王士來，上城兩明廠，英基羅，宋漢英株，直落拜也。

首長當場宣佈 放寬戒嚴時間

改晚間六時至翌晨七時

【本報訊】詩巫對面江昨起實施廿四小時戒嚴，包括木柱蘭，白天河，王士來，上城兩明廠，英基羅，宋漢英株，直落拜也。

首長宣佈放寬 改爲夜間宵禁

口戒嚴七十餘天的詩巫數區
昨假光華中學亦舉行羣衆大會

【本報訊】詩巫對面江昨起實施廿四小時戒嚴，包括木柱蘭，白天河，王士來，上城兩明廠，英基羅，宋漢英株，直落拜也。



爲使膠價穩定 批准廢除壹項關稅條例

吉隆安保廳昨會事理動行國全
所息休一與賽營三現發祿美溪宋

【本報訊】吉隆安保廳昨會事理動行國全，所息休一與賽營三現發祿美溪宋。

居民紛紛市 忙作物農

特不今日日秋收時起
農忙作物農

【本報訊】居民紛紛市，忙作物農。特不今日日秋收時起，農忙作物農。

2 - Sep 1970

詩巫對面江三城已成立
第四區總局辦理革命
日內提呈當局註冊
▲是亦提呈當局註冊

【本報訊】詩巫對面江三城已成立，第四區總局辦理革命，日內提呈當局註冊。

空前仅有、轰动遐迩的七十四天全日戒嚴的新闻。

巴都记行

- 赖子铨 -

1972年10月第四军分区指挥部，为了落实杀敌夺武政策，为了有力推动本区武装斗争，也为了唤醒民族兄弟，组织了一支临时战斗队。其任务是：一，出奇深入巴都小城镇的警察局缴枪；二，广泛深入动员后方的伊班族和马兰诺族，为开辟更广泛的游击区奠定基础。

临时战斗队由十五位同志组成，指挥部成员是党代表武英（詹雪娇）正队长战明，副队长程明。卫生员有求平和铁英，男队员有光明、思忠（赖子法）、明忠（卢永发）、阿文、新平、大胜（杨生智）、勇强。女队员有星、安娜、老妹。武器装备只有战明队长配有 sten 枪，副队长程明拿猎枪管自制北加来福枪，其他队员全部是自制的五发水龙管长枪。战斗力虽不强，但“五脏俱全”，同志们都很团结，信心强、干劲足。

出发

十月已是雨季了，气候变化异常，时而细雨绵绵，时而狂风暴雨，时而闪电刺眼，时而雷声震耳，大地一片迷蒙。在这样的天气下，除了风在呐喊，雨在哭泣，其他动物大概都已懒惰的躲在窝里噤若寒蝉。然而我们战斗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接受了第四军分区指挥部的令旗。毅然冒雨，沿着拉让江右岸后山的子青芭、树林和大森林前进！他们每人身背约40公斤重的背包（那是我们每个战士的全部财产了），肩上盖着一块小雨布遮住背包，衣裤湿漉漉的，个个像个落汤鸡。一路上，他们赤着双脚，日晒雨淋，晓行夜宿，有说有笑。以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虽苦犹荣，皮肤是冷的，但心还是热乎乎的。

队伍深入至砂威河的柴山、板厂

10月11日，战斗队终于来到了第一站——砂威河(S.Sawai)。砂威河是拉杀河(Btg. Lassa)的一条大支流，两岸有许多柴山和板厂，这是我们搞宣传工作的重点区。今天老天爷还够义气，虽然当时还是黑脸相向，但却没有下雨，终于在9点多顺利地来到砂威板厂（利华板厂）。板厂内的华族和各族工友都很热情的欢迎我们。午饭过后，战明队长对队员的各自工作都作了部署，特别是加强了守卫工作。群众大会开始，武英同志在大会上用华语和福州话进行精彩的演说。伊班同志安娜和星同志也分别用伊班话、马兰诺话在大会演讲，获得了约有百名各族群众的欢呼。

演说完毕，是文娱节目。我军精彩的演技和感人的镜头，不断博得热烈掌声和欢呼声。有个华族妇女和中年马兰诺人，还激动地热泪盈眶。笑声、掌声、欢呼声，连成一片，有点像那沸腾的海洋。这声音，这情景组成了一幅壮丽的图画，感人肺腑，扣人心弦。

集会在傍晚5点许结束，吃完饭后，我们对工人住家进行了逐户拜访。二位卫生员大显身手，为各族群众诊病给药。同时还帮助各族群众打鸡血，深获好评。

夜幕低垂，工场上已是寂静无声，只听到发电机隆隆的响声和守夜员的打更声。我们在几位工人的协助下，乘坐一艘载板船，离开了利华板厂。当我们回头望时，那位热情的马兰诺工人，还在码头为我们送行，声声祝福一路平安。

船大约驶了二、三个钟头，才抵达拉杀大河。我们就在一个浅滩处下船，涉水上岸，继续向北前进。拉杀河位于第四军分区的北部是拉让江的一条大支流。河口比拉让江还要宽阔，河尾低洼，支流密布，像把洗奶瓶的刷子。河尾有条运河(Loba Kabang)，向东北流向伊干江。

拉杀河岸藤刺、草木丛生，一片烂泥芭。在黑暗中，我们借着那微弱的手电光，一脚深一脚浅的走。有的地方陷下去深至大腿。最糟糕的是碰到了刺丛芭，尖兵同志小心用刀砍断亚山刺，后面同志便帮忙砍树铺路，方能前进。要知道，当年

我们是赤脚行军的。战友们彼此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终于到了小树芭。一看手表已是下半夜三点，同志们都累得走不动了。战明队长就命令扎营睡觉。这些小树林，树小根浅，体格瘦小者还勉强可以绑吊床睡。这可急坏了几个大个子，他们只好将几棵小树拉在一起绑，可怜他们倒下吊床后，一动也不敢动，生怕连根拔起。为了明天的艰苦行程，睡觉是第一任务，同志们就这样睡了三个钟头。

过了拉杀河，我们的行程是很机密的。要避过群众和注意痕迹，以防被任何人知道我们的目标是去巴都(Matú)。

策划攻打巴都警察局

去巴都的路上，虽说是森林，但大都已被砍伐，杂草丛生，泥土稀烂，前进速度很慢。按地图原订只要走 7 天就可到巴都河。但我们却足足走了十二天。由于粮食准备不够，最后几天只能煮粥吃。在那沼泽地是很少野兽好猎取的。只能够钓个别条“傻瓜鱼”当菜。当时抓了乌龟，也不懂杀了来吃，有的同志捉来玩玩，又把它放掉，有的同志还将它当手榴弹掷去呢！

巴都河虽不很大，但水深且急，河水滚滚流向南中国海。我们在巴都河的一条支流选了一个较隐蔽的地点扎营。全体指战员心情都很兴奋，也很紧张，因为攻打巴都警局成功与否就在眼前。

巴都镇多是马兰诺人民，以务农捕鱼为生。郊区和市镇有一些华人，大多数是做生意。此镇离南中国海尚有一段距离。据 5、6 年前的情况所知，这里有一个警察局，仅有三个警察，晚上只有一个守岗，有二支军用枪和一批弹药——这些情报成了去巴都的动力，同志们都决心要打好这一战。

赴往巴都之前，武英党代表、战明队长召开了最后动员会议，并对当时的形势、任务、失散后的联络工作等，都做了明确的分析和交待。会议并决定由战明、程明和星三位同志半公开到巴都镇附近掌握最新的情报，并亲自熟悉警局四周情

况，然后计划深夜带领大家以出奇不意，快速冲上并包围警局，打死或俘虏警察，缴械后乘挂尾车离开。武英留守营地，万一有什么意外事故，可带领队伍继续前进。

10月24日，深夜时分，三位同志乘坐自己做的木筏顺流来到了巴都郊区。这里星同志很熟，那是她的故乡，从小在这里长大。因此在她的带领下，很顺利来到了一户人家，同志们对他做了宣传并道明来意，希望他能协助。这位老乡虽然害怕，但出于正义事业，答应尽力帮忙。无奈百密一疏，同志们在后芭被几位马兰诺人看见，这些人出于好奇就当作“新闻”向外传开。同志们被迫于25日晚又秘密赶回营地。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许多同志的思想都有点不能接受。在经过一番争论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些马兰诺人未必肯定是共军到来，消息未必就会迅速传至警局。因此，攻打警局，采取速战速决策略，把握还是很大的。于是就策划了第二天晚上强攻巴都警局的计划，即10.26行动。

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要去巴都，并非易事。这里没有陆路，只有水路，其中还要经过一个甘榜。要快速前进，秘密走后芭是不行的，只有大胆用水路。没有船怎么办？同志们七手八脚做起木筏来。巴都河水量大且急。由于经验不足，木筏不听使唤，东冲西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驶一小段路程。这怎么行啊！于是决定弃筏截船。

等了一个早上，除了哗啦哗啦的流水声和呱呱的青蛙噪音之外，一个人影也没有。老天还在下雨，雨点滴答滴答往我们身上滴，湿透衣裤，最后流入巴都河。我们多么想也化成雨水，随着河水，无影无踪流到巴都镇啊！可那是幻想呀！

到了下午3点，忽然一个同志大声喊起来，“有了，快准备拦住他”。随着一声喊，同志们精神倍增“呼”地全站起来，看到一个马兰诺老人划着一条小船（后面还拖着一条小舟），轻悠悠朝我们划来。战明队长和星同志出去拦住他，简单了解一些情况后，就向他借船。无奈他不与我们合作，一边和我们谈话，一边想偷偷划跑。当我们去拉他后面一只小船

时，他迅速放弃拼尽全力划着小船飞快的逃跑。队长见状，立即命令二位同志划着小舟去追，但岂能追上在河里长大的老乡。我们无奈，只好朝天开了一枪，大声命令他停止前进。这一枪也够有威力，他吓得手脚都软了，浆也拿不起了，终于被我们追上，请他暂时留下，并耐心跟他做了宣传教育工作。

然而一条小船顶多只能坐 6 个人，我们只好继续拦截船只。直到傍晚 6 点多，才看见河尾有一条较大的船，坐着二个人，顺流而下。这二位马兰诺人颇善良，满口答应载我们一起去他们的甘榜。于是战明队长留下安娜和思忠同志看守“俘虏”，其他十三位同志分乘三条船，与二位马兰诺人一起来到他们的甘榜。

约于傍晚 7 点左右，我们来到这座马兰诺甘榜。它座落在大河边，约有 80 户人家，离巴都镇尚有 3 哩路。交通还很落后，来往全靠水路。这里没有住家电话，更没有手提电话。有什么讯息全靠双腿转送。因此，只要封锁河道，我军的消息就不会迅速传开。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逐家拜访和召开群众大会，就由星同志对着喇叭用马兰诺语，做了简要的宣传后，便宣布该区戒严。但我们人少，经验不足，场面很难控制，群众还是照样上上下下，来来往往。实践证明，这样仓促的戒严法是没有效的。

10 月 26 日深夜十一点多，我们向当地群众借了二条较大型的船，就向巴都镇前进。两岸甘榜房子林立，椰树在晚风吹拂下，发出了清脆的声响，鱼儿伴着河水不时跃出水面。但我们都无心欣赏这美景，同志们都警惕四周，并都在想成功与否决定于今夜。

当我们船驶到离市镇只有 300 码左右时，突然看见码头上有探照灯照来照去。这种不寻常现象，使我们产生了顾虑，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第一，我们还未亲自深入侦察和详细了解警局四周和里面情形，只是根据群众反映的不完整和表面的情况；第二，这里群众基础差，没有内线，根本无法得知这一天时局情况的变化；第三，前天的暴露，是否已有人向警察通风报讯，据说甘榜有小路可通行到另一个甘榜；第四，当天沿河下甘榜时，碰到三条船，坐满人，打着灯，凶神恶煞般

要去河尾寻人，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前进。同志们估计这些人去找被我们拘留的老人家，就很担心河边二位同志的安全。

约莫又过了一个钟头，探照灯还在不停的左照右照。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损失，我们做了痛苦的决定：放弃攻打警局，返船回航。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忍受路上一切艰难险阻，如今一切都成了泡影，许多同志思想都有轻重不同的负担、斗争。负责同志了解同志们的心情，就鼓励大家正确对待失败与挫折，认真总结经验，使以后工作做得更好。

经过学习，同志们的情绪有了恢复，于是就策划了第二步的工作。即广泛的去宣传在巴都河尾和拉杀河尾的木山群众，一边宣传一边搞粮食，然后绕过拉杀河尾，从伊干江岸转回华区。

队伍在拉杀河尾木山广泛宣传

十一月的天气，还是阴晴不定。战斗队发扬了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精神，在查姆令河和拉杀河交界处大森林区广泛宣传群众。我们一共突击了四个木山营，并利用火车逐个拜访伐木工友宿舍，其中大多数是马兰诺人，也有伊班人和少数华人。这里的马兰诺民族有文化，思想先进，他们也现实不满，表示支持与同情我们的武装斗争。他们主动捐献米粮，也收听“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当我军要离开时，有的还唱起传统马兰诺山歌来送“客”。富有民族特色优美的旋律在同志们的心中，在广阔的森林上空荡漾萦绕，使我们久久不能忘怀。

由于没有什么敌情，各族群众表现热情，我们也藏了一定的战备粮，工作进展很顺利，很快便达到预定的目标。我们便在公泰木山扎营休息，并且准备了一个星期的粮食，准备到伊干江的德大板厂停留、休息，然后补充粮食回华区。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启程的前一天晚上，求平同志蹲下小便时，手指被毒蛇咬伤，为了不影响行程计划，她坚持跟大队走了两天。由于蛇毒扩散，手指头越肿越大，经常发冷发热，队伍只好停下扎营休息。第二天傍晚一个男队员去劈柴，把脚劈去一块肉，流了很多血。估计至少要休息两天才能跑动。

如此一来，粮食成了很大问题。若倒回已暴露的木山背粮，恐怕有危险，只好派四位同志去东边方向找粮。然而，在这茫茫的林海里，要找到粮食谈何容易呀！四位大汉整整跑了一天的路程，都没有碰到群众，但却发现一片放弃已久的旧稻芭，芭边长满了水芋头。大家砍满整整四大袋背回来。然而这么多芋头茎和叶，顶多吃二天就完了，因此，解决粮食还是当务之急。经过商量，大家只好返回公泰伐木区。

当天傍晚，三位同志成功摸到木山小店，得知附近没有敌军活动，并很顺利背回一大批粮食，大家都很高兴。

整整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和工作，同志们都很疲倦，加上雨季，天天穿湿衣裤，一双赤脚，深至大腿天天泡在烂泥芭里，有好几位患了风湿病，其中有二位同志较严重。再加上拉杀河尾森林，有很多毒蛇，当地群众称此林为“老蛇林”。求平同志蛇伤未好，铁英同志左脚趾也被毒蛇咬伤，肿得很大。因此，就决定扎营休息几天。

“11.12” 驳火

我们的临时营地是离火车路约十分钟脚程的地方。这是旧住点，由于听到没有敌情，又搞到粮食，每位同志思想上都显得很松懈，警惕性较差了。几天来，点内一只公鸡（是打鸡血用的，还未及时宰杀）在清晨涨潮、退潮时都引吭高鸣；前一天，同志们发现树上一只四脚蛇，便爬上去捉，结果也发出较大的呼喊声；前一个晚上出去搞粮的同志下货时，所用的四轮车也停在离营地路口仅几分钟的地方。这些情况都已是危险的讯号，暴露的预兆。但同志们却没有觉察到这点，说话声、

劈柴声、收音机声、笑声都很大。到此，本来可以避免驳火、牺牲的事，已无法避免了。

11月11日早上十点左右，一股敌军乘坐火车很准确地在我们的路口停下来。许多同志还主观地认为是外面群众有事要找我们。战明队长和思忠同志便出去联络和侦察。谁知他们从原路出去，敌军却从另一边进来。很明显的，敌军是在得到准确的秘密情报后，立即有计划地派兵直冲我营地发起进攻，其余敌军则在各处要道拦截。

敌军突然发起进攻第一阵火力已使松弛麻痹的我们非常被动，当场明忠和铁英同志受伤，损失十个军包、二支枪和三副军用吊带。但队伍却还能紧密配合（除二位同志出去外），一起安全撤退。

由于两位同志受伤，特别是明忠同志受重伤，不时不时要去大小便，武英便指派阿文同志扶他走，一边照顾他。撤退速度很慢，痕迹也很大，根本无法灭迹。为了转移视线，模糊敌军，当大队经过一段倒树或“马当”时，后卫同志故意弄大痕迹，另开一条烂路，让敌军跟踪。

脱离火线约一个多钟头，后卫阻击组同志发现敌军跟踪而来，立即布局好阵势迎敌。无奈我们纸壳的猎枪子弹，有的因潮湿而膨胀不能上膛，有的太过陈旧，根本打不响。敌军见状，更加猖狂嚣张，一边站着开枪一边追击，一边喊叫。武英同志怒火满胸膛，她蹲下连打上三枪，第四发时整个“撞桥”飞出来，打中脸下颚，流了很多血，她还以为挂彩。这一再的打击，队伍失去了控制，大家散开了。明忠同志壮烈牺牲了。大胜和阿文撤散了各自一方。新平、勇强和铁英一组，大队只剩下七个人。

敌军为了进一步追剿我军，在这一带进行了全日戒严，动员了据说有整千名兵力，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我军。直升机在天空盘旋，招降传单四处散发，野战部队有计划四处分割包围、穿插。但我军发扬了艰苦奋斗、团结合作的精神，终于克服了反“围剿”斗争中的重重困难，胜利回来。

“围剿”与反“围剿”

这里先从刚参军才三个月的阿文谈起。由于他没有作战经验加上不够镇定，他第一次驳火就丢了枪、吊带和背包。撤退路上他仍能一直照顾受重伤的明忠同志。第二次驳火他便与大队失散，单身一人。他手无寸铁，身无粒粮，又没有指南针，在茫茫大森林要面对严重生死考验的。想到其他战友的安危，想到明忠同志。于是决心一个人突回华区寻找组织。

他向着火车隆隆声的方向，找到了伐木工人的“旅路”，等到晚上，才小心翼翼，摸到了铁轨路。他别无选择，只有大胆沿着火车路跑去公泰柴山小店。那里肯定是有敌军的，因为兵就是从那里来的。他不从这里出去，还能去何方！他做好牺牲准备，并利用黑夜作掩护。顺利摸到木山营总站旁边的一条小沟，心想只要能偷到一条小船，就不怕了。当他正要下沟时，看到好多敌军在附近来回走动。突然有二个敌军朝小沟走来，他赶快伏下，心脏跳得很利害，并强迫自己要镇定。还好敌军只是过来小便，未曾发现他。

等到下半夜，万籁俱寂，敌军大概也都在会见周公了。他才沿着小沟，小心翼翼在黑暗中寻找船只。果然天无绝人之路，他找到了一只小船，船上又有桨。他不顾一切，坐上船，就拼命向拉沙大河划去。直到第二天中午，他来到了砂威河的利华板厂。在当地华族群众的协助下，乘搭舢舨船，顺利与华区同志会合。

XXX

XXX

明忠同志，巴拉术兴化人，他们一家与伊班族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伊班语和深知伊班民族的风俗习惯。参军才数月，各方面都表现很好，所以也派他参与这一次行动。一路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行军帮忙开路、扎营，主动帮助炊事，只要他能做到的，他都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驳火那一天，他光着上身在做工。一听到枪声，他转身跑去拿枪，不幸肩膀中弹，动脉管被打破，流了很多血。二手只能紧抱双肩，血才不大会流。但他在阿文同志的照顾下，仍

顽强紧跟大家。脱离火线后，同志们简单替他敷药，包扎伤口。由于伤口很深，鲜血仍一直往外流，并腹泻不时不时要去大便。当第二次被追兵袭击时，他是去茅厕，此时此刻的他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再跑了，身边又无枪支，自己也根本无力反抗，就准备为革命牺牲了。

XXX

XXX

再说铁英同志，是个卫生员，由于脚趾被毒蛇咬而发肿，行走困难，在火车铁轨路摔了一跤，脚又受伤，因护理不当，伤口发炎变疮。当时星同志正在帮她护理伤口，突然听到枪声响。她正要伏下，一粒子弹打中她的左大腿，但她始终紧跟大队撤退。第二次驳火，她又告中弹，子弹从腰部进胸部，弹头还卡在胸前皮层里，终于昏迷不省人事。有个女同志跑过去想拉她一起跑，但她一动也不动，以为她已牺牲了。

敌军的狂叫声、枪声，把她从昏迷中惊醒。她坚强地站起来，生存的意志顽强地支撑着她，一定要坚持下去。她一步一步往前走，幸好在不远处碰到二位后卫的勇强和新平同志。

他们三个人，互相鼓励，彼此牵扶地前进。由于铁英同志伤势严重，勇强和新平只好轮流照顾她，有时背一小段路，有时半扶半拖的前进。他们就这样坚持走了三天，在一个地形较好的地方停下休息。突然间听到左边不远处似有人的跑步声，以为又是敌军来了。他们严阵以待，小心观察。

“啊！是自己人，是大胜同志！”他们高兴极了，边喊，边打暗号。

大胜，年纪虽然大些，但他和光明同志同为尖兵组开路。二次驳火他都较镇定，枪支、吊带和背包全部带走。二次驳火，都因子弹陈旧，有的打不响，有的却没有力，因此不能发挥威力。第二次驳火，他从尖兵组变成阻击组。在跟大队撤一小队后，听到后面敌兵穷追不舍，就自个在后埋伏。眼看一个敌兵只离三丈远，便瞄准射击，可惜子弹不响，又暴露了目标。敌军向他扫射，在慌乱中跟大队分散了。约过十分钟，他又听到敌军疯狂的叫喊声，得意洋洋呼笑声，他知道一定有同

志牺牲了。于是他调整方向，一人摸到火车路边，从腰带包里选出最新的子弹，选择一棵大树做掩护，便在此伏击敌军。

大约到了中午二点左右，一架装有小型摩多四轮车“空隆，空隆”从河边火车路驶进来。他清清楚楚看见车上坐着约七位敌军。当四轮车经过他面前时，只听“砰”一声响，一个敌军被打中，栽倒在铁路边，其他敌军也相继跳车。当敌军清醒过来开枪还击时，我们的同志早已转移了。那架无人控制的小车，便继续前进，路尾的敌军看到车上没有人却有几个背包和箱子，以为是共军的诡计，便朝车子开火，把背包打得稀巴烂。

大胜独自一人，昼行夜宿，朝约定的方向寻找队伍。这一天他依然以刚健的步伐向前走。他边走边想，驳火后的新兵和伤员困难可大呀，万一失散孤身一人，地形不太熟，要回华区考验可不小呀。想呀想，心里一阵心酸难过，使他放慢了脚步。突然听到联络暗号声和有人喊他的名字，把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抬头一看，原来是自己人。真是无巧不成书，天底下竟有这么巧合的事，在这茫茫的林海里，这几位战友却能在此相遇。大胜同志赶忙奔跑过去，几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时大家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只是相对无言，激动的两眼湿润。

现在他们的战斗力较强了，更有信心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由于铁英同志伤口未愈，走路很困难，大胜同志坚持天天背着她，一脚深一脚浅在烂泥芭缓缓地走。大胜的背包就由勇强和新平轮流背。真是困难见真情，危急晓知己呀！

11月18日，天下着大雨。四位战友选了一个有利的地形，头顶上盖着一张雨布，坐在一起，想等雨停了再走。一队仍在深山搜索共军的野战部队发现了他们，前面几个敌军已摸到非常近，就要举枪射击。还好我们经过几次驳火，同志们警惕性都很高，及时发现了敌军，立即伏下还击。彼此互相照应，边打边撤，终于脱离危险。这一次驳火，铁英左手和右小腿又告中弹，新平同志脚亦被流弹击伤，背包侧面被敌子弹贯

穿，一本四角号码中文字典放在背包侧旁也被射穿。大胜同志腰带的小型收音机也中弹开花，不能用。

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敌情是越来越紧了，背包里的粮食也很少，铁英同志的体质非常虚弱，大胜、新平和勇强也感到非常疲惫，大家就打消回华区的念头。于是调转方向倒回存粮点，补充了粮食，找个较隐蔽的地方潜伏休息几天。当时铁英同志旧伤口因没有较好的消毒敷药，已有臭味，而且还有小虫在蠕动。在休息期间，同志们用盐水清洗伤口，并用朋尼西林药膏涂伤口。在战友们的精心护理下，伤口才逐渐好转。

估计敌情已较松了，他们才启程。一路上几位战友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坚持了一个多月，才胜利回到华区。

据大胜后来说，当时没什么好吃，又要艰苦行军，坚持背铁英，由于过度出力，造成后来屎尿不能很好的控制。

XXX

XXX

且说战明和思忠出去火车路侦察时，还能隐约地听到营地内传来的砍树声和鸡啼声。当时，火车已经跑了，空无一人，但却发现路边有很多刚丢弃的香烟蒂，正在惊骇时，营地内枪声响了。眼看回营地已是不可能了，他们就迅速越过火车路，就这样与大队分散了。当时他们身上只有枪和吊带，其他一无所有。只好跑到存粮地点，拿了一筒米（约有 3.3 公斤，因考虑其他同志也会来拿一些），便动身跑。

一路上，他们的考验也不小。由于身边无寸雨布，白天下雨，衣裤湿淋淋的，晚上下雨可要砍树作床砍树叶盖屋顶。煮饭没有锅，只好天天用仅有的二个菜心空罐子煮。一次可要煮好几罐饭才够一天吃。坚持了一个星期，他们偶然发现一条有好几个人跑过的新路，用指南针一对，与自己前进的方向相同。根据经验，可以断定是自己人跑的路。他们沿着痕迹跟踪了一段，便发现刚放弃不久的过夜点，经过进一步检核，知道同志们就在前面不远。这意想不到的发现，使他们精神倍增，迅速沿着痕迹，一边追赶，一边打暗号联络。

且说大队经过二次的驳火，只剩下七个同志，即武英、程明、光明、求平、星、安娜和老妹。他们只有五支枪（包括武英的坏枪），二个背包。战斗力较弱，但同志们在武英同志带领下，都能发扬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的精神。二位男同志表现了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光明同志在前开路当尖兵，程明副队长在后灭迹当后卫，中间全是女同志。然而五位女同志也不甘落后，有时也主动拿起刀在前面帮忙开路，其余主动帮忙灭迹和注意四周动静。真是困难见真情，危急一条心。一路上，他们为了节省粮食，头几天每天只吃一餐稀粥，其他餐就靠“胡毛草”充饥了。“胡毛草”是在烂泥芭的砍伐区、子青芭里生长的一种蕨类植物，其幼芽呈9状型，鹿很喜欢吃，其味带苦涩，叶径长毛，故有“胡毛草”之称。同志们在旧火车路捡到二个五公斤庄的生油珍，用手提着一路采“胡毛草”，每天能采二珍多，洗净渗水煮烂吃，勉强一日过一日，但“胡毛草”吃多了，大便可就辛苦难受了。因为纤维多，很难消化，排泄出来的废物，几乎还是一条条“胡毛草”，有的只拉出一半就塞住了，必须用手去拉。每当大便就要找有水的地方一边弄水一边拉，才能解决问题。

到了大森林，连“胡毛草”也没有了，但同志们仍然勒紧裤带，继续前进。约莫跑了七天的路程，才来到了拉沙河尾大森林。这里山蛭特别多，每隔5分钟都要各自检查一次脚，通常就有5至8条。起初还能耐心一条条把他砍死，后来越捉越多，只好捉了丢掉，这又省时又不妨碍行程。山蛭是一种吸血虫，有枚条针那么长，一接触动物身体便吸血至饱像一粒花生仁大小才自动脱离，被吸血的部份位继续流血。初时有的同志很害怕，但处身此境，久了也习惯了，只是看到它就讨厌，捉到时会叫它是“吸血鬼”。还有一种“吸血鬼”，就是蚊子。烂芭森林区特别多，只要你坐下来，整群蚊子就会来侵袭。这蚊子可不怕死，你只须轻轻用手指一压，它们是宁死不跑的。同志们打得烦了，一坐下便用一根长满树叶的小树枝，左右开弓，赶蚊子跑。二种“吸血鬼”对同志考验并不大，考验最大的还是缺粮，肚子不断咕噜咕噜的叫，全身无力，举步维难。

这一天他们如往常一样继续赶路。突然后面隐隐约约传来了联络暗号声。他们停止脚步，并警惕闪开一旁，看后面来者何人。联络暗号声越来越近，断定是自己人时，就回了暗号。不久就看见战明和思忠两同志上气不接下气的半跑而来。同志们一见面，又激动又悲伤。激动的是能在这困难时刻和患难与共的战友结合，悲伤的是思念牺牲的明忠烈士和尚未结合的战友们。

来了二个大汉，队伍显得活跃起来，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也增加了。晚上他们都要选择一个地形较好的地方过夜。上面盖二张雨布（只有 10 尺阔左右），中间绑二张吊床，下面铺一大堆木，睡七个人。二旁烧起火堆，以驱蚊取暖。当倾盆大雨时，旁边的同志只能坐着缩成一团，一边打蚊子，一边睡觉，一个晚上只能睡几个钟头。白天还要坚持挨饿行军，前面开路，后面还要灭迹。有的同志实在疲倦了，就站着靠在树边，不知不觉地睡去，待同志推醒，才又带着迷蒙的眼神，继续前进。

一天中午，一个同志突然高兴的叫喊起来，同志们过去一看，原来地上生满着一片鹿眼菇！中午有鹿眼菇可吃了！只渗点水，放一点点糖精，便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十多天来算是吃得最饱最舒服了。谁知行军二个钟头过后，不是这个喊肚子痛，便是那个闹泻肚。本来疲乏的身子，此时很多都已跑不动了，队伍只好停下休息，过夜。

到了 11 月底，他们终于来到了 Loba Kabang 运河。这条运河虽不是很深，但却很阔。据说水浅时，能涉水而过。等到天暗了，吃了一点点前 2 天在一个旧稻芭挖到的生木薯，同志们才慢慢摸到河边。一看白茫茫一片，原来是雨季加涨潮，涉水是完全不可能的。几位有经验的同志，立即下河把雨布摊开，二头绑紧，将背包吊带等放在中间裹好，绑紧，像条浮艇，然后把枪放在“浮艇”上面，由战明等前拉后推而过。当时只有武英同志不懂游泳，幸好借助安娜的游泳圈的浮力，加上程明和星等同志前后照料，也顺利渡过运河。

上岸后，同志们止步回望着运河，运河水乃滔滔不息的向东流，望着对岸的森林，森林乃是那么翠绿雄伟，富有生气。

回返华区

十二月初，顺利地来到了伊干江边的德大板厂，了解了情况，补充了粮食，饱饱的吃了一顿。这里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同志们安心休息几天后，便直奔华区。

十二月中，当失散的战友都在华区见面时，大家都紧握彼此之手同志们热泪盈眶。

华区的保干群众，看到久别归来的亲人，也非常高兴，他们忙着杀鸡宰鸭、煮蛋、炖猪肝，殷情慰劳受磨难的战士。

略谈砂拉越人民游击队 第三支队的战斗事迹

- 雪飞

革命局势的转变，在马印联合围剿和当时领导的意见分歧，致使以后的第三支队走进更加艰苦、困难的战斗生活了。

后来再加上火焰山部队攻打华莪机场的军事基地，对第三支队的的影响甚大，从此第三支队同志面对更加严重的印尼军事“围剿”。敌人派更大批军队上双空基地，首先用军机去轰炸第2号和3号芭。当时第三支队有四个芭，同志们把它称为第1、2、3、4号芭。2号和3号芭是三支队种稻种菜的生产点。

轰炸之后，大批军队就向第四号芭（即巴拔山）三支队的据点展开进攻。当时第三支队的同志在“巴拔山”据点进行英勇地反围剿战斗、坚守了三天三夜。之后，叶存厚、杨柱中及有关干部进行研究，认为这种战略是不宜坚持下去，所以忍痛把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据点放弃，留下小队在原地进行骚扰战，其余的全部转入森林。

自从1967年中，第三支队从“巴拔山”撤出转入大森林后，同志们的反围剿战斗生活就更加艰苦困难了，主要是没有粮食来源，以前在第2、3号芭种植的稻、番薯、木薯、菜类等，都完全不能收割了。他们储藏的粮食也没法拿到，还有过去火焰山部队供应给他们的米、盐（尤其是盐）都断绝了。火焰山部队的同志也撤走了，从此就无法再联系到。之前，民运工作组还能在双空搞群众工作，在伊班长屋还能搞到食物；之后，转入大森林，以上的一切都无法进行和得到了。

从此以后，第三支队的生存全靠在深山里寻找。67年下半年时，他们的生活还较好，因为是果子季节，他们走到一个榴连山就驻扎附近捡榴连吃，也能找到竹笋、木薯叶、巴古菜等。

这样的地方他们也不能住太久，一有敌情，他们就要转移。

从 67 年中至 69 年 5 月，将近两年的时间，第三支队的同志一直在森林里，印军一直在追剿他们，他们的生活就越来越艰苦。到后期，榴连、竹笋、巴古、木薯叶完全找不到了，他们就吃榴连叶、树头酸（一种长在树干上的果子，又酸又涩）、山番薯（一种有毒的果子，要经过煮，漂水等去毒过程后，才能食用）、山香蕉芯、榴连核、树枳和锥子等。凡是可吃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吃。吃了这些东西，又加上没有一点盐，同志们身体就更加虚弱了。他们的脚、脸浮肿，导致行动很辛苦，本来只要走两个钟头的路，他们要多走一两倍的时间。

同志们面对饥饿，又面对敌军的追剿，可是这一切险恶困境都没有动摇他们革命决心。他们饿着肚皮还是坚持继续前进，每次遭敌兵追杀的时后，敌兵一直在高喊叫他们投降，可是，他们宁死，也不愿放下枪支举手投降。只有那些已经被打伤走不动、或饥饿到不能走动的同志，才活活被敌兵抓去。这些同志有：刘月兰、曾云锦和李雪娇，等等。

在 68 年中，在一次敌兵追杀中，当时共牺牲了 7 位同志，因为这组的同志多数是病弱的。另外，有一位女同志的小腿被子弹打到流了很多血，身体又虚弱，没有办法行走。杨柱中同志叫她暂时躲在一个竹丛里，待敌情较松时才倒回来接她，其他同志就从水路撤走。过后不久敌人又来这这里追剿，发现有血迹，就开枪扫射，又再次打中躲在竹丛里的那位女同志的脚，那位女同志受伤不由自主叫了一声而暴露了。但随后她也昏迷过去，被敌军逮扑。

之后，叶存厚和杨柱中领导同志有打算想撤回附近的边区去，当时还剩下三十多位同志，但是有半数同志是病弱的，行动都非常辛苦。为了其他同志更灵活的转移，那些病弱的同志要求领导同志把他们留下来，可是领导坚决不同意，绝不能白白看着这些病弱的同志在森林自生自灭，就说：“要死一起死”！这样大家就一起再坚持继续前进！

到 68 年下半年，情况越来越严重，剩下的同志体质也越来越弱。在前进的路途中陆续遭到敌军追杀，同志们陆续的病死，被活抓的，有的被敌兵打死。在这种饥寒交迫的危亡处境，他们还是不愿意投降，宁愿坚持战斗到流下最后一滴血。

到了 69 年 3 月，只剩下了叶存厚、杨柱中、王美鑫、曾永光、余秋兰、亚水、陈梅枝和唐秀妹八位同志。他们仍然继续坚持把这条反围剿的道路走下去，不久又再遭遇敌军的伏击。这场战斗中，第一个中弹的是杨柱中，王美鑫在他身后，看到他倒下去，没有动，就伸手去拉他的脚，可是，已经没有反应了。王同志就把杨柱中的 AK 枪拉下来丢给她身后的曾永光同志，而曾永光原先拿的是射击速度较慢的来福枪，当曾永光接过 AK 枪马上就向敌军扫射，使同志们赢得了撤退。

与此同时，叶存厚同志的肚子也中弹，当时他一手压住伤口，一手指着他的背包。叶存厚的背包有很多重要的血史记载。叶同志有喜欢写日记的习惯，他把每一天所遇到或做过的事情，都会写下在日记簿上。所以，在几年来的反“围剿”战斗中的许多千辛万苦、有血有泪的史迹记载下来。因此，他在临死前一直望着他的背包，希望同志拿走他的背包。

后来，叶存厚这本日记给政治部拿到，曾经在保安行动委员会公开展出。

1969 年 3 月间，两位领导同志牺牲后，剩下 6 位同志，他们不但没有去投降，还在森林里坚持了两个月。之后又遇到敌兵袭击，又再牺牲了亚水、秀妹和梅枝同志。

最后只剩下曾永光、王美鑫和余秋兰三位同志了，他们仍然再坚持突围。某日，一位女同志去寻找食物时又被敌兵发现，又被追杀，在这过程中曾永光同志失散了。另两个女同志走向一方向，她们已饥饿到几乎都没有力气走动了，不能走就半走、半爬、半滚。后来她们无意中爬到敌兵驻扎附近一个斜坡就倒下来，听到敌兵讲话声，她们实在太疲弱了，全身都软下来，根本无力再走了。这时她们心想，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

安全的地方。当时她们昏昏沉沉一倒下去什么时候才苏醒过来也不知道。她们醒来时想去找食物充饥，那知道她们一滚就滚下河边，那时恰好有几个敌兵在河边冲凉，突然看见两个人滚到他们面前，敌兵也吓了一跳。这两位女同志也吓到惊叫起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被敌兵抓走了。

总之，第三支队，最后一批同志在深山里，过着饥寒交迫的战斗生活，坚持将近两年的反“围剿”与突围的过程中，经历了千辛万苦都不愿放下手中的枪支举手投降，宁愿坚持到流下最后一滴血，舍身忘我誓死为革命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佩！

青山事件

- 自立

这里所说的青山事件，指的是 1971 年 3 月 8 日敌军在巴哥一带对我们的一次“围剿”和我们的反“围剿”斗争。

1971 年 2 月中，第一省省委的部份领导干部到巴哥的一个叫做水塘路的华人农村和省内的各地工作者开会。这是 2.24 “围剿”斗争后，我们和各地地方工作者恢复正常联系和执行的一次主要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分析与研究 2.24 反“围剿”斗争后的省内革命形势并部署新时期的地方工作。

会议开始于 2 月中旬。到了 3 月初时，不同地区的工作者，都已先后到那里参加了会议，并在会后安全返回其工作岗位了。只是最后到那里的一组同志，在开完会准备返回而来不及离开的时候，才不幸遇到了敌军的包抄和攻击。

事情发生在 1971 年 3 月 8 日凌晨，地点在陈胜贤同志的老家。一队敌军突向我们的住所疯狂扫射，估计敌军是在 7 日深夜或 8 日黎明前已首先摸黑到我们的住所附近埋伏了。可是，我们的守岗同志事前并没有发觉。

然而，当敌军正式向我住所发起扫射攻击的时候，我们守岗的同志，便和敌军碰上了。双方接触时，我们的一位守岗同志，中弹牺牲了。另一位则手指受了轻伤，但无大碍。由于驳火的缘故，敌军可能意识到我们有守卫和防备，所以在扫射了一阵之后，也就停止了。他们也不敢向前冲迫近我们的住家，而是在原地守着。

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在屋内的全体同志，在枪声响后，便都向屋后撤退，接着又撤上青山山麓。我们原来处在青山南面的山边。上了青山后，我们环山而行，直到其北面的山腰处休息一下。至此，已是中午时分，只见敌军从北面不停地向青山发炮攻击。估计敌军当时是从南中国海面上的舰艇或岸边的沙滩处向

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会撤退至那里躲藏的缘故，可是事实不然。我们只是到这石洞之下的一个梯形的山顶的平地上而已，处在这样的地方，敌军的炮弹是不容易击中我们的，因为，那几乎是一种直角三角形的地形，而我们就处在这个三角形的底边。所以，敌军的炮弹从下面的海边或沙滩射来，高则击中我们头上的石洞，低则击中我们之下的山腰，没有直接击中我们的可能。另外是，敌军既然已经向青山猛烈开炮轰击，也就说明，至少在当时，他们是还未上山的。既然它还未上山来，而只是在山脚下而已，那么，这对我们也就暂时没有危险。所以我们也正式在那里停下休息了。

休息时，我们找来青山巴哥的地方者同我们一起开会研究对策。经过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认为敌军该此次的“围剿”行动，并非是事先有长期计划与周密部署的。那可能只是敌军在得到情报后才临时和仓促采取的袭击行动。这样，敌军的兵力就不但有限，“围剿”计划也必然有漏洞。所以我们要突围出去，是可能的。

另外，在找过地方群众联系和了解情况之后，我们也已知道，其时敌军还只是占据了我们的住所及其周围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些是活动在水塘路河边和青山镇上或马来甘榜处。再者就是在沙滩或海面的船只上，但各处的人数看来都不多。

这就是说，在整个青山的周围，只有东面、东南和北面才有敌军，而西面、西南和南面并没有。

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决定是等到天黑时，就从南面方向突围。

所以选择这个方向突围，除了因为当时这个方向没有敌军活动之外，也因为这个方向，伸延出去即是答邦村。该村当时在敌军“围剿”之外，不是和巴哥陆地相连的，但可通过步行到达，且费时也只需若干小时罢了。只要安全到达於该村也即是成功突围了。另外，由于该村还有部份的地下工作者，所以，只要到达那里就可以找到他们和得到他们的协助。届时要暂时隐蔽在当地或转移到古晋的任何地方去都可以做到。可是西部却不然。

向西行，首先是需要重下青山本身的悬崖峭壁，接着有几条大河和一个红树芭的大沼泽地阻碍。红树芭沼泽地极难行走，而大河则是敌军警日夜巡逻的水道，要突围既困难又危险很大。

再者，由于考虑到我们当时的队伍，人数比较多，因为，除了我们部队指战员和前去开会的当地工作者外，尚有当地的工作者和部份群众也跟随我们和要求我们保护。这样一大队人要同时一个晚上，由同一条路向同一个方向突围有所不便。所以便决定分为两批先后进行，一批当晚先行，另一批则之后才伺机而行。于是就让来参加会议的工作者和部份当地的工作者和群众先行，而我们自己则暂时留下。

出发前，我们又集合大家一起说明情况和决定，要求领队者好好团结同志，努力奋斗，依计而行，尽快完成突围的任务。对于这样的决定安排，同志们也都表示认同和有信心完成任务。可是没料到，当他们成功到达巴哥和答邦的交界处时，因为那里地势较低，普遍积水，泥泞难行，有者更会陷入。这种情况在海口区本来是很平常和到处可见的。对于在海口区长大的人或工作者来说，根本不成问题。可是，对于非在海口区长大的或工作者来说，却成了一个大难题。所以，一些同志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就犹豫。他们因此不愿继续往前走，个别的更要求折返巴哥。就这样他们便耽误了时间，失去了安全突围的良机。

由于没有在一个晚上完成安全突围的任务，就此难题也就产生了。为了解决温饱和食水等生活难题，他们于是到周围去找群众联系和协助，结果被甘榜的马来群众碰见，导致敌军前去追剿。这才造成他们当中的好几位被敌军拘捕和杀害，只有一些坚决按领导上的指示实行的同志和群众，才免于难并成功突围而出。

事实已经表明，所以会造成牺牲和损失的原因，并不是领导上的指导错误所致，而是一些同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动摇起来和不听从指挥所致。但是对此，有时外面的人和群众，因为看到或听到造成不少牺牲和损失，就提出批评等，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缘故。

当发现我们向南方向突围的队伍时，敌军曾误以为我们全部人都已转移到那里。所以，便调集兵力到那里去追剿我们。可是当有些同志牺牲和被捕之后，他们很快就从中发现到，我们的主要力量并不在那里，而是在青山范围内，所以，便又集中兵力到原来的地方对付我们。

由於向南突围的队伍和路线已暴露，要再依原来的计划和路线突围已经不可能。所以，在无所选择之下，我们也只能向西转移了。

当我们重下悬崖峭壁，并于天黑时涉水越过第一条河口，而巴哥河口到达文丹沙滩的时候，敌军便也追击到那里了。

鉴于敌军的巡逻船艇已经在河上来回行驶，要再沿沙滩前进，再涉水过文丹河到山都望已经不可能。所以，我们只好退进红树芭里面。一方面荫蔽自己，一方面绕圈子继续向山都望方向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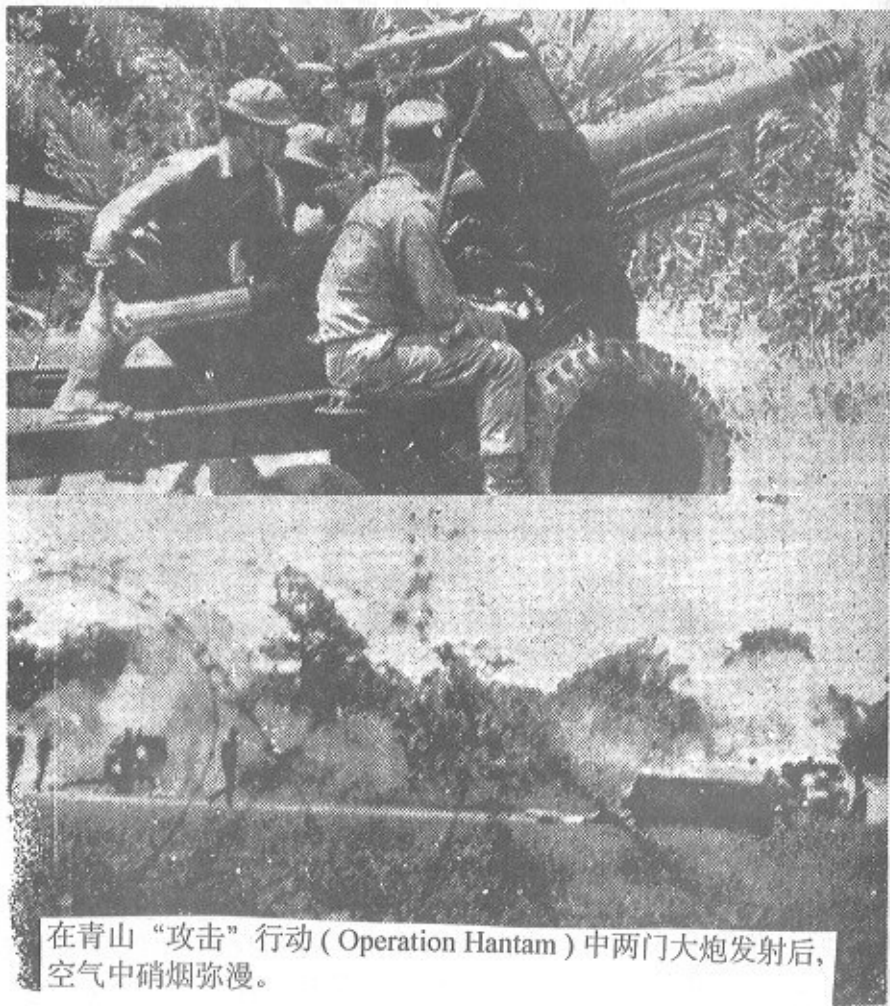
当晚，我们队伍一直在文丹红树芭中艰难地行走，红树芭内积水又陷入，行走实在困难至极，速度也极缓慢。走了整整一个晚上才到达一块比较平坦和干燥的地方，那是一块当地马来群众的西瓜园。那时天快亮了，我们也已困极和无法再行走了，所以，便在那里停下休息。过后被到西瓜园劳动生产的马来群众发现了。

由于敌军日夜都在附近的河上来回巡逻，并随时有可能到马来甘榜活动。为此，在不得已之下，我们只好把所有到那里劳动的马来群众都集合起来，对他们进行宣传与教育工作，向他们说明我们革命武装的性质，奋斗目标和军民关系，使他们不会害怕，至少不在当时去向敌军通风告密。

当时我们队伍中，能用马来语同他们作宣传教育工作的只有沈友贵一人，所以，此工作任务也就由他代表出面进行。工作看来做得还算顺利有效。所以，那些马来群众看起来也都不会反对我们，并没有人在当时去向敌军告密，过后反而还曾有人因和我军有此奇遇而感到自豪，不断向人称赞我们部队的纪律优良、严明，等等。

过后我们渡过文丹河到达山都望，再渡过山都望到达西林泽。在西林泽逗留了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再乘船沿诗巫劳勿河上达马当地区。

在那期间，自山都望乘船到西林泽时，在山都望大河上，曾经与敌军的巡逻艇正面相遇并擦身而过。由于我们伪装得当，而且行动带有出乎其预料的突然性，敌军一时没有料到和注意，所以也没有留意和阻拦，此乃不幸中的大幸。



在青山“攻击”行动 (Operation Hantam) 中两门大炮发射后，空气中硝烟弥漫。

“斯里阿曼”行动后的北加人民游击队

广平

历代的统治阶级，对他的反抗者，都以高姿态的统治手段，加以镇压。当今的时代也是如此。

一九七四年初，“斯里阿曼”行动后，当革命力量和人民武装大大削弱的情况下，统治者集中优势兵力，对我西部仅存的小小一支人民武装，进行疯狂的“围剿”、扫荡，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是七四年之前所罕见的。

我们这支小队所活动的山区（指马当山区），距离古晋市只有二十多英里而已，对统治者的心理，对外的影响是不利的。所以，统治阶级不惜一切代价，一举想要把人民武装消灭掉。动用大于我数百倍的兵力，再配合武装直升机、大炮，进行侦察、轰炸。地面部队、不断轮番搜索，每一条山垄，每一条水沟都不放过。它还利用反共突击队（其成员主要是叛徒组成），民防队化装群众进山活动，在山边或通道设埋伏。所以我们的营地曾有数次被偷袭。敌军还不罢休，利用西马资本家，砍伐森林，达到破坏、缩小人民武装的活动场所和范围，给我们部队的安全和给养，造成极大的困难。

在八零年间，在部队还未转移之前，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军事原则，处决在周边罪大恶极坏的分子，并警告一些坏份子，不要与我们为敌，也警告砍伐森林的资本家，并摧毁其木山营寨及车辆，（包括五辆拖拉机，山大王、修路车，爬山车各一辆）。

在群众方面，部队和群众本是鱼水关系。因此，敌军对山区周边的群众，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法，来分化群众。对粮食严加管制、封锁和断绝我军的粮食来源，妄图瓦解我军。

在群众中出现三种人。第一种是少数，是支持、拥护革命，但对革命工作顾虑重重，恐怕被敌军发现而招来麻烦与不

幸。第二种人，受恐吓，被诱骗和收买等，这种人占多数，对革命事业不支持，也不反对，用怀疑、观望的态度。另一种人是充当敌耳目，一有风吹草动，就横行霸道，气焰很嚣张，这种人占极少数。因此，部队在开展群众工作过程中，碰到许多困难，特别是要取得粮食更加困难，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例如：杨祖国、官木荣等牺牲的事件。

在这块山区要进行自力更生，就地取材，是不可能的，除了面对敌军的进攻外，这块山区，是个穷山区，对那些能捕获、采集的动植物少之又少。我们的经济又很缺乏，我们办的粮食，主要还是玉米，因白米采购比较困难，受敌军监视。为了节省经济和避免牺牲，我们不得不用野菜杂粮补充，如木薯叶、赤结、香蕉（包括它的皮）、猴头芭桔、山番薯等野生植物一切能吃的东西，都采集当粮食。有时玉米或白米受到潮湿、腐烂，照样拿来吃。

除了粮食奇缺，军服（青布）也很缺乏，真正一套完整的军服，在同志们当中是难找到的，补钉加补钉是平常事。有一次几位同志去见一家群众，当群众一见到我们同志，其中一个伯母来到尖兵同志的跟前，摸着这位同志褴褛的衣服，哭着说这几年你们辛苦得连衣服都没有好穿，於是她就到房间里拿一大包便衣给我们同志。还说，对不起，前几次没有开门见你们，因对你们不了解，请原谅。

我们每一个同志的“家产”是很简单的，很普通的，但却是很宝贵的，起着不平凡的作用。除了一支枪（是第二生命），还有一把刀、一双鞋、一块胶布、两个鸡料袋、打火机、指南针、地图和针线包等，这些东西数年来对每一个同志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相依为命的宝贝。

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九年，敌军不间断的、疯狂的对我们围剿进攻，使到部队面临许多困难，造成很大的牺牲和损失：比较有能力的干部和尖兵同志相继的牺牲，如：杨祖国、官木荣、黄志伟、武德、李开避、温燕林、小平等同志。还有两支小队在群众区活动全被打垮。在外边（指在七四年出去的）的领导人始终和我们断绝联系。群众对革命失去信心，用

怀疑、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在这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处境，我们活动的范围又受到严重的破坏和缩小，就地坚持是很不利的。从此，部队就开始大转移。

在八零年中，部队从国内转入边界印尼境内。从此又开始新的生活挑战。面对着没有群众的原始森林，一切都要以自力更生来解决，俗语说“后行军，先行粮”，粮食来源是当时一切问题的焦点。想到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在革命斗争年代，在延安，在所有的解放区，进行自力更生，搞生产运动，达到丰衣足食。人必胜天，就地取材，我们也来一个开荒种地，以自力更生解决粮食来源问题。从此，我们全体同志，用简单的工具，顶着挨饿、砍伐原始森林。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先后开垦五块芭场，种下了我们急需的农作物，如：木薯、番薯、芋头、玉米、薏米、谷子、甘蔗、各种豆类、蔬菜等。初时要取得这些农作物的幼苗或种子也不容易，是从遥远的群众区运出。在开荒种地的同时，又要去寻找野生果植物来充饥。面对茫茫的林海，何处有猎场和果子？都是陌生的同志们冒着迷路和在森林中过宿的危险，经过努力，困难都被我们克服了。在这原始森林里，能吃的植物很有限，野果是有季节性的。为了聊慰饿肠，为了生存，只要能吃的东西，我们都采集来吃，如：海柳叶、树菇等，油、米、糖、盐都很缺乏，同志们长期捱饿，更不必说营养，有一个时期大家的脚都软，没有力。

在全体同志的团结合作、刻苦耐劳，本着向部队和人民负责，终于克服了种种的困难，我们的农作物收成了，而且是大丰收。没有油、肉、鱼，我们就去打猎，寻找野猪和捕鱼；没有糖就把甘蔗提炼成糖；没有盐就到海边去煮盐。把收成的农作物贮存，作为战备之用，打猎的子弹也是自己制造。除了布和铁不能制造，其他都是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解决了。

初期我们也有办《革命》小册子，有定期开会、组会，在节日时开联欢会、谈心会，定时听广播（主要是北京联播节目和解放军节目），我们除了保持个人学习之外，也进行集体学习。在军事训练上，我们练射击、侦察、撤退及在森林中如

何求生存等。

总之，从国内到印尼边区，在这风风雨雨的岁月中，在历史的长河中虽是短暂的，但对每一个战士的生命，却占去了三分一，虽然我们头上增加了白发，脸上增添了皱纹，却磨炼了每个战士的意志，使我们对生命更加热爱，对生活更加发奋图强，艰苦奋斗。为了祖国和人民，在那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我们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再坚持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十二年的武装斗争，我们为自己的牺牲付出感到无怨无悔和自豪。

附录：

在一九七三年尾至七四年初，斯里阿曼事件后西部北加人民游击队剩下五十二人。

他们是：曾佩雄，杨祖国、官木荣、潘瑞汉、黄元兴、余世达、韩鹏发、吴志顺、苏亚扁、刘佑桃、黄桃妹、何水莲、温亚桑、陈惠莉△、温燕林△、陈亮△、叶润新、蔡新平、林玉平、田育淦、刘和海、官德添、刘水枝、李开避、池嫣丹、廖增胜、光英△、伟娥△、宝芯△、钟江红△、敬红△、古桂金、赖水俊、晓辉△、小惠△、继前△、方玲△、杨碧美、孟兰△、吴国荣、桂员、武德△、明鸣△、丹心△、起劲△、午劲△、方红△、郑美娥、黄玉莲、黄志伟△。（注：有三角形记号是别名）

五十一人中，

男 30 人，女 21 人。北加 - 27 人，西加 - 23 人。

投降：16 人。男 - 7 人，女 - 9 人

牺牲：16 人。男 - 9 人，女 - 7 人

存下：19 人。男 - 14 人，女 - 5 人

以下是牺牲的同志的时间、地点：

1. 敬红、宝芯、晓辉、钟江红、桂克。於 1975 年，石角区。（5 人）
2. 继前。於 1975 年，石角区。

- 3, 温燕林。於 1975 年。三马丹区。
- 4, 杨祖国、黄梁伟。於 1976 年 4 月, 石角葫芦顶。
- 5, 官木荣。於 1976 年 10 月, 伦乐, 诗拉央。
- 6, 温亚桑。於 1978 年初马当山, 舍狼。
- 7, 武德。於 1978 年中三巴里, 书呆里冒。
- 8, 李开避、杨碧美、陈惠莉。於 1979 年初马当山, 加央。(3 人)
- 9, 池嫣丹。於 1979 年三马丹边界印尼境内。(失踪)
- 10; 何水莲。於 1981 年三马丹边界。

下列是各队活动地区及其成员：(注：这是 1974 年初分配的，后来有些成员有调动。)

一，在三马丹边界，印尼境内有官木荣、黄元兴、吴芝顺、苏亚扁、蔡玉平、刘佑桃、温燕林、郑美娥、林峰、何水莲、刘和海、陈亮、韩鹏发、官德添、叶润新，共 15 人。

二，在马当山及三巴里山区有曾佩雄、杨祖国、黄志伟、赖水圳（存华）、丹心、黄桃妹、林玉平、武德、陈惠莉、杨碧美、刘水枝、李开避、余世达、田育淦、潘瑞汉、潘瑞清，共 16 人。

三，在朋里逊路十哩地区有：温华祥、池嫣当、陈万红、黄玉莲、吴国荣、孟兰、起劲、武劲共 8 人。

四，在石角区：廖增胜、光英、伟娥、明鸣、方玲、小惠、继前、古桂金、敬红、桂贞、晓辉、钟江红、宝龙共 13 人。

关于开辟印尼后方的工作的人员：

- 1, 1981 年派韩鹏发、郑美娥。
- 2, 1982 年派黄元兴。
- 3, 1983 年派潘瑞清、刘和海。

4, 1984 年派余世达、日峰、刘水枝、官德添, 以上的人员要搞经济和立足点。

在 1986 年由于被出卖, 在后方的同志, 全部被捕。

在 1986 年中同印尼政府、谈判达成协议。部队全部走出森林。北加人民游击队, 在西部结束了 23 年的武装斗争。在 1988 年底大马公民全部遣送回国。89 年全部被释放。

个人回顾

撼大地、泣鬼神的史迹

- 回忆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日子

— 王麦柯

阿桑山首创人民军队

1964年2月，在印尼外交部官员协助下，文铭权、黄纪作、杨柱中、黄纪晓，与我等十位同志，到爪哇岛东部一个秘密的军官学院接受军事训练，为期三个月。五月初结束后，在印尼外交部官员带领下，坐巡洋舰来到婆罗洲岛西端，印尼境内的巴罗河口下船，到巴罗河尾的一座山，此山叫阿桑山。当时由军训毕业回来的文铭权、黄纪作等10位同志与先到阿桑山来的50位同志，会合一共60人（女同志占10位），在1964年5月中成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有些书刊写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是3月30日成立，那是为了纪念1955年“3.30”学运罢课而追认的）。10位军训回来的同志为50位同志进行军训，为期6个月。1964年12月军事训练完毕。

1964年12月，首次派同志进入砂拉越国内，当时领导上派我和其他5位同志，由我带队进入国内，我们到了伦乐的加丁山地区，得到国内群众的热情支持。1965年1月初，我返回阿桑山。当时文铭权同志已经离开了阿桑山到坤甸去。1965年2月阿桑山的同志开展边区民族工作，并在印尼境内一座土著长屋叫巴都依丹的甘榜附近建造营房，有好些国内的同志及群众，越过边境来到巴都依丹营地，接受军事训练。

1965年4~5月间，黄纪作离开了巴都依丹营地，到坤甸去。该营地的工作后来就由杨柱中和黄纪晓（黄汉）负责。1965年8月间，这支部队后来叫第一支队，领导上在印尼山口洋调来张亚华，并委任为第一支队政委，副政委为官木荣（何士曼），司令庄其全，副司令为严立坚同志。1965年8月中，第一支队派了大约18位同志到双空地区去。他们到了双空后，和当地搞民族工作的同志，结合一道工作。当时在双空地区搞民族



第三支队活动地区简图

工作的同志以朱增仁（林亚林）、彭梦合（梁亚明），为首十多位同志，我们一共有 30 多位同志。

1965 年 9 月初，杨柱中、黄纪晓和我等人也离开了巴都依丹营地到山口洋来。巴都依丹营地的工作由政委和司令负责，同时配合国内的负责同志。

1965 年 9 月 19 日，在印尼境内的我们领导同志在坤甸某地召开会议（后来叫 9.19 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若干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有关我们军队的建立问题，决定把北印边区分为东西两部：从第二省到第五省为东部；而第一省边区为西部。把军事战略重点放在东部建立北加人民军，西部人民武装照旧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领导方面，以东部为主。东部以林和贵（林严华）和黄纪作为主要领导人。而西部则以杨柱中和黄汉为主要负责人。会议结束后，东西部的领导同志，各自分头准备开展工作。

1965 年 9 月 22 日，在山口洋的杨柱中和黄汉同志，由于还有某些事未办好，他们俩指派我负责，并在张立华协助下先带了 30 多位同志到华莪去。这 30 多人包括朱云辉、刘顺胜、黄祥明……。1965 年 9 月 24 日，杨柱中、黄汉带了 20 多人来到华莪，隔天开始军事训练。

1965 年 10 月 3 日，林严华带了 20 多人也到华莪来。由于印尼 9.30 政变，山口洋到东部的路线很紧张。林严华来到华莪后，杨柱中对林严华的突然到来，表示不满。但是为了大局，同志们还是一起参加军事训练，一共有 80 多人，正好男女各半，男同志 40 多人为一排由张德文当排长，女同志 40 多人由张立华当排长，大家一起训练。

上双空建基地

1965 年 11 月初，军事训练结束后，我们领导同志与印尼边防军参谋长谈商，得到他的协助，在华莪开设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办事处，由朱云辉同志为首的 10 位同志留守负责，其他 70 多

位同志一起上双空地区。

1965年11月尾，在双空山下的一个山坡，建大竹营房。在此，杨柱中宣布砂拉越人民游击队三支队成立。在会上，黄汉同志和林严华同志都发了言。

接着成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总部，领导在巴都依丹边区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和在士加央河流域的第二支队，同时委任张德文为第二支队政委、杨小杨为副政委、赖百佳为第二支队司令，杨柱中为总司令兼三支队司令、黄汉为总政委兼三支队政委，总部和第一支队联络工作由黄汉负责，总部和第二支队联络工作由杨柱中负责。接下来成立第三支队指挥部和第三支队司令部，同时第三支队指挥部提出主要工作和任务：

- 1、 搞好群众工作（民运工作）。
- 2、 积极展开生产工作。
- 3、 建基地。
- 4、 加强军事训练和学习理论。

在民运工作方面，以朱增仁（林亚林）和彭梦合（梁亚明）为首各带领 20 多位同志，向土著长屋进军，大队的粮食和农耕都得到了解决。

在生产工作方面：除了种菜和杂粮外，还砍了一百英亩山地来种稻，分别在双空山南面 40 英亩，称为 1 号芭；在双空与巴拔山之间在甘榜罗格附近砍 40 英亩山地，称为 2 号芭；在巴拔山下一条河叫 ANAM 河在河边砍 15 英亩称为 3 号芭；在巴拔山下砍 5 英亩称为 4 号芭，总共一百亩。在 1966 年尾，敌兵开始进攻双空基地时，在双空山南面的 40 英亩生产地也放弃，其他 60 英亩还有收成。

在建基地方面：同志们都很积极、吃苦，在 1966 年 1 月尾基地营房大部分都建好了，全体同志都搬进基地营房住。

在军事训练方面：基地操场建好后，同志们以轮流方式军训，当时第二支队的同志也有来三支队军训，有的军训后回二支

队，也有的留在三支队，晚上各班也有学习理论。

1966年1月，第一支队司令庄其全调来双空第三支队，同时加入第三支队指挥部和司令部。同年2月间，叶存厚、赵少华、当金（是印尼人印共人员）3人来到第三支队，叶存厚加入总部领导和第三支队指挥部。赵少华加入三支队指挥部。而当金为普通队员，后来经开会决定，黄纪晓的总政委和三支队政委职位就由叶存厚同志当任，黄纪晓做副总司令和第三支队副司令。

开始“围剿”与反“围剿”

1966年6月间，印尼兵来双空地区驻防，我方派朱增仁和另五位同志代表砂方与印方谈判，谈判结果印方要我方人员撤出印尼国土，否则捉到就杀。在这种情形之下谈判破裂。叶存厚下令撤出贸易站。几天后在双空搞民运工作的郭文忠和士能同志被敌兵逮捕并遭杀害。

1966年6月尾，叶存厚和杨柱中下令我调派20人以庄其全为指挥，主动出击敌兵的一个前哨站。攻打后，1966年7月中印兵从孟加央和华莪调大兵上双空地区。此时，叶存厚和杨柱中派人到华莪与双空地区的中间路段伏击敌兵。1966年8月尾，印兵进攻基地。此时总部开会决定撤出双空基地，大队撤到双空山与巴拔山之间的2号芭附近建营房，而叶存厚和他的警卫员黄乐山去朱增仁的民运工作队。自从叶存厚和杨柱中下令主动出击敌兵的前哨站后，叶存厚与林严华的不和就更明显与表面化。

1966年10月初，大队转移到巴拔山4号芭，4号芭周围都是榴连树和其他果树，去3号芭也不远，只须二十分钟路程，因此在粮食方面较容易解决。

1966年10月中，在4号芭召开总部会议，由林严华同志主持，提出了几个问题讨论。其中，对敌兵要打还是不打的问题，总部人员的意见不一致，后来召开总部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总部全体人员以及将要解散的全体指挥部人员，讨论到最后还是不能下结论。当时局势又紧张因此会议在没有结论之下休会。

从这个时候起部队领导层内的矛盾，更尖锐与表面化。

1967年2月7日，叶存厚等人召开“民主斗争大会”向林严华及其支持者批斗。开了民主斗争大会后，张亚华、黄汉、林严华、谢嫣素（谢秀玲）、文军、赵少华等领导同志先后离开第三支队，到中间站去，有的到山口洋等地去。而“民主斗争”还继续的进行下去，不过没有开大会，而是向林严华的支持者进行个别的批斗，被隔离到其他地区去。当时第三支队同志们的士气低落，有些同志对革命无信心，而离队。

1967年4月间，得到情报，敌兵要进攻巴拔山，因此我方派30人在半路伏击敌兵。伏击敌兵后，撤出巴拔山4号芭，这是首次撤出4号芭，转山头10多天，又转回4号芭。前后共4次撤出，几经周转最后又转回4号芭，其中有两次转山头时没有粮食，只好吃树叶、吃山番薯、吃老鼠、吃蛇，能吃的东西就拿来吃，过着饥饿的日子。

1968年2月间，是第五次撤出4号芭，也是最后的一次。此后，同志们再也不能返回4号芭来了。

战斗三天三夜

1968年2月某一天，和往常一样，站岗的站岗，工作的工作。早上大约7点钟，在4号芭ANAM河边渡头站岗的两位同志发现对面河边有10多个敌兵要过河，河边山坡上的小树在摇动，敌兵有多少不清楚，（这个岗哨24小时都有站岗）我们自己造的竹筏在岗哨这边，敌兵要过河只有找浅滩才能过河。

河边的岗哨离大队营房，用快跑只须3分钟。站岗的两位同志发现敌兵后，一位同志回大队通知政委和司令。敌兵来到ANAM河边，肯定是土著带路，同时也有备而来。杨柱中司令当即命令我派4位同志到河边岗哨去监视敌兵的动向，同时派一小队戒备。当时大队里的同志们都还没有出发工作，因此大家都备战。当岗哨同志回到河边时，有几个敌兵从浅滩的大石头上慢慢的走到河中间，河边岗哨的同志，就瞄准向敌兵开枪，枪声

一响，中枪的敌兵跌进河里，其他在河边的敌兵就开始向我方岗哨的同志猛烈的扫射，岗哨6个同志，慢慢的撤退到半路和在埋伏的同志结合。敌兵有的走浅滩，有的游泳过河。埋伏在河边到大队半路的小队，看见敌兵有的沿路走，有的没沿路走，我们只能打沿路走的几个敌兵，其他的敌兵照样向大队营房的方向前进。埋伏的小队马上撤回大队营房，安排在第一营房备战。大约一个小时后，敌兵来到了第一营房附近，距离第一营房大约有30米远的竹丛边。第一营房是叶存厚指挥。敌兵冲向第一营房，被我方同志用机枪扫射，有的倒下，有的退回竹丛边（那一带有许多手腕般大的竹丛）。当我方同志没有开枪时，敌兵机枪又扫向第一营房来，有时敌兵冲上来，我方又反击敌兵，大约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敌兵就向第一营房扫射一轮，伺机要进攻，我方给予阻击，一来一去的拉锯战。

当敌兵初到第一营房时，政委和司令还派3位同志到另一条小山垄去对敌兵的左面袭击，敌兵在没提防之下，被我方同志打个正着，有的敌兵倒下。敌兵发现左面被袭击，敌兵又向左面山垄扫射。因为那条山垄，山垄不大，又没有荫蔽物，不能久留，三位同志倒回来大队，同时向政委和司令说：他们发现敌兵大约有二排（60多人）的兵力。

敌兵坚持不撤走，同时也没有向大队其他的方向进攻，敌兵只是牵制着我们大队，也许是等援兵到来才向我们大进攻。

4号芭的营房是这样的：共有六间，是建在一条有许多小竹丛的山垄上。第一营房是建在山垄的半山腰，其他的营房是建在山垄上，当时第一营房是敌兵的目标，其他的营房也许还没有被敌兵发现到，第二营房和第一营房距离大约有50码远，叶存厚政委、杨柱中司令、钟桂友（张子海）、林广明（赖春）和我本人等都住在第二营房。第二营房也日夜防守着，如果敌兵冲上第一营房，在第二营房的同志正好向敌人右面打下去。第四营房是厨房，其他的营房都住着队员。

打了一天一夜后，敌兵还在竹丛边，没有撤退的迹象，后来政委和司令，下令准备撤上第二站，第二站是巴拔山的半山

腰。巴拔山共设有三个站；从4号芭上第一站，只须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第一站到第二站也是一个半小时；第二站到第三站即最后的一站，是巴拔山顶，要走二个小时的路程。每个站都建有一至二间的营房。后来司令指派我安排人员运粮上第二站。第二天开始运粮上第二站，除了防守的第一营房的同志和病弱的同志都一起运粮，一天可运两回。当时主要的粮食有番薯，还有一些木薯干，少许的豆类等。大家顺利的把粮食运上第二站。

在第一营房的同志与敌兵对峙了三天三夜，我们是以轮流的方式守着敌兵的进攻，当时同志们的士气都还很高。在第三支队唯一的一支重机枪也派上用场，它保护整个大队同志的生命。这支重机枪是当年三支队还没有成立之前，是第一支队的同志来双空地区时带过来的，是支旧式的机枪，是用子弹盒的，一支机枪要三个人扛，当时机枪手是曾文平，副手是陈伟清和黄忠平（杨的警卫员）。

在这3天的防守战中，没有同志牺牲，只有古玉光受轻伤，他的手腕被敌兵枪射到。这时同志们的体力和精神开始不足，因为几夜都没有睡觉，同时子弹消耗了许多。政委和司令等同志决定在第3个夜晚撤上第二站。第3夜下半夜两点多，第一轮敌兵枪射响，我方反击后，第一营房同志留下阻击，大队其他的同志，开始撤上第二站。第二轮敌兵枪声响，我方反击后，第一营房的同志开始撤上第二站。

当时，我和3位尖兵在前面，向第二站方向前进，其他的同志一个跟一个在后面。那时正好是晴天，朦朦的月色，透过参天古树照在地上，也觉得有些光亮，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还没有到第二站，敌兵枪声又响了，这时我们知道第一营房同志开始撤了，这时大队先撤的同志加快脚步撤上第二站。大约10分钟后，敌兵枪声又响。第一营房同志撤退时被敌兵发现，接着我们听到敌兵进攻第一营房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了好几阵，同时敌兵也向第一站发射迫击炮，大约打了十多发，一个一个都在大树梢上炸开。到4点多敌兵已追上我们后面的队伍了，我们只能边打边撤。后面是庄其全同志负责，前面是我负责，其他的同志包括领导同志都在中间，后面的同志迅速撤到一条山垄上。

这时我方居高临下，同志们各找隐蔽物，正面与敌兵开火。有的同志与敌兵距离不上十尺，近距离的对打。我方处在山垄上，因此有的同志把手榴弹的安全圈拉开让它滚下去爆炸，敌兵也被手榴弹炸死、炸伤不少。这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呐喊声，响成一片，硝烟弥漫，火光一片，双方大战，枪声回响几个山头。

我在前面带队，边撤边想，敌兵从4号芭猛追到第一站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撤到第二站，敌兵同样也会尾随到第二站来，因此我想不可撤上第二站，只有甩开敌兵为要。我跑去向政委和司令提意见，在敌兵穷追之下是否还要撤上第二站，当时在场的领导同志有叶存厚、杨柱中、张子海、黄祥明和林广民等同志，一起商讨如何撤退问题。在后方指挥对敌作战的庄其全在安排好后面作战的同志后，迅速的跑过来，说：“亚花同志牺牲了，亚花不知道敌兵已移向右侧来了，当场被敌兵打到”。当时是早上4点多，敌兵还不敢冲上来，只是枪声响个不停，双方打来打去。

政委与司令等人在商讨后大家都同意不要撤上第二站，要设法甩掉敌兵的追踪，但是要如何甩掉呢？当时我就向他们提出在一站与二站之间，有一条石壁小径可通到甘榜英加力的一片榴连山，我们只要把进石壁小径的路口痕迹清除好，敌兵是不会发现到的。大家同意后，大队马上动身撤，接着我把大队前面的同志向后退，进入石壁的小径，后面一个跟着一个，走过石壁小径。这里是危险的悬崖陡壁，若是真的跌落下去，也许骨头也找不到。这时已是清晨5点多，后面庄其全等人也慢慢的开始撤退。正巧这时李约汉被敌兵打到脚不会跑，战地医务人员陈秀珍同志赶快把约汉的伤口包好。在这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陈秀珍同志毫不犹豫地背起约汉，在后面庄其全等的掩护下一起撤进石壁小径。经两位灭迹高手伪装后不被敌人发现，整个大队安全进入石壁小径。经过一个多小时后到了榴连山，当时已是6点多，天已经亮了。大家在榴连树下休息，同时点算队员，点算结果除了亚花同志牺牲外，其他的同志全部都到齐。这时我们很清楚的听到，敌兵进攻第二站的枪声和手榴弹的声音，当时在第二站只有粮食，如番薯……等。这片榴连山的榴连刚跌完，满地都是榴连

，有些还可以吃，有的已经坏了。同志们已几天都没有好好的吃东西，肚子早已饿坏了，眼前现成有这么多的榴连可以选来吃，同志们都在选榴连吃了。这时陈秀珍同志说：“回忆过石壁那一段路，背着李约汉同志走过石壁，也没觉得重，真是不可思议！”

不久后，政委与司令叫我去，对我说现在要跑进巴拔山的南面的森林，甩掉敌兵的追踪，叫我带路。这片榴连山是巴拔山的西南面，是大山与子青芭的边缘，因此我们要向东南面跑就能进入巴拔山的南面的原始森林。

艰难困苦的日子

大队在榴连山休息后，接着就向巴拔山南面的原始森林前进，大约走了五分钟，后面的同志传来说雪姑同志（吴令雪）不见了。司令马上派四位同志到休息的榴连山去找雪姑同志，半个小时后四位同志回来说：找不到雪姑同志，也没有东西留下，雪姑同志就这样不见了。大队继续走，大约走了 20 分钟，前面有一片大石壁，同志们上了石壁后，到一条大山垄上。这时已是上午 10 点多，大家在此地小休息片刻，休息后又继续走到下午 4 点多，在一条附近有小溪的山垄上过夜。在此地住 3 天，在这 3 天里吃的是阿扁（一种棕榈树的芯）、野菇，少许的干粮如木薯干，由于怕敌兵发现到我们的住处，因此，找粮的同志不敢走太远的地方去，过着半饥饿的日子。在转移的过程中，有的地方住 3 天，有的住整 10 天。

这里是片原始森林，这个季节果子开始没有了，同志们只好以溪水来充饥，大家饿到脚都软了，走起路来跌跌倒倒，一小时的路程要两个小时来走。经过一个多月没有什么东西吃，遇到小溪，同志们除了喝水外，许多同志就如水獭般用手捉小鱼、小虾、螺等之类，捉到小的就直接放进口里去生吃，较大的就放进食格里，到晚上可煮来吃。在原始森林的小溪（石头的小溪）里，小鱼、小虾不怕人，对着你看。那时我也捉了小鱼、小虾生吃，吃在嘴里都没有感觉到味道。

有一次，大队转移到一条小山垄过夜。山垄下有一条小

溪，小溪两边有许多无肉的树种籽，像龙眼籽般大小，形状也像龙眼籽。有的同志就拾了很多，晚上就煮来吃，有的同志就吃整食格，吃得太多了，过后就晕倒。大约有 10 多位同志，因吃太多中毒晕倒，有的 3 至 4 小时才醒过来，恢复正常一样；有的晕了整 10 个小时后，才醒来。好像庄其全同志整个人就呆呆的，什么事情他都忘记了，像个傻子般。庄其全同志是我们的指挥员，如今变成了一个“傻子”，也就等于被敌兵杀掉了一个指挥员，庄同志直到牺牲都没有恢复正常。文开智同志（黄国敌）是宣教组成员，吃了树籽后，晕了三天三夜，后来全身冰冷僵硬牺牲了。我们把他的尸体埋在两边小溪，中间一小块陆地，附近有一丛黄竹为纪念。

在此地大约住了 4 天，我们又转移到另一条小山垄去住。派人去找粮食，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把它拿回营地来，如野芋苗、山香蕉芯、野菇，可吃的树叶等等，煮熟后分给大家吃，7、80 人，一人能分多少呢？有一次我和两位同志到附近的小溪拿水，看到溪边倒下来的腐树，有蚂蚁在咬腐树，我们也拿腐树来吃。在这条山垄住有一个月，大部分同志的身体已变形，成了皮包骨。有的同志本来体弱的，现在已不会走了，后来转移到另一处，一个小时的路程要 3 个小时来走。走了几天到一条山垄住下，在这几天转移的过程中，其中有一条山垄上发现了许多传单，那些传单是第二支队有些同志出来投降后，所写的传单，当时是 1968 年 5 月尾。老天不作美，天天都下雨，找粮的同志，个个都成了落汤鸡，冷到发抖，牙齿在打架，没有东西吃，天又冷，许多同志体弱因此生病。

自从与敌兵战斗三天三夜撤退之后，时常都有派人去和 250 民运队的同志联络。据民运队同志报告说：土著被敌兵镇压，全部都倒向敌兵去了，要从土著群众中得到敌人的情况是不可能的了，只有民运同志亲自去摸索。在这种情况下，民运队同志活动是很危险的，一来怕被敌兵发现，二来怕被土著发现。在那个时期，有的民运队同志被土著杀害。1968 年 3 - 5 月间，也有派人到中间站（火焰山部队）联络，政委派贝旺（外号大哥）同志到中间站去几次。据所知，打华莪飞机场后，当地的局势非

常紧张。敌人加紧镇压当地的华裔群众，并实行抢、烧、杀的三光政策，许多青年男女都跑进山，敌兵又进山追杀。

1968年6月间，在一条山垄上驻扎，又是下雨天，用树胶布和树叶做成的小茅屋，只能容纳5-6人，小茅屋时时都漏雨，睡又睡不好，吃又没有好吃，只有拿水来充饥。在那饥寒交迫、艰难困苦的日子，不时有同志生病而牺牲，叶存厚、黄祥明、杨柱中等同志，在一间漏雨的小茅屋里宣布吸收共产党员来提高同志们的士气，但是许多同志力不从心，枪支、背包都无力背了，走起路来脚已千斤重。

分两队反“围剿”

1968年6月间，叶存厚、黄祥明、杨柱中等同志决定把大队里的80多人分成两队。在队伍出发的前夕，政委叫我去他的营房，他对我说：“现在决定把80多位同志分成两队：一队由我和杨柱中负责，走的路线是1字形，一个月后在打望甘榜某旧稻芭会合；另一队由黄祥明、你（笔者）和林广明同志负责，走的路线是C字形，进入巴拔山南面森林再出甘榜打望某旧稻芭会合。如果我的队先到，我会派人跟你们联络。分队的目的是一来使敌人分散目标，二来容易找粮食，黄祥明同志这队由你带路，名单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早上出发”。政委把黄祥明这队的名单交给我，叫我通知他们准备明早出发。黄祥明这队人员有：黄祥明、王麦柯、林广民、陈长胡、亚德、赖依腊、马沙里、何德生、吴志武、何小强、李烈珍、林玛连、苏娜、陈为等、鲁林生、彭明珠、蔡红辉、郑爱明（印尼华裔）、贝小如（印尼华裔）、黄桂杏（印尼华裔）……等等。

隔天7点多，两队人员一起出发。两队按自方向前进。黄祥明这队大部分同志是病弱的，（在大队里称为所谓“拖累”的同志）。3个小时的路要一天来走，走了几天后有的同志已经不会走了。

有一天，转移到一条山垄上过夜，陈长胡同志对我说：“麦柯同志，我不会跑了，不要拖累你们，我自愿留下来，你们

继续走吧。在革命的道路上就是这样的，一定会有牺牲，以后全靠你们了。最后一定会胜利的，我没有什么可交代了。”长胡同志缓缓地，同时上气不接下气低沉的声音说了这些话，一句句都牢印在我脑海中，我把陈长胡同志对我讲的话转告黄祥明。黄祥明说：他要留下，就留下吧，我们继续走。当陈长胡同志对我说话时，亚德同志也在场，他对我说也要留下来。

隔天陈长胡和亚德同志就留下，没有跟队伍走，队伍继续前进到一条小山垄住下。隔天早上派两位同志拿一些煮好的野菜倒回去看陈长胡和亚德同志，发现两位同志都已经牺牲了。就把他们俩的尸体扛到一棵大树下，以树叶遮盖他们的尸体。队伍又继续转移到另一条山垄住下。当晚赖依腊同志对我说：“麦柯同志，我不行了，我留下在这里。天亮你们继续走吧，希望你们能和政委和司令他们会合”。隔天留下赖依腊……等同志，队伍又继续前进。到了另一条山垄驻扎，隔天拿了些煮好的阿扁芯倒回去看赖依腊等同志，看见他们又都牺牲了，强忍悲痛地把他们的尸体拉到较安全的大树下后，以树叶遮盖。

此条山垄驻扎有3天，在第4天早上大约7点多、8点，李烈珍同志和彭明珠同志到山垄下的小河取水，小河上方山垄就是岗哨。正当他们俩弯着身体拿水时，敌兵从小河上游而下，发现到他们俩，敌兵马上开枪扫射，两人当场牺牲。敌兵大约有一排，站岗的同志不敢开枪，怕一开枪敌兵就马上会发现到我们的其他同志，站岗的两位同志回到营房后，大家就准备撤退到另一条山垄去，但发现到黄祥明同志不见了。后来我和林广民同志商量后由林广民同志带其他同志到另一条山垄去，我带两位同志在后面掩护撤退；后来撤退到山垄上，一直到下午3点多，派两位同志倒回李烈珍同志与彭明珠同志被打的山垄去，发现敌兵已经走了，我们又把队伍撤回去，同时派四位同志分两路去找黄祥明同志。后来在另一条山垄找到了他，问他怎么会到那边去？他说当敌兵枪声时就跑到另一条山垄去躲起来。到晚上7点多，大家都没有吃东西，当时我安排人守岗后，经过贝小如和黄桂杏同志处，贝小如同志手拿一条大约3寸长一寸直径已去皮的木薯（已经变黑了，但是还不会坏，因为天气很冷）对我说：“麦柯

同志，今晚是不是吃这个？”我回答她：“我去问祥明同志，再来跟你们讲。”在那时每位同志讲话都无气力，简直是饿得天昏地转，形如骨头人。那段木薯就是最后唯一的干粮，再也没有其他干粮了，当晚大家把木薯切碎煮汤来吃。

天亮后，又转移到另一条大山垄住下，祥明、广民、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商量吃的问题，当时我和林玛莲、蔡红辉提出到3小时路程的谷仓拿谷，祥明同志不同意，理由是怕敌兵发现到我们的队伍，后来只好派人去找野菇和阿扁苾，这两天的解决饥饿方法，主要是喝水为主。后来再向祥明同志提出要去拿谷，这时包括广民同志也同意。这个谷仓的谷是当年在2号芭所采的部份谷，当时是由林玛莲负责带几位同志把谷藏在此谷仓，这个谷仓是在一条小水沟边，周围有许多大青藤，谷仓在中间。后来祥明同意派我、林玛莲、蔡红辉等4人去拿谷。当时我是不知道谷仓的地点，林玛莲同志说：只要找到那条小水沟，谷仓就能找到。后来我们4人按照方向出发，经过几条石头小河，最后找到了谷仓。但是大部分的谷都被老鼠吃掉，已成谷壳，后来在谷仓底部挖一些谷，我们每人只背几公斤而已（因为大家都没有气力了）。回到营地已是下午5点多，把谷分给大家用木棍敲去谷壳，后来把米煮成粥来吃，但是有的同志已经不会吃了，只能喝少许的粥汤。

过了三天后又派人去背谷，但是走了两条山垄后，发现敌兵走过的足迹。我们继续前进走到了谷仓，发现谷仓已被敌兵烧掉了。当时我们发现到敌兵是地毯式的搜山，无论是石壁，或是石洞，遇到陡石壁，敌兵就用绳子上，敌兵正好是向我们营地的方向搜去。后来，背没有谷，回到营地去已是3点多，祥明、广民和我商量后，决定明天早上转移到250民运组活动的范围去。10多位同志有的已经不能走了，隔天早上发现吴志武（吴福安）和马沙里（李玉祥）又牺牲了，我们把他们俩的尸体扛到一棵大树下埋了。郑爱明同志（印尼华裔）对我说：“王麦柯同志，我不走了，我自愿留下来，你们继续走吧！”

当时，45岁左右的何德生同志（丘南镇）以很低的声音对我说：“麦柯同志：我不行了，我不能跟你们走了，不要拖累你们，我留在这里。”他手拿一只手表和一支汤匙说：“如果你有

机会见到杨同志（杨柱中）把这个交给他。”我对他说：“如果我还活着一定会把手表亲自交给杨同志，这支汤匙你留着吧，也许还有用”。最后他对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交代了，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人民的。”后来我叫两位同志，把他扛到一棵大树下，两边大树根，风雨打不到。

我们又继续转移，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在山垄小路上遇到了 250 民运组的一位同志。他就是要和我们联络的，他带我们到一个小石洞住。隔天早上我们派两位同志拿一些煮好的竹笋，回到郑爱明同志和何德生同志的地方去，发现何德生同志牺牲了，而郑爱明同志不见了，至今下落不明。

我们住的这个小石洞是 250 民运组的地区，是子青芭，有许多小竹也有竹笋，是甘榜英加立的旧稻芭。据民运联络同志说：我们明天先到第一个民运组，然后才去政委和司令的地方。不过这段路很危险有敌兵出没，后来祥明、广民和我一起商量决定隔天早上 6 点就要出发。第二天早上 6 点钟，大家都准备好要出发了，但是祥明和广民还没有准备好，一直拖到八点多才出发。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前面是山坡，我们的队伍在坡下，突然间山坡上的枪声响，打向我们的队伍来。前面一个倒下去是民运队的联络员，我是第二个，迅速的伏下去，我向倒下的同志拉几下没有反应，我滚到左边的树林去，敌兵的枪响向我们打个不停，我们队伍走在最后两位同志也倒下去了，那是林玛莲（蔡玉花）和苏娜（黄金碧）在队伍中间的同志都向左边的树林散去（在出发之前已经先讲好了如果发生事情要向左边树林去，因为左边是 250 民运组活动地区，右边是大山原始树林）。到 11 点钟左右，林广民被敌兵捉去。这次被敌兵打，损失惨重，广民是北加革命政府成员之一，林玛莲同志是 125 中队第二小队队长，苏娜同志是在 1964 年当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成立时 10 位女同志的班长，后来到三支队是医务人员，而 250 民运队联络员杨小明（吴大维太太）是民运队医务人员。

被敌兵打散的其他同志，后来到当天下午 3 点多大家又集合，只剩下 8 个人，后来在一个旧稻芭边的子青芭过夜。隔天早上，我们就按跟民运联络同志所讲的地点走去。到中午我们找到

了该地点，但是空无一人。在该处原本是：鲁比海、陶玉清、林玛沙、林雪清 4 人，是 250 民运队的一个小组。现在 4 人下落不明，后来我和祥明同志商量后，决定按照方向去找政委和司令的队伍。经过许多小山垄和小山沟，最后终于找到了政委他们，那时已是下午 5 点多。一个月前黄祥明等 20 几人出发，现在回来只剩下 8 人，他们是：黄祥明、蔡红辉、陈为等、鲁林生、何小强、黄桂杏、贝小如和我。

战斗到底

1968 年 11 月间，整个第三支队除了民运同志外，大队只剩下 60 多人。大队领导同志时常都有派同志，去旧稻芭找粮食和侦察敌情。有一次朱增仁和杨思珍同志（曾玉兰）要到某个地点，走到半路被敌兵袭击，朱增仁同志当场牺牲，而杨思珍同志则被捕。

1968 年 12 月尾，大队住的地点又被敌兵袭击，赖耕耘同志的肚子中子弹，她对杨同志说：“我不行了，把我的枪和子弹背包拿去……”话还没说完，接着胸部又中弹，而牺牲了。此次被敌兵袭击有 8 位同志牺牲，他们是：黄祥明、钟桂文、贝旺（外号大哥）田志峰、赖耕耘等 8 位同志。

1968 年 12 月尾，有一次在旧稻芭侦察敌情的同志被敌兵袭击，牺牲了几位同志，林亚曼同志（廖福生）是牺牲者之一。

当时大队领导同志，派同志出去侦察敌情，有的同志出去也没返回大队，因为有的被敌兵袭击牺牲，有的被敌兵捉去，有的被土著杀害。被敌兵捉的有：刘玉明、张亚国、陈新华、林巴利、陈美华等。被土著杀害的有：张子明、宋小英、陈维达等。

1969 年 1 月尾，大队要转移到另一条山垄去，不知何故没有准时出发，拖了两个小时后才出发，走到半路在山坡下，被山坡上的敌兵开枪扫射，会跑的同志都安全撤退到某个地点去，现场留下几位不会跑的同志，被敌兵活捉去。他们是苏明、秋妹、李惠娟和李黎扬 4 位同志。

1969年1月底又一次被敌兵袭击，同志们冲散了，叶存厚带一队朝一个方向，杨柱中带一队朝另一个方向。隔天，杨柱中这队派高举同志去找叶存厚那队，高举同志找到了叶存厚同志队伍后，要倒回杨柱中这队来，走到半路听到枪声，杨柱中这队被敌兵袭击，当时高举同志加快脚步跑回杨柱中的队伍去，跑到后，已有蔡红辉（蔡里胡）、魏廉斯（曾康胜）几位同志牺牲了。后在高举同志的AK15枪的掩护下，杨柱中等人撤退，由高举同志带路来到叶存厚这队集合。

1969年2月间，叶存厚同志有时还派同志到4号芭一带找粮食，有时派同志到巴拔山二站一带仓库拿药和绷带之类（小仓库只放药品之类）。当时整个大队人数还有30多人，是在250民运队工作范围内。这个地区已被敌兵包围，这时政委叶存厚同志才深切领悟，只有突出包围圈，才有生路。但是已太晚了！剩下30多人，有一半同志是病弱的，行动都非常困难。为了其他同志更灵活的转移，那些病弱的同志，要求领导同志把他们留下来，可是领导同志，坚决不同意，表示绝不能白白看着这些病弱的同志在森林里自生自灭。就说：“要死，一起死吧！”因此决定不分队突围，继续一起突围，宁愿一起战死在沙场。当时大队已被包围，敌兵时刻都来袭击，土著群众看到我们同志就杀。

1969年2月尾，叶存厚安排10位病弱的同志，到一个认为比较安全的地点住，由坚利同志带队，他们是：何小强（温秀枝）、候赤壁（候赤妹）、杨玲扬（杨柱英）、陈秀珍（洪秀）、陈秀华（洪秀珠）、贝小如、黄桂杏等10人。出发后走到半路，被敌兵袭击，整个小队全部牺牲了！

1969年2月尾的某一天，叶存厚派几位同志到4号芭谷仓拿谷，他们来到4号芭附近谷仓，背了谷准备回队，走到4号芭上第一站的山垄上，被敌兵袭击，彭梦合同志和高举同志（蔡高）当场牺牲，其他的同志成功回到大队。

1969年3月中，整个第三支队的同志，有的被敌兵枪杀，有的被活捉，有的被土著杀害，有的饿死和病死，最后只剩下8位同志。他们是：政委叶存厚、司令杨柱中、张立华、陈梅

枝、伊沙、唐秀妹、陈水和、陈新汉。8人之中杨柱中的小腿已受伤，但是还能走路，其他的同志也能走路，后来转移到旧稻芭的一间小茅屋住。

在1969年3月某一天，他们8人要转移到另一处去，当时陈新汉同志先到屋外看是否有敌兵，其实敌兵早已包围了小茅屋，陈新汉同志就开枪打敌兵，但是枪打不响。这时叶存厚和杨柱中走出小茅屋外，敌兵就向他们两人开枪扫射，两人当场倒下去，张立华同志是在杨柱中同志身后，她推拉杨同志没有反应后就把杨柱中同志的AK15拖拉下来丢给陈新汉（曾永光）同志。陈新汉同志接过枪后，马上就向敌兵扫去。与此同时，叶存厚同志的肚子也中弹，当时他一手按住伤口，一手指着他的背包，因为他的背包里有他的重要文件和日记簿里有很多重要的血史记载。但在那紧张的关头，同志们没能力拿他的背包，后来被敌兵拿了。6位同志终于撤出敌兵的追击，但是砂罗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政委和司令叶存厚同志和杨柱中同志誓死不举白旗，顽强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的英勇和顽强、誓死战斗的精神，永远留存！

1969年3月尾，剩下6位同志他们是：张立华、伊沙、陈水和、陈新汉、唐秀妹、陈梅枝。几天后他们又被敌兵追击，又牺牲了陈水和同志和唐秀妹同志。这时只剩下4人，他们为了找粮食又到稻芭一间小茅屋去住。陈新汉同志已不大会走路了，他留在小屋里休息，其他3位同志去找木薯，3人走到半路又被敌兵追击，陈梅枝同志当场牺牲，张立华同志和伊沙同志跑回小茅屋来，但是陈新汉听到枪时就马上离开小茅屋荫蔽到另一个地点去。木薯拔不到，陈梅枝同志又牺牲，新汉同志又见不到，张立华和伊沙两人只好撤向4号芭。

1969年4月间，陈新汉同志被敌兵活捉。大约同年5月间，张立华同志和伊沙同志也被印兵活捉，当时她们几乎没有力气走路了。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就这样全军覆没……。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史迹，给人们留下既英勇顽强，且悲壮惨烈的回忆，也深值得去探讨与总结这一段血泪史。

写于 2002 年 7 月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5位队员是战斗到后期的幸存者：
后排左笔者、中曾永光、右曾云锦
前排左陈金贞、右王美銮（余秋兰—伊沙不在镜头内）

第四省同志上印尼边界

李南春口述 江涵整理

当年汶莱人民党有几万的党员与支持者，也不乏有其党员与支持者在砂罗越各地。在汶莱“12.8”起义之前，领导同志曾指示我们去实务地(Sibuti)开展工作，并联合与领导那里的人民党势力，共同开展革命斗争。1962年12月8日，汶莱人民武装起义后，第四、五省一些地方也进入紧张状态，多处宣布戒严，紧接着英殖民政府进行法西斯大镇压。在美里，同年12月12日，一举就逮捕了陈胜新、李云南、江柏林、许美雄、黄纪邻、黄志雄和贺雪豪。

根据形势的剧变和迎接新任务的需要，领导上取消指定我们去实务地的工作计划，改为派我们去印尼边界。凭着当时我们对革命组织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热爱，我们无条件服从了领导上的决定，对指定任务的执行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

1962年12月8日，在美里举行砂罗越人民联合党美里支部成立庆祝两周年之际，就发生了汶莱人民爆发武装斗争的事件。那时，天上直升机紧张往返运兵，地上兵车隆隆响，荷枪实弹的英加兵、英联邦部队和其他兵种，在街上要道巡逻与设岗，从此白色恐怖阴云弥漫大地。我们还听说政府还会捉人，还会在那里那里戒严，谣言纷纷，风声鹤唳，搞得人心惶惶。为了避免沦为阶下囚，我们做了一定的撤退，转入了荫蔽活动。

局势紧张，时间急迫，任务在身，我们不能作很多的考虑，必须赶快上路。古春辉、钟吉祥、李旭同、钟带友、林万森、黄进茂和我，共7个人集合在一起，大家商量研究后，就准备起程。我们带了一支猎枪（没有执照，还会卡壳）、炊食用具，一些干粮、米、菜和药品，带有个别把“巴冷刀”和各自随身用的简单衣服。汶莱事件几天后，我们7人就从廉律(Riam)出发上路。

林万森拿着地图，对着指南针，走在前头，带领着我们行进在还有一点印象的森林里。我们大多数没有进过森林，也没有走这么长远的路途，所以走起来特别吃力，走得大家气喘吁吁。下起雨更辛苦，没有雨具，淋得全身透湿，走走停停，停下时就会感到冰冷。晚上宿营，没有搭帐篷，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讨厌的蚊子又来疯狂地进袭，难以入眠，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就这样，在森林里，走了两个白天又过了两个夜晚，估计到了巴功(Bakong)一带。

至此，我们要断粮了，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搞粮。在商量后，钟带友自认为认识当地群众，便要我与他一起去长屋找粮食兼了解情况。上了长屋，我们跟屋长说，我们是木山工作的，要到附近跑跑看看。他应诺了，并接待了我们，给予住宿一晚。

当时我总感觉情况不妙，但并不知道附近一带已有兵在活动。翌日，我跟屋长讲，我丢失了身份证要倒回森林去找，他也说好。其实，我倒回是要去找潜伏在附近的 5 位朋友。我见到李旭同就跟他说，情况似乎不好，若在限定时间里，我们没有回来，你们就撤退。

原来我们的事已失风露馅，回到长屋却发现钟带友已被捕。长屋的人跟兵讲：还有一个。结果我也被捕了。我们俩先押到马鲁帝(Marudi)，在该镇机场还晒了一天。稍后下到美里，再被押往古晋，送入监牢，至到 1974 年 1 月 22 日才释放回家。

在限定的时间内等不到两位同志回来，潜伏在附近的 5 位同志就取消了继续上印尼边区的决定，改为走回头路。他们沿着河流方向，排除各种艰难困苦，才回到了美里。

另据当时在马鲁帝一带搞地下工作的龚世兴说，他得到上级通知，他要带粮食去巴南与巴功之间的一个地方去接应他们。於是，他叫舅舅的一个印尼工人带路，背着粮食，拿着“巴冷刀”从新开发的福州人树胶芭进去。到半路他叫工人倒

回，自个继续前进。那时天上有时直升机飞过，给人直觉局势紧张。当它将飞到他头上空时，他就钻进草丛躲避。他沿着森林边走到最后一间空屋子。他就在那里等，一直等到天黑，不见有人之踪影。在空屋过一夜。翌日，天一亮他就返回走，走了六个小时才到巴南河边。

时光如流水，转眼间这一历史事件已过了 40 年。想当年第四省一批同志虽然想上印尼边界参与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愿望，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他们当年那种革命热情和敢闯、敢实践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阎王殿前潇洒走一圈

—参与“10.28”战斗的回忆

力争口述 梁娇芬执笔

1971年10月28日凌晨四点，我们刚搞好群众宣传工作就接到通知战机来到！於是赶来参加战斗。

战场是一间在岔路口的空屋。此屋靠着山坡建，客厅是高脚的，而厨房却“坐”在泥土上。由于这间空屋时常有兵进驻，所以同志们预先已埋好许多土炮、地雷在客厅楼下，而厨房由于地势所限，没能埋雷。

我们二十几人共分两组：主力十人隔着一条小路埋伏在空屋对面，埋伏点是高出路面一层的山坡，离空屋仅十米左右；另一小组与我们成‘L’字形埋伏在大路对面。按我们的计划是想打一场缴获战，打完战天蒙蒙亮就可以打扫战场。

时间一到，刘队长一声令下“炸！”在轰然的爆炸声中，强烈的火光猛然由地上升起，把屋顶掀开。紧接着枪声大作，由我掌握的机关枪同时也扫射起来。这时躲在厨房的兵有的从窗口跳下，有的从后门冲下，一些竟躲在我们眼皮下的路边死角，（可见他们对当地的地形的熟悉），斜向上不断抛手榴弹，第五颗就落在我旁边的机枪助手泽红的前面“噗！”一声。“手榴弹！”我喊了起来。泽红身后刚好有一棵较大的树胶树供他隐蔽，而我要带着二十斤重的机关枪（加上身上的子弹匣就更重）在刹那间退回已来不及。想到“人在机枪在”，我飞快地扑向枪。然而，在我还没有完全扑下时，手榴弹爆炸了。我知道身上已多处受伤，可奇怪的是没有痛楚，再看看左右，近旁的除了泽红完好外，小平、雄志也相继挂彩了。

明了自己失去了战斗力，把机枪子弹匣里仅剩的一颗哑弹放进口袋里。将那挺把柄被手榴弹削掉的机关枪交给泽红，由他转交刘队长处理。队伍再坚持一阵，在指挥员的命令下，开始撤退，不能走的伤员由同志们分别背上（注）。这时我的

吊带已被同志们取去，人高马大的泽红过来把我背走。

队伍在芭里撤退，越过小桥，斜切向大路，同志们想在天亮之前抢过大路。谁知道在大路上遇到了阻击。一轮驳火后，队伍散了。泽红背着我折回小路，（小路与大路平行）。连续驳火非常耗体力，何况我身负重伤，有没有生还的机会都不懂。为了不想连累他，我要求他放下我去追随大队。但阶级情深的他就是不肯，继续吃力地背着我越过小路，走向较深入的胡椒园。到这里他也实在累得步履艰难了，何况天已大亮，我们俩手上都没有枪，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才无奈的把我藏在胡椒园边的“龙基”草丛中，灭好痕迹，他朝另一个方向故意踩出一条明显的路来，以便引开追兵。

泽红一走，我也不知是累极还是昏迷，就此失去知觉。等我睁开眼时已是傍晚时分。这时由远而近传来了脚步声，我不由的心跳加快。我手无寸铁啊，别说枪，连一把刀都没有，何况下半身已动弹不得，要是给对方发现怎么打？我不愿被捕，想起来唯有死命咬住对方不放，迫使他杀死自己。转念间，脚步声已到跟前，头上的草叶子颤动不已。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但到底他们还是没有发现我，直追着泽红的足迹而去。

这时喉咙渴得要冒火，可是我一无所有，只好摘一片树叶卷成漏斗状，接自己的尿来喝。尿里竟然渗血，原来连睾丸都受了伤。

到现在我才有力气检查伤口：脸上有几个小伤口，左手臂伤痕累累，左大腿也多处受伤，左小腿的伤最为恐怖，密密麻麻的像蜂窝似的，足三里处有一个深坑透至后面，至今一块大弹片还卡在腿弯处委中穴的地方（其实手臂、腿等处至今还留有多颗小弹片），右脚板被弹片削掉一大片，深可见骨。这时，我发现一片钩状的弹片卡在骨缝间，於是自己动“手术”把它取出来。当时我并没有发现胸部心脏位置还有两个弹孔，还是在第四天感到呼吸困难时才摸到的。这两个要害有幸是口袋中的《毛主席语录》挡住才没有深入刺中心脏。

怎么办呢？我身上一无所有，有的是千伤百孔，下半身失去知觉，形同瘫痪，敌情又这么紧，只要不死，我就应该挺住。于是我开始在芭里爬行，左手伤了，根本使不上力，只能靠右臂拖住身躯前进。此后的五天里，我几乎是没日没夜、没吃没喝、没眠没休的爬行，为的是突出一条生路。在杂草、藤蔓丛生的芭里，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爬到附近一个我们废弃的旧营寨，在那里我只找到两颗腊丸果（汪丹）裹腹。失望之余，只好把目标改为群众。于是我转向菜园爬去，别看这短短的路程，我竟然拼了两天的时间。可是到了菜园边一看，到处光秃秃的没什么隐蔽，又是沼泽地，群众不断地从小路进出，我只能干着急而无法招呼保干群众。

下午三、四点时下了一场大雨，冲掉了我留下的痕迹。雨后我沿着小路向驳火地点前进。到了半路，拐向大路边。凌晨时分到达一间屋子前，我喊了好一会儿，一个妇女慌慌张张的出来开门，看见我大吃一惊，一直挥手叫我走。她心有余悸地说她的丈夫被打死了。我向她讨饼吃，她说没有，只给了我一碗水，这是五天来我第一次真正喝到水。离开了这里，我越过大马路到对面一间空屋子。这时天已将亮，我喝了楼梯口的洗脚水并且冲个凉。在屋旁我发现了一个鸡蛋就将它生吃了。接着我爬进屋旁的草丛里休息。

当我睁开眼时发觉这天的雾特别浓，连近在咫尺的草都看不清楚。可是当太阳爬上头顶时，还是一样，我才觉得不对劲，这根本不是雾，是眼睛出了问题。这时手脚都不属于这个身体似的，连举手这样简单的动作都要费很大的劲。

就这样维持到第七天的早上，传来了“笃笃！笃笃！”弹舌的暗号声。当我确定是自己人时，心理不知有多高兴。我的身体虽然软弱无力，但嘴巴还能回应，眼睛虽然看不清楚，但尚能辨别来人是保干群众阿姆带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阿姆钻不进草丛，只好由小男孩传递食物。当吃下两块果子糕和喝下一瓶‘美禄’后，肚子就胀得难受。就在当天傍晚，三个同志冒险来把我背走。这一走，大概是意志松懈下来，我整个人迷迷糊糊了起来，也不知过了多少天，才从昏迷中醒了过来。至于同志们怎样为我紧张，怎样为我那超乎寻常的伤口医

治，我一无所知。

独自在芭里的七天中，本来就满身血污，加上这么多天在杂草、藤蔓丛生的泥地里爬行，我整个人要多脏有多脏，而身上的衣服也几乎被磨破光了，右手肘更是早已脱皮了。不管到那里，苍蝇像倾巢而出的蜂群似的嗡嗡叫着围住我不放。它们在我的身上到处下卵，甚至是整团整团地下。我只好摘根树枝来驱赶，但体力实在有限，加上苍蝇实在也太多了，根本赶不了。从第三天开始，许多伤口都长起蛆虫来。离手最远的脚板上的大伤口尤其多（蛆虫钻肉本来是很疼痛的一回事，可是当时我已麻木，失去了感觉）。

在这一星期的时间里，我仅在第五天凌晨两次真正喝到水。下雨时，只把嘴巴张开接受几滴水，平时都是喝自己的尿，由于严重缺水，尿都咸得难以进口。

在寻找生机的过程，我曾爬过一座独木桥。这实在是一个考验：由于下半身瘫痪，左手又受伤，能使力和平衡身体的仅是右臂而已。我准备万一掉下河里，就试着单手游过对岸，所幸我终于顺利爬了过去。

过马路必须快捷。平日尚且如此，何况正处于戒严期间，随时有兵车或步兵巡逻，而我爬行的速度异常缓慢，又是在战场附近，危险性非常大。为了争取时间，我只好翻转身子像滚葫芦似地滚过路去。

回营地养伤一个多月才能下地。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必须依靠拐杖才能行走。

伤好约一年后，我与几位同志一起被雷殛，臀部及腿部严重灼伤。“体无完肤”这句话应用在我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犹记得“斯里阿曼”行动出来后不久，某医生曾睁大双眼“惊叹”于我身上伤痕之多。这是后话。

【注】这是一次非常不顺利的战斗，共有四个同志牺牲：即苦练（邓伦平）、雄志（刘庆锐）、民军（张孔喜）、小平（卓天平）；八个同志受伤：即力争（林启钦）、葵花（李莲娇）、铁忠（刘耀光）、8号、克勤（陈光辉）、忠民（卢春新）等。

拉让江第一次越界到印尼

—余清勇口述 弘扬整理

1962年初，我积极响应组织的“向民族区进军”的号召，踏上了中游地区，跟吴云宜同志（注一）一起在卡地巴斯（Katibas）河一带搞伊班民族工作。

汶莱“12.8”事件后，英殖民者采取蛮横无理的大逮捕行动，实行法西斯黑暗统治，迫使我们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印尼“抗马援北”的政策下，第一、二省同志纷纷越界到印尼去积极准备武装斗争。那时作为第三省省委负责伊班民族区工作的黄新汉转达了组织上的决定：派我们开路上边界，跟在印尼那向活动的同志结合，打通一条第三省国内与印尼的通道，为往后边界与国内开展武装斗争积极创设条件。当任务完成之后，江先芳同志（注二）就留下，其他四位就倒回出发点。

这是一条充满未知数、从未走过的路，路线要怎样走，要走多久，能不能联络上同志…胸无成竹。我们只是凭着胸中有伟大的理想，和革命的热情，大胆地接受了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那是1963年，组织上派了江先芳同志来带领我、吴云宜和另两位当地的革命伊班群众作响导（其实他们只懂卡地巴斯河尾一带）。我们五个各自背上了“拉龙”（伊班人的背篓），装进了个人的必须品，一些罐头、盐、几筒米和雨布等。另外，还配上“巴冷刀”，作为防身和开路之用，其中一位伊班群众还背上了一把猎枪。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大胆地从卡地巴斯河尾出发。

出发点一带两位伊班群众还可以带路，到了更深入，我们要靠指南针和地图。走在终日不见阳光的原始大森林里，凉风习习，鸟鸣猴叫不绝于耳，稀奇所见，总觉得森林的世界有

不尽的奥秘需要我们去探究。没走几天，我们仅带的一些罐头与干菜都要吃完了，只能靠钓鱼和采些野菜当菜。正在青黄不接之际，我们幸运地打到山猪，大家兴奋地大快朵颐。

在森林里，炊食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习惯在森林里打猎、采摘的两位伊班群众，要起火先把干木削成一堆小片，点上火再慢慢堆叠上较大的干木，就会燃起旺烈的火焰。再在呈四方形的四根桎像挂上平行的四条木棍，横挂上穿棍的饭锅，不到一句钟就可以吃上香喷喷的饭，比现在电饭锅煮的饭要好吃。

行行复行行，我们涉过一条又一条的大小河流，爬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跑到边界高山越来越高，我们经历艰辛，才爬上三、四千尺的高山，什么时候越过印尼边界我们也不知晓。下埜走了一段河后，根据地图与指南针对照判断，我们断定已到了 Tekalang 河的河尾。由于河岸陡壁难走，我们讨论了认为用木筏代步更快捷妥当。

於是，我们在河边扎下营，花了一天的时间用轻木制成一个长方形的木筏，它的浮力还超过我们五个人加上随身物的重量。每个人准备一条 8-9 分大、7-8 尺长的木竿，作为撑木筏之用。行驶时，关键的是前面控制，后面掌舵，大家要配合好。在水深处撑不到底的，我们就用树木做的浆来划。Tekalang 水流湍急，还好那些日子没有下雨，倘使下阵雨，山洪爆发，就会像脱缰的、狂性大作的万马奔腾而下，人跟木筏不知会被激流冲到那里去！

沿途两岸奇石磷峒峭壁凌空，各种植物花草，都在国内难得一见。行驶没多久，遇到了百丈高的瀑布，我们只好放弃木筏。我们攀岩爬壁绕过瀑布后，重新再做一个木筏，继续行驶。

千辛万苦，出了 Tekalang 河口，沿马罗河顺流而下，大约离出发十多天后，我们到达马罗河最后一间长屋 RH

Tunguh。在这里，我们了解了情况，过了一个晚上。次日上午补充了粮食，继续顺流而下。

到了 Martinus 我们联络上印尼官员。那时的印尼苏加诺政府和印尼共是支持我们的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事业的，因而，我们到此也得到他们的协助与给予方便。印尼官员带我们下到它所管辖的 Putussibau 去办手续。印尼官员安排我们改乘搭 Landen（印尼语，一种船用三条船连在一起，中间一条有引擎发动行驶很慢。另二条船不发动引擎，据说是为了避税。）

由马罗河支流出主流卡江(Kapuas)一星期后，我们顺利达到坤甸。

在那里，我看到洋溢热情、充满斗志的外省来参军的青年同志们，他们在坤甸—山口洋之间上上下下，他们积极参加文化学习、政治学习、军事学习和还有参加劳动生产。我们同志个个正在练好本领，正准备建立自己的部队，准备将来打回老家去，解放北加。我有幸能遇到这么多同志，跟他们战斗一起，对我来讲是莫大的鼓舞。

在西加的负责同志接见了我们。根据新情况，我们不能按原订计划实行，得改变新的计划：江先芳与吴云宜同志留下，我得上马罗河尾 Lanjak 一带搞伊班民族工作。那两位伊班群众也跟随我上去，后来他们就留在 Lanjak 一带定居，不回 Katibas 了。

初期，我独自住在 Rumah Ngaung，跟伊班群众搞好关系，跟他们劳动生活在一起，也进行必要的政治宣传。不久后小燕与建国同志先后来跟我一起工作。而另一组在马罗河(Maro)口一带工作，则由吴云宜、育汉、赖学建（李山）、黄尔兴（友如）和李安五个组成，不久又有许广金（巴乐）、新星和 Ah Mei 三位加入。民族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吴云宜同志。到了 65 年 10 月 26 日，宣告成立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我们这些民族工作者也参加了北加人民军的成立。我军成立之后，我们得到人力的加强，继续搞民族工作。

1968年，拉让江地区在洪楚廷的领导下，组织了几批同志越界去印尼参军。1963年，我们开通的路线总算发挥了它的作用。叶俊杰和何瑞英从国内往返印尼边区一趟，我就充当了他们的响导。

（注一）吴宜云烈士，部队名做吴昊，家住在诗巫的侨南坡。他去了边区后一直在印尼境内搞伊班民族工作。进到中游后，仍然活跃在伊班群众当中跟他们打成一片。他的政治宣传和鼓动性很强，很受伊班群众的尊敬与爱戴。

由于活动一定的暴露和拔木薯的路被猖狂卖力的当地民防队跟踪到营地（在Sg. Poi的Sg. Bilat）的对面。当晚同志们在准备拥军的文娱节目，造成声响被民防队听到。翌日（1973年6月20日）清早，由于没有站岗，同志们正要吃早餐时，敌人就从背后突然袭击来，造成吴云宜、张登昌（斗争）、李凤（Imbat Ak Akam）和奴利（Suda Ak Glat）中弹牺牲。

（注二）江先芳，部队名做叶子华，诗巫广宁人。在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第三支成立时，他是担任第三支队的副支队长。据说，他跟爱人秋华和战士彭永辉三位在KP. Trobas（在打马庚还要上接近打必禄一带）一个姓黄的华族家替群众医病，在当晚吃饭时遭到民防队的袭击而全告牺牲。

第一省最大批的一次上边界

彭梦意口述 腾飞采访整理

1963 年决定开展武装斗争之后，砂拉越有几百名热血的青年越界到印尼去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从第一省去印尼的少部份是从水路去，大部份是从陆路去。陆路大部分是从打必禄(Tebedu)附近一带的 Emtubu 和 Padawan 的山路越界，少部份是从石隆门(Bau)的士里京(Serikin)一带过。

1963 年 5 月组织上决定派 58 位革命青年越界去印尼。这一批的越界者有蔡瑞庆、温国宏、朱云辉、彭梦合、刘顺胜、黄祥明、刘天甲、庄美祥等，他们大部分的是来自人联党晋成路 24 哩分部的党员。这一批的主要领队是温国宏。

5 月 29 日下午，要去参军青年先后来到了 23 哩集中，个个满腔热血、精神抖擞，但又恋恋难舍。为了祖国到处都是春天，要离开你，要离开亲人，要离开……，到远方去。

大家集中到齐后，傍晚 6 点多，队伍就从木瓜山出发。从出发点到边界基本上分三段路，第一段路是由张伟琴、涂灯亮和我三个带。从木瓜山到 Tabut 是靠自己开路。从没有路的草丛树林中开出一条路来委实不易，而且又是亮着手电筒在黑夜中探察开路。当晚天空晴朗，凭借着闪烁的星光和朦胧的月光，没带手电筒的同志紧跟在后面，一个紧跟着一个，排成一列长龙，从头到尾闪烁着亮光，委实壮观。到了 Tabut 以后，就有达雅人的山径可走，行进的速度加快了。再走了一段路后，我们到达了有 30 多户的 Kpg. Kilian。我们尽量荫蔽不让人撞见。走着走着速度越来越慢了，虽然我们各自只带几件衣服和一些简便的必需物，但毕竟我们大多数没有行走过这么长的路途，特别是到了下午半夜感到疲惫又爱睡，有的边走边打盹，有的跌倒爬起来再走，有的实在不耐了就站一阵子或坐一

会儿再走，休息时有的就索性躺在泥土上。尽管路途多遥远，路途多坎坷难走，凭着大伙年青力壮，凭着一颗为解放祖国、为人民幸福的红心，大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坚持前行。东方破晓，大伙跌跌撞撞地，抵达了 Subong 山。

30 日白天，我们在 Subong 山休息，等待夜幕低垂时再继续行程。

傍晚我们从 Subong 山出发，这一段路到 Kpg. Kubung 是由蔡高由当响导。队伍向前走，走呀走，越接近边界大家就越兴奋。诿料，还未到 Kubung 的途中遇上了一位达雅人。根据响导说，他是从 Subong 长屋出来做生意的人。我们就跟他进行宣传教育，他表示支持我们的革命斗争，而且还跟着我们去。岂料，这个家伙在半路瞧个机会偷溜走了。我们发现了立即截围进行搜索，终于找到捉住。我们警告他要保守秘密，不可泄漏出去。经过教育与警告，就把他放走了。

队伍抵达打必禄一带，再越过边界，再行走（有些路段用船）约一星期，这批 58 个同志总算胜利地到达山口洋。

完成了我们第一路段响导任务之后，我们三位立即从来路赶回去。这条半百人刚走过的“路”，而且是不习惯走远路人走的“路”，再加上有的地方留下坐的、躺的痕迹，痕迹显得特别大。我真担心再走这条“路”会安全吗？

回到老家，我向黄绍隆负责同志报告了情况，也反映自己内心的忧虑与担心。但负责人表示，不走将可能被捕，还是按原来计划安排第二批人趁早启程。

6 月 1 日傍晚 6 点多，第二批约 86 人也是从木瓜山出发，又沿着第一批走过的旧路走。这次去参军的大部分是晋成路 10 哩、15 哩和 17 哩的青年，也有少数是来自别地别省的，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来了。

前段的路仍然由我们三位带。由于是走旧路，较熟不用找路，相对走得快些，但这批队伍更大，也快不了多少。行行

复行行，经过整夜的赶路，特别是到了下半夜，许多人是举步维艰，一屁股坐在泥土上很想不必再站起来再走了，但想到早日抵达目的地，大家还是凭着斗争激情与意志力，於早晨总算走到 Subong 山。

早上，我们翻过山背下到山谷，谷底有一条潺潺的小溪，有二间达雅 Lankau（茅棚）建在溪流的右边，左边也有一间。这是达雅人种稻时栖身的，当时稻已收成了，溪边竟是枯萎半折的稻秆、烧焦的木桐枝杈横七竖八的交错在其中，杂草长得不高。白昼我们就分散在三间茅棚歇脚。

当天负责后段带路的蔡高由去另一站找另一位响导。殊不知另一位响导已被捕，在打马庚关一个晚上就放走了。这样蔡高由到了 Kubung 也被捕。其实，当时 Kubung 已驻有 20 多个兵，Kilian 长屋也驻有一队士兵。

在逗留茅棚期间，我们没有什么好吃，随身带来的饼干和冷饭馊了照吃不误。令人欢欣鼓舞的是，这里几十户二、三百人的 Subong 长屋居民都很支持我们。他们把饭菜（有罐头的沙丁鱼、稻芭种的黄瓜等）用草叶包成一包包的，装在 Selabit（达雅人的背篓）里，有大人小孩、有 Apai Indai，三五成群的爬上高达 2500 尺的 Subong 山，要跋涉 1 小时多，才把食物送到我们跟前。在这两天等待的时间，这些达雅同胞都是这样的送饭送菜，积极热情地接待我们。我们这些外来人在异乡遇上困境时，能获得异族同胞的暖人心的爱护与关照，特别使我们没齿难忘！

当天至深夜带路的人没有倒回来，我们就隐约感到事态不妙。我们不得不警戒，夜间也设岗放哨，做些必要的防备措施。

我们这个队伍的负责人黄绍隆心急如焚，他决断要前去探个明白，动身前要每位出二三元总计有五、六百元，去时顺便买些食物用品。6 月 3 日上午，他带了潘瑞成出发了。

那是后来才知悉的，他们俩在 Kpg Kubung 也被敌特截住，黄绍隆由于身上有那么多钱，而且还有全队的名单，又不会达雅语，嫌疑是共产分子而被捉了捆住扔进小溪，后来还关进了暗房。潘瑞成会讲达雅话，身上没有什么怀疑的物证，他说去找亲戚。虽然他被捉押进三角坡的监狱，但 28 天后就被释放。

去探路的黄、潘久久未回，大伙更是忐忑不安、引颈期盼。此时大家的心情都很矛盾，要走回头不是办法，要向前走又没有响导，真是进退谁谷，前后不得！大伙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思路办法，只能无奈茫然地等待到天明。

翌日（4 日）上午 8 点多，黄文彩召集 10 多个同志在小溪右边前面一间“朗高”讨论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沿着小溪有一条小径向着右岸延伸进不远有另一间“朗高”，在此有 20 多位同志，左岸的茅棚也住有 20 多位同志。在开会时，有 10 多同志关心地围在旁边倾听。大概 9 点，倏忽前面座的同志发现下面岸边路上出现一队人员，再仔细一看。最前带路是那天遇到后放走的那位达雅人，后面跟着是手捧枪支的武装士兵。他们一边把枪口对着我们直冲过来，一边大嚷大叫。我们一时惊恐慌乱，不知所措，有些同志四散跑开，有的说，“我们在国内不在异国”、又是“公开的普通人”……“不必跑！”、顿时，直升机出现在我们上空盘旋，正在广播着什么——像“狗吠”，这种声音在环山四周回荡着，宛如四周都有“狗吠”，仿佛四周都有兵。这样，右岸二间“朗高”的同志暴露在敌兵眼下的、面对的又是向上的高山，感到走投无路，终成了阶下囚。而不靠近溪流又无明显路的一间“朗高”的 20 多个同志，由于一时没有被敌兵看见，他们遇事就立即向左边方向跑。他们走了半天的路程才荫蔽起来，后来 Subong 长屋的人寻找到他们，在这些好心的达雅人的掩护之下，带到 Padawan 路，安全地返回故家。另外有几位同志由于没有达雅人的掩护与带路，跑到甘榜路口被守兵逮住。

当时我跟我的生哥，还有 60 多位同志（注一）同时被捕，这是第一省最大的一次去印尼。由于考虑部署不周，处

理不当，不但去不成，反而遭受牢狱之灾，我们俩受折磨煎熬了12个冬年后才获得自由。豁然回首这段历史，似乎如梦如幻又沥沥在目的，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

注：还有一批也是最后一批从这里（即Tapan-大富村一带）出发去印尼的是，在1965年7月6日宁甘政府开展“铁锤”行动之后的一个月多，这一批有30多位。

注一：1963年6月4日被逮捕的名单：

男同志：

- | | | | |
|---------|---------|---------|----------|
| 1, 张石源 | 2, 郑荣 | 3, 田福财 | 4, 冯金贵 |
| 5, 庄振南 | 6, 田永发 | 7, 杨金永 | (后去中国) |
| 8, 温三德 | 9, 赖强 | 10, 温俊国 | 11, 韩佳福 |
| 12, 余贵洲 | 13, 田发章 | 14, 陈贵文 | (后去中国) |
| 15, 张金汉 | 16, 刘石顺 | 17, 彭天赐 | 18, 彭梦生 |
| 19, 彭梦意 | 20, 刘兴发 | 21, 蔡传添 | 22, 黄绍隆 |
| 23, 蔡茂昌 | 24, 黄文彩 | 25, 林丁南 | 26, 田仁坤 |
| 27, 彭成级 | 28, 杨标厅 | 29, 贝南定 | (后去中国) |
| 30, 潘瑞成 | 31, 罗广仁 | 32, 彭秀钦 | 33, 黄贵兴 |
| 34, 田奇德 | 35, 赖东晋 | 36, 田国华 | (后去中国) |
| 37, 蔡晋益 | 38, 杨坤妙 | 39, 钟金良 | 40, 范进德等 |

女同志：

- | | | | |
|---------|---------|---------|---------|
| 1, 杨凤英 | 2, 庄秀梅 | 3, 韩秋花 | 4, 吴月清 |
| 5, 杨国珍 | 6, 张菜花 | 7, 赖满妹 | 8, 廖英花 |
| 9, 张秀妹 | 10, 赖春花 | 11, 郑春莲 | 12, 李秀莲 |
| 13, 蔡桂花 | 等 | | |

我从死神旁边擦身而过

—勤思口述 尽翅整理

被捕

1971年6月13日将近傍晚7时，我踏着脚车从南兰律上段出发。经过南兰律兵营时，我看到一部分第七营的警察野战部队正整装待发。经过加柏路，正要进入东山路时，看到前面有辆连罗华停下，接着有军人下车。若直闯过去要冒险，於是我就倒回转入木杰阿拾路，踏向市区方向。才踏不远，迎面走来了五位马来亚来的马来兵，我心想没事吧。詎料，到了第一个士兵跟前，他提着手提机关枪突然向我喝令。我感觉不妙，停下一想，绝不轻易被扑，倏忽我把自行车一摔，向后奔跑(左右都是住家，篱笆挡住)但没跑多远便被他们合力逮住了。

在诗巫将近一年的拘留期间，我曾受到连续疲劳审问，甚至威胁要枪毙我。他们企图从我口中获取内部秘密情报和承认土枪、子弹是我的。我一概加以否认。

被判死刑

72年4月4日，我被控上法庭，经过几次诗巫高等法庭的审问，於5月9日，我的“罪名”成立，被李天发法官判处死刑。罪状是：(一)71年6月13日晚8时左右，在元首於1964年9月间即宣布为保安区之诗巫木杰阿拾路，被发现非法拥有一支土枪，触犯1960年内安法令第57条(1)(A)；(二)同时同地被发现非法拥有4颗子弹，触犯1960年内安法令第57条(1)(B)。

王启同律师即代表我要求上诉联邦法庭。

被判死刑后，5月11日，我被押往古晋，等候上诉。上诉的理由：(一)在内安法第七条下，不能宣布全州为保安区，只能宣布某一区为保安区，而此控状只能在保安区内执

行，故不能证明被告有罪，同时亦不能证明被告在保安区内，故不能判死刑；（二）承审法官犯了误导自己把证明罪状之责任，推到被告身上。

同年 12 月 5 日，我的上诉在古晋承审遭到驳回。我的律师要求暂缓执行，并问我是否要向枢密院上诉，我表示家里的经济状况无法承担这方面的用费。我虽然取消进一步的上诉，但家人与辩护律师有代我向州长请求赦免死刑。若不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赦免（每年都要），就会立即执行死刑。

在死囚牢内

三角坡中央监狱过去曾是医院，也曾监禁过政治犯，后来改为关死囚犯与其他刑事犯。我被关进了三角坡的单层牢房座内。囚禁在死囚房，这里共有四间可囚禁 4 个死囚犯。那时只有我一个，关在一号牢室内，这之前周民权和陆良其也曾关在这里隔壁，其中一间当作冲凉和洗手间之用，另二间空着。我的对面有隔着很多间小牢室，是未经审判的犯人监禁的。我一来到这死囚房，他们就在中间架起三夹板把我跟其他囚犯隔开了。我只能隔着围墙跟对面的囚犯讲话，却看不到人。

座落在左角落的关我的牢室，阔约 6 尺，长约 10 尺，高约 10 尺，在大锁头锁住的牢门对面约一人高的墙上开了个 1 尺乘 1 ½ 寸的小窗口，还用铁条嵌著。洋灰地上原有三片组成的约 6 尺乘 3 尺的床板，但我一进来时就被拿走。代而替之的是一张单人被跟同大小的一块帆布缝在一起，要躺时就用之铺在洋灰地上。除了一个塑胶杯装水喝、一个塑胶桶（大小便都在里面）之外，其他可说一无所有。晚上一盏光亮的日光灯在室内顶上开着，在视觉神经上困扰着我不得好睡。

我的编号是 1029/72。我穿的是乳白色粗布做成的短袖衣与短裤，跟所有已判刑囚犯穿的囚服一个样。若是监狱逃犯，在衣服上车上二条青色小带。若入狱第一次，车上一颗天星，若是两次以上，就车上黑色的太阳旗。

吃的方面，三餐都是饭。上午通常是配蛋；中午和晚餐通常是蔬菜配咸蛋，或是咸鱼或是鲜鱼（鱼骨事先挖掉），周六与周日有猪肉，还有一条香蕉或一粒桔子；一般上吃得还会饱。

一天可以放风两次，上午下午各一次，一次半小时到一小时。放风时间的活动内容是我一天的重要内容。我主要的是练跑步，一个人在偌大的洋灰场跑它几十圈，藉此锻炼身体，锻炼意志。

在死囚牢内，有一个狱卒看守着我。要开我的牢房门，必须要有多一个三巡曹长级以上的监狱官员才可以开，普通狱卒是不能开的。普通狱卒或监狱官员对死囚犯的态度是好的，他们不敢惹死囚犯。他们知道，万一被激怒了，对方杀人，再判第二次死刑，同样也是死。所以，他们对待我的态度不得不好一点，以防不测。

一年多在死囚牢内，我不准读书看报（还可以给家人写信），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除了一个看守员，白天我面对的是墙壁，晚上面对又是墙壁，我恍如隔世，生活在一个没有信息、没有交往、孤独枯燥、暗无天日的世界。

死囚犯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会得到通知，要见家人，要传道士来祈祷都可以，也可以好好饱饱吃一顿，医生也会来检查。绞刑是马来西亚的死刑法，通常是六点之前要上刑台绞死，之后医生检查，万一六点天亮后未死，还要绞至死。据说，英国的法律，时辰到未绞死，可以脱死而复生，免掉一死。一个老狱卒在英殖民政府时代就开始来此工作，他一直在这里执行这一刑法，他说有些死囚绞后舌头伸长到肚脐处！

刑场是在后面的一座建筑物内，里面有好多间小牢房，是用来关押执行死囚犯的。还有一间大房间，平常门是深锁着，估计吊索架具等都在里面。其外面墙壁漆上黑色，初次来此者，都会感到不自在、阴森、恐怖！正常执行正法后，死者就放置下层，由下面的狱卒收拾了，扛到就地附近去埋。当年

刺杀司徒华总督的罗斯里·多必也埋在里面，后来平反了，被迫认为英雄，在此挖起骸骨，运到诗巫去：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冥冥之中的“邪物”，简直是“催死鬼”。可能这个地方太“脏”了，也可能人的意志太薄弱了，心神太虚弱了，不论白昼黑夜，只要你梦见周公，这“邪物”就来了，它可能在凶神恶煞的向你直扑而来，你拼老命的跑，越想跑快些，脚却不听使唤，反而越跑越慢，就要被逮到正着……你会在梦中大喊大叫，吓得满身大汗；有可能在梦中你被“黑物”掐着喉咙，你拼命挣扎，发出啊啊叫，透不过气来，有的犯人就在睡梦中死去。就这样，有的死者颈项留有黑瘀痕迹。守夜班的狱卒也有在睡梦中去见阎罗王。某一年在我隔壁房就发生一宗这样的事件，这位犯人在梦中“被压”，听到他啊啊叫，又在床上打滚，过后一动不动，一昏了过去，他赶紧被送去医院，才免被死神召去。

黑牢这样的环境与空气令人窒息，令人心里发毛，晚上又往往令人透不过气来，真的会令人心房生痛。在心痛难受之时，我也闪过自杀的念头，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值得，也是怯懦行为，我决心要倔强勇敢的活下去。

至于死囚犯对死的心理，据我了解，只要他认为杀人没错，觉得会值得，死亡对他来讲就不是那么遗憾与可怕。当我关进了死囚牢，也有准备去见马克思。我觉得为人民而死，是死得其所，能成为革命烈士，死得光荣，没有什么引以为憾。

但我总认为自己不会死，因为：（一）按国际范例，战俘是没有判死刑的，政治犯更没有理由会处死。若有关当局胆敢这样对待政治犯，就会受到社会公正舆论的谴责，特别是受到人权组织的非议，它们将不得民心。非不得已，它们不会孤注一掷的。（二）马来亚也有发生几宗判死刑的事件，但都没有死。再说，1969年12月8日，周民权、叶天星和陆良其三位被扑后也判了死刑，但在审讯中，他们针对二项控诉中进行了申辩（辩护律师是张守江、王启同与郑作忠），结果获得了胜利。按法庭的审讯程序，死罪被告需先经县庭初审，表面罪

名成立之后，方提交高庭询审。由于控方“程序”不对，而宣告宣判无效，后来又判 10 年徒刑。到了 1977 年，我转到诗巫监狱来时，他们三个已刑满出狱了。之后，还有加拿逸一个姓梁的，也申诉获胜。根据以上的推理，我觉得自己死不了。同样，那时我还有革命的激情，还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身上还有一股力量，因而，死的斗争还不是激烈的。

我申请赦免死罪终于获得准效。1973 年 8 月 31 日，在庆祝马来西亚成立 10 周年之际，以州长为首的赦免委员会赦免了我的死罪，改为终身徒刑。

八年的“终身徒刑”

改判终身徒刑后，我转移到过一点，囚禁在双层楼的牢房里。这里一楼分成 3 大房间，一个房间可关 12 个囚犯。那时，上下楼共关有刑事犯几十人，其中有终身徒刑与有期徒刑。

在此的刑事犯，每天（节日、周日例外）要工作，他可以选做裁缝、木工、种菜或其他，每天上午七点上工，十二点放工，下午一点上工，四点放工。犯人一离开门口都要有狱卒带，在工地集体劳动处也有一个狱卒看守。劳动的产品交由监狱方面拿去卖，犯人的工资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即每月四元、六元与八元三个等级。后来经过争取，获联邦有关当局批准后，工资提高到每月八元、十二元和十六元的三种。犯人可以用这些微薄的收入，一个月去买一次自己认为需要的东西。

这里的炊食是由犯人自己负责，吃得比死囚犯差。但生活会较多些，每天放工后可以去打球，节日或周日可以较自由些。在扩音器里也可以传来砂拉越电台播送的新闻与音乐等。在此，也可以读书看报，能掌握到国内外事态与变化，似乎世界没有离我们那么遥远了。

在此，初时我选做木匠，整日刨、锯、钉……，感到索然无味。后来，我改做绘画、雕刻，做手工、广告之类。我由第三级工资，升到最高级——蓝衣。所谓“蓝衣”，必须已关3、4年，行为较好的。在英国时期，蓝衣可以一年回家一次跟家人团聚过新年。但马来西亚没有这个优待，不过我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自由走动，不必狱卒跟着。

改为终身徒刑期间，眼见在牢内就有一些被判终身徒刑的囚犯，因受不起长期间囚禁的苦恼，而成了精神病患，有的在徒刑中得了中风半身不遂症，只有一辈子苦痛在牢中。我的思想斗争更为激烈。我心想，难道就是这样一辈子关着，关到死去！所谓终身徒刑，顾名思义，就是说坐一辈子的牢，永远无出狱的希望，这和死牢没有两样。如果思想斗争，斗不过，也许终身遗憾牢狱内。当然，我也心想，若我表现好，行为佳，可以减刑，缩短至有期徒刑，但那又将是将关到那年、那月、那日，似乎遥遥无期，至少也要15年啊！风华正茂的青春在狱中渡过，释放时已老，还能做什么！想不好时，就会感到惆怅茫然。又听说“斯里阿曼”行动出了那么多人员，革命武装斗争蒙受重大损失，对革命前途堪虞。这时我的棱角也受磨损，意志也薄弱些，相对比死囚犯时期较苦闷些。

在死囚犯时期，我有力量抵御“邪物”的侵犯，但转到双层楼后，我开始也很常受“邪物”的干扰，搞得我感觉很喘很累。后来，有马来巫师教我念咒语开锁头。咒语的大意是，请Mohamat出来，帮忙开锁头，就行了。为了对付“邪物”，我尝试用咒语，睡前念，梦中也会念，其结果我奇迹地能获得效力，使我平安无事。

回到诗巫

在我改为终身徒刑时，我跟家人都有向州长申请无条件释放我，并同时有向监狱当局申请回诗巫探亲。1977年我获准回家探亲。到了诗巫，又申请改为居留在诗巫监狱，也准许了。这终身徒刑获准关在诗巫，我是第一个。到了诗巫以后，我的压力得到了较大的缓解。

1981年7月4日，我申请释放终于获准。十年后我总算踏出了这煎熬我折磨我的黑牢，重新呼吸狱外清新盎然的空气。



1976年11月15日拍于古晋中央监狱

难圆的赴往中国之梦

—刘民

1974年4月19日，我和内子（小林）、黄国华夫妇、刘贤超、江先河及张和云（去吉隆坡读书）一行七人从诗巫安排乘坐空军直升机前往古晋。机场篱笆外，站着来送行的我们的亲人，登上直升机那刻与他们摇摇挥手告别时，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告别了，亲爱的亲人们！

当天抵达古晋，晚上政治部招待我们去逛电星大厦，以及在天桥上（圣佐瑟学校前面）观赏着这里的夜景。

第二天早上，一行人被带到空军机场，前往吉隆坡，但延到下午二点才获准上机起飞。原来大马空军仍沿用英殖民地的规矩，普通乘客须穿着西装大衣才可上机，我们几个“土包子”连长袖衣服都只有个别件，“西装大衣”对我们来讲真是太奢侈了！据说几经政治部交涉，我们全部穿上长袖上衣、长裤总算才顺利登机。

傍晚抵达吉隆坡，被安排居住在文良港一幢相对高尚住宅区的独立屋。同屋主人房另住两位年青马来族政府军警人员，楼下工人房还有一位马来族女佣。我们大家都客客气气，每天点头招呼。不久他们就搬走了，换来一位政治部人员（从砂调去的，每几个月更换一个）与我们同住。当时负责我们全部事务的是来自西马的黄xx警长，此君心直口快，骂人痛快，铁面无私，趾高气扬，按章行事，芝麻绿豆小事也休想逾越雷池半步。不过我和小林欣赏他忠于职守，为人正直，不要手段。虽然有时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但双方仍可“和平相处”。

在文良港期间，我们尽力争取早日成行，可是，黄xx警长再三告知没有船只愿意载我们。我们无奈只好每天看报纸，睡觉，看电视，下棋，逛巴刹……生活在度日如年中慢慢溜走。期间黄国华夫妇曾南下想取道新加坡去中国，无功而返，赚到一趟游览马来亚古城—马六甲。

当年的文良港小市镇，中间一条马路，两边都是商店，菜市场离我们住处很近，鱼、肉、蔬菜都很新鲜便宜，闲来无事，每天上菜市场去买菜。我们都是选便宜的买，好像“蛤”一公斤二角，二公斤三角，所以每天每餐都少不了蛤。有时闷得慌了，就搭巴士去“来杰律”一著名红灯区，不过也是购物中心，经常也去“指天街”一唐人街，也叫“谐街”。最初政治部工作人员还会陪我们去逛，后来觉得后面跟着我们这些“土包子”有点像越南难民，罕有买东西的，只是Window Shopping，东张西望，一副“寒酸”相的，觉得“面上无光”，就让我们自己自由活动。

同年6月26日，我们六人坐火车去槟城，准备从槟城乘船去中国。在槟城期间，黄xx警长带我们游览了槟城著名的旅游胜地—蛇庙、极乐寺和植物园。当时蛇庙里面蛇群之多与现在比较，真是天渊之别，真是名符其实的“蛇庙”，神坛、门栏、屋梁……到处挂满一堆一堆蠕动的大小蛇，只差走路地上没有蛇，真是大开眼界。在槟城期间，最辛苦的就是早上要到十点过后才有东西吃，小食摊和商店早上十点才营业。我们这些习惯早睡早起的“乡下佬”难免要大发牢骚。

7月2日，经过多番努力，总算乘搭“长城号”轮船，经新加坡前往中国广州黄埔港口。政府给我们的船票是普通舱位，就是那种几百名搭客各自在船舱打铺睡觉的。我们走到舱厅，空气污浊闷热，人声喧闹，只觉得一片混乱，嘈杂不已。幸亏船长，特别优待我们几位“贵宾”，安排我们免费吃、住二等舱，总算松了一口气。船长的安排是非常明智方法，给我们优待不必花费太多额外开销，更方便船方“照顾”我们，也减少可能不必要的“事故”。此次航程，可说出师不利，海面惊涛骇浪。记得经过泰国湾时，全船三百多乘客，经受颠簸不已的船舱煎熬，大家咽不下饭，用餐时只有我与国华吃饭。

7月6日傍晚六许，轮船抵达中国领海，多位中国领航员与边防人员上船。次日清晨停泊于黄埔码头。旅客们全部上岸，只有我们几位正等待着进一步处理。第二天晚上，中国公安人员叫我进房谈话，交待写报告。数日后，船方事务长转达

中方的答复：“原船返回马来西亚”。大家都感到莫大的失望，后经过再三讨论，我们决定再写信叫船方转达。但他们又回覆说：“对您们友好，原船返回马来西亚。”我们知道上岸是没有希望了，只好返回马来西亚后再申请吧！

在黄埔港口卸货期间，我们不得离船半步。每天靠在船边，看工人忙碌地工作，看波涛滚滚的黄埔江水，思潮起伏，既来之则安之，走一步算一步吧！

当时荔枝盛产季节，鲜红肥硕的荔枝一箩一箩买到到船上，船方免费招待我们，我们实在吃不知味。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轮船船长，不愧是一位见世面广、人生经验非常丰富的长者。从上船开始，除安排饮食起居之外，他还会跟我们聊天，讲很多被拒绝的实际实例给我们听，给我们无形中有一种心理准备。当时船上一位随船医生就是一个“人球”。早年某种原因他要投奔中国，结果中国拒绝收留，轮船公司没有经验，事先没有与政府签订合同；回来后，当地政府也不收留，结果成了“人球”。还好轮船人道收留了他，则成为随船医生，只好长年累月呆在船上。

这次乘搭的“长城号”轮船，刚好在广州期间是进行常年大检修，所以在黄埔港口卸货完毕之后，船驶往江中大检修，所有船职员包括我们几位“贵宾”都得撤离轮船。当然船的职员是上岸住旅馆，我们几位“贵宾”却上一木船，停在江中。当时是夏季，蚊子多，天气炎热，晚上九点天才黑，早上五点天就亮。每天窝在木船上，真是烦闷难熬。大约一个星期后我们才回到大轮船。

7月21日，全部货物收妥，次日中午船长上船，他说：您们运气太好了！十二点正大台风登陆广东省沿海。随后船启行，当天傍晚进入避风港，风声呼啸，海浪汹涌，船只在海面上随波摇荡，惊险万分！

次日，风平浪静，轮船开始启航回程。当天下午开抵汕

头，次晨到香港。眼看个个海员都上岸了，大家心又动了，后来考虑到大家适应社会不强，没有把握，只好放弃。

两日后船只离港，一路海面平静，一望无际的大海，大小鱼群自由自在地遨游，经常大群大群的鱼儿跟着轮船觅食，期待船上剩饭倒下。还有海豚随波逐浪翻跳，鲨鱼大群与轮船比赛，如此美景，几位“江湖落魄”人，犹可忘了忧愁。

8月3日，抵达槟城港口，黄xx警长上船带我们一行人上岸，当晚回到吉隆坡文良港旧居。

1975年12月30日，我们原班人马返回砂罗越，结束了难圆之梦——中国之行。

稿于古晋

一个小兵的追忆

- 新江 -

五十年代国际上的反帝反殖浪潮风起云涌，而我们砂拉越的反帝反殖斗争也正蓬勃开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受到家人，特别是姑姑、叔叔的鼓励和支持，来到诗巫郊区广东芭的公民中学肄业。在这时期的学校生活和学习，是我在往后参与革命斗争的启蒙阶段。

我的青少年时期

1962年是公民中学创校的第二年，一座二间简陋的亚答校舍，和一排七间的亚答宿舍，供我们外坡学子寄宿。学校周围都是一片片的胶林，对于从小市镇来的我，当然是不惯的，有着进门看床头、出门看胶头的感觉。不过这里的学习环境很好，特别是广东芭的同学都很热情好客，因此，很快的就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加上当时的老师对我们都很热心启发和鼓励，使我能修完初中课程。

由于我的好动，我很快的引起了高班学长的注意，常常被邀请到同学家去玩、去做“客”，特别是学长谢玉明同志给了我许多启发，也是我一步步走上革命征途的引路人。谢玉明是比我高一班的学长，他于1968年越界参加了北加人民军。

不久，我参加了由老谢所领导的学习小组，《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是我学习的第一本书籍。过后，我也阅读了一些抗日连环图、革命小说《红岩》、《青春之歌》等书。由於我是寄宿生，比较常出外参与学习和活动，就必然的引起学校当局，特别是老校长的注意。他经常在课室指桑骂槐的警告，说什么“有尾巴的狗经常跟着没有尾巴的狗到处乱跑”……等等，紧跟着就是控制寄宿生的出外活动，出门要签名登记，回宿舍要报到。为了能经常参加学习和福利活动，於是在我的签名登记册上，就经常出现“回家”的申请，节日、假日和周末

都是以“回家”为藉口而参与课外活动。过后，我也被分配联系同学、组织学习小组的任务，并在宿舍成立学习小组，发动同学参与课外活动。

1965年，我转到诗巫光民中学继续深造高中。由於当年光民中学是在克服重重困难，才创办第一届高中班，因此有许多建校工作，要我们学生去参与。如筹款、运泥土（当时由於没有车路，只能用脚车一包包、一袋袋从一里远的鼎新小学把泥土运到新校址的填土处）。由於经常参与工作，因此我又与当地的组织联系上，从此又过着组织生活。

形势不断发展，疯狂的镇压也日益增多，家庭成员相继被迫转入地下，我的经济来源受到了影响，於是我只得半工半读。我做过派报员、咖啡店员以及书店店员等。过后，我也参与了实际斗争，如张贴标语，以及所谓“联合国和平调查团”的大规模抗议斗争。记得有一次，我参与张贴标语活动，我被分配到泗码头以及大伯公庙一带，由於走漏风声，引起敌特的注意。午夜我们才开始行动，敌特就已在后方出现，当时我被追赶，我疾风式的向大伯公庙后方奔去。当时夜深很阴暗，伺机一闪躲进一店屋厕所。至到有船声，搭客上岸时，立即混进人群，避过追捕。当时有不少战友被捕，过后被控上法庭。

在学校的组织生活中，我们通常都是利用个别联系谈心，周日小组学习或集体整训，其中包括搞福利劳动，帮低班同志补习功课等。小组学习除规定的学习资料外，也谈形势、思想、以及工作问题等等。每月至少都有一次的小组学习，关于集体整训，通常是利用庆祝纪念节目而召开的。由於有严密问题，通常我们是用雨布隔开，彼此不见面。整训期间也谈时势、心得体会和文艺歌唱等。

参加“非法隐藏”组

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为了减少被捕，“非法隐藏”的保干形式就应运产生。所谓“非法隐藏”，就是把身份较红的同志或是有培养前途的同志转入地下，不在自家住，有时到群众

家或后芭茅屋去住。“非法隐藏”在当时是一种保干形式，不但减少被捕，又方便搞群众工作，在革命初期是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1967年底，我考完高中会考，就响应号召投入“非法隐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我同班同学，而且大家都是刚考完独中统考。当时的负责人黄招发同学（新民）、林友基同学（新平）、吴兰凤与我四位成员。

“非法隐藏”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我们在后芭搭起小“朗高”，一起学习，讨论工作，谈思想等。出外工作，我们却在群众的家或周围茅屋住宿。由於我们都在群众区活动，因此我们的生活几乎都融化在群众生活中，我们跟群众一起工作，帮群众劈柴、砍草、种菜、养鸡、捡蛋、看顾小孩，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因此很受群众欢迎。群众也很关心我们，过年、过节，都不会忘记我们，都会留给我们丰富的饭菜。回住点时，大包小包要我们带走，怕我们没有菜吃。群众的支持和帮助，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由於我们的活动，群众工作的开展，使到敌特的活动也加强，这给了我们安全上的威胁。我们也即时改变活动形式，少在群众家住宿，而把活动范围扩大到后山林边。因此，我们的住点也经常随工作而转移，群众后芭的荒屋，甚至是群众口中的“鬼屋”，都是我们的“隐藏”点。我们没有武器，所以我们活动的形式，比较多是化“白”进行，走群众路、菜园路，有时路途遥远，也突击利用脚车活动。

“铁军一八”土枪的出厂

1968年中，边区武装力量与国内的革命力量相会合，点燃了国内的武装烽火，使国内各个革命力量开始了武装反“围剿”的斗争，特别是下游泗里街的“2.25”缴获战，更鼓舞了大家。就在这形势下，我从下游第四分区来到第三分区，投入了武器的制造工作。烽火已燃，能不能给同志们提供武器，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我们缺少外援，枪支没有来源，因此

自力更生自己制造土枪，就是唯一办法。之前，亚强同志（严品干烈士）已成功制造了我们的第一枝枪，“北加来福枪—铁军一八”。在阿强同志的策划指导下，我们的工厂终于成立，并顺利数次完成造枪任务。采购材料频繁的活动，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我们也面对了一次次的“围剿”，大干不能，只好小干，精兵简政，化整为零。敌来“围剿”我们就把工具藏起来；敌退把工具搬出来，又日夜忙碌起来。工厂就是在这样“围剿”的过程中，给兄弟单位支援了枪支。很不幸，在一次的反“围剿”斗争中，阿强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阿强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自力更生、敢于创业的精神，却大大的激励着工厂的战友们，使往后各单位都成立武器研究组，自行建兵工厂，以及发展到工厂出洋枪的壮举，在革命武装斗争史上谱写出美丽的篇章。

赤脚兵

离开了兵工厂，我背起“铁军一八一北加来福枪”，参与民运工作。以往我们的民运工作都局限在某些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为了开创新局面，开发新区就成了当时的迫切任务，我们也就肩负了这一任务。要开拓新区，我们也面对许多问题和困难，特别是群众对我们的不了解、害怕、不愿接近我们等。不过，在我们真诚的宣传和医药福利相结合下，使到群众逐步的改变了态度，也愿意亲近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们来到新区某地，意外被群众发现，我们以为群众会害怕，会逃掉，但群众却反而接近我们。原来在我们还没有来这地区之前，我们的讯息已经广泛流传，群众说，你们男男女女，又是赤脚，就知道你们是 Paraku（北加人民军）。群众就是这样把我们北加人民军有男有女的赤脚兵区别与政府兵的标志。

我们没有什么军事训练，只是掌握应用枪支的基本技术。因此，军事技术水平很不足，特别是跑山开路也正是在学习过程，由於是赤脚兵，又没练成铁脚板，这对城市来的小兵，就更是一个考验。

论赤脚，走群众路还可以应付，走石头路，就得非咬紧牙关不可。如果是开路跑山，遇到“子青芭”、“蒙技芭”，就只有刺在脚底，痛在心里。“子青芭”有一种全身布满幼刺、结着小小红果的野草，一脚采上这种草木，使你痛入心扉，有同志称这种草为“老虎婆”。

赤脚是我们初期搞群众工作的一种现象，由於没有军事经验，又有种种严密问题，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赤脚上路。就如群众根本就没有穿鞋，如果我们把鞋印留在路上，就必然暴露我们的来路去向，这对我们就不利，特别是敌军紧跟着我们之时，就非警惕不可。

赤脚虽然给了我们许多困扰，但并非没有好处，它不但考验我们，更给予我们意志的锻炼，我们有许多战士，就是在其中练出了铁脚板，不管是“蒙技芭”还是遇上“老虎婆”，仍然箭步如飞，顶多扎营时，用针挑挑刺，第二天照样上路。

总之，赤脚是武装斗争初期的一个小插曲，小点缀。忆当年更觉当年勇，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当时许多赤脚兵的写照。

蔡建国特别工作队

蔡建国特别工作队是一支警卫工作队。除负责警卫工作外，其职责包括民运民族工作、出版、通讯联络等，由於工作是多方面，是由洪楚廷直接领导。为了纪念蔡建国为革命做出的贡献，故命名蔡建国特别工作队，简称C工作队。

C工作队主要活动在下游第一、二、三分区，与当地民运组相结合开展民运民族工作，与战斗队相结合去创设战地开展战斗。关于出版工作，除了本工作队的简报外，还出版有《群众报》、《红星》、《人民军报》，传单（包括伊班语传单）等等，特别是《群众报》、《红星》是我们内部的重要刊物，主要内容有对国内外时势的研讨、时评、部队动态、思想教育、好人好事、心得体会，转载等。我们还要时时与各单位、各武工队联络，由於没有科学的通讯联络方法，只得靠

两只脚。

C工作队是一个领导机关，在领导同志的主催下，曾顺利地召开了数武工队的联席会议，特别是“10.28”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开展国内武装斗争的指示，把国内的革命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涨。当然也因此引来了敌军的一系列军事“围剿”，特别是重点戒严“围剿”，以迫击炮轰炸森林地带。

“斯里阿曼”行动之前，C工作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革命转折之后，C工作成员也面对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的干扰，思想上的斗争也是激烈的。为解决这个政治思想矛盾，我们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研讨路线，努力搞通思想与路线问题。因此有长达两个多月的学习研讨，甚至进行争论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大家的学习与政治思想热情，同志们天天有文章或小字报上栏，打破了历来的学习研究风气，虽然场面紧张激烈，但仍然达致共识，大家愿意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去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压力考验。

“斯里阿曼”行动以来，形势对我们是非常的不利，军事的“围剿”，群众的消极，给了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在群众区活动，我们一出现，有时敌方就跟着来。原来政治部改变了政策，采取怀柔政策，有时口头上允许群众支持，但必须向政治部通报讯息。因而我们的活动规律，以及有关方面的情报，有时被政治部所掌握，这就造成了我们活动的困难，甚至面对驳火和牺牲。为了解决这个日益严重的保存革命力量问题和打开革命新局面，领导上提出研究并尝试在国内偏远山区建立秘密基地。因为偏远山区，虽然有它的优越条件，也有不利因素，比如面对群众活动的暴露，天空的侦察，可能面对的“围剿”等。我们认为，国内建立小型的秘密基地，还是有可能的，只是同志与群众的鼓舞没有那么大。

1977年的“9.19”会议，C工作为了贯彻会议精神而决定重上边区建立基地，为未来打开一个新局面。

C工作队虽然面对一波又一波的风浪，但仍然勇于面对

和逐一解决矛盾，坚持了长期的斗争直至 1990 年回返家园，为我们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关于民族工作问题

民族工作是我们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动员组织武装民族起来参与斗争，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因此，我们革命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去贯彻执行。数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且也动员和组织了少数先进的伊班民族参与革命斗争，UBONG 一家就是先进的一例，其中还有一些也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对于民族工作，我们是认真而且积极的去进行。然而，民族工作成效不大，跟民族本身的革命性不足有很大关系。由于如此，使我们的民族工作不能与华区民运工作有力的相互配合，使华族群众面对更大的压力。

记得 1971 年，我们在中游民族区工作，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们一小队人员突击如楼上游某地。由于活动太早暴露，我们只搞小“朗高”的群众，对长屋暂时不动。当我们个别接触时，群众表现一般，过后也很乐意帮助我们买粮，并约定隔天中午取粮。由于有了许多惨痛因搞粮出事故的经验，因此我们也做了预防工作，于是把队伍撤离一个多小时路程。第二天凌晨四点，我们一小组人员准备埋伏在取粮处等粮，谁知敌军连夜布兵，结果双方在凌晨遭遇驳火。

又一次是在 77 年 3 月，我们也是在搞粮时出事。这地区可以说是我们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伊班群众帮搞到粮，却暗中出卖我们，造成向东（孙剑南）、鲁青（李道进）、思晶（吴珍香）3 位同志，在运输过程被埋伏而牺牲。

二次的事故，一次是在革命高潮时，另一次是在革命低潮时，却发生在我们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两起事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群众出问题。虽然有关当局在民族政策上采取高压、追迁、利诱、收买等手段而取得一定作用外，民族群众的革命性与觉悟就必须进一步提高。总之，民族还没有强烈的革

命愿望，我们又不能在短期内提高民族的政治觉悟，我们必然要面对如此的困境。

“2.23”的反“围剿”斗争

1973年2月23日的反“围剿”斗争，可以说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是我们工作队面对一次严重考验，在这次斗争中，我们牺牲了三位可敬的老干部：老班长（贝贵和）、伍乐（许保祥）、华姐（王祚英）三位同志，以及一位女同志手臂受伤。

这次敌军重点“围剿”，这与我们一段时间来的活动规律暴露是有很大关系。我们每到一地，就与当地民运工作组相结合，比较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包括了附近的民族区和混合区工作，因此比较容易惊动敌方，而我们的讯息也比较会泄露。在我们来到之前，先派出的先遣工作人员又为了准备工作而频繁活动，也是引来暴露的一个方面。73年一开春，我们就积极的准备，并在二月中，我们从第一分区某地，乘着夜晚急行军插入诗巫路三哩半的华伊混合区，并在预先选定的地点扎营，也没有暴露，侦察组也相继回来报告情况正常。

一星期后，突然传来有一中队三十多人的敌军进坡，并有搜索活动情况，於是我们立即进入备战。二天安然的过去了，第三天早上八时许，远处传来狗只狂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大约中午十一时，敌军就偷偷沿着我们的来路（已灭过迹）摸进住点。第一个敌军就被我阻击组组长用来福枪打倒，土雷土炮齐响，一时敌枪大响，树叶纷纷飘落，阻击组坚持了大约半个钟头就撤退。许久，枪声才停，估计敌军占领了住营地山头。

由於我们的营地比其他民运组的住点大，因此引起敌方过后增兵大“围剿”。混合区除了一些树胶芭之外，可以说多数是“子青芭”，对我们撤退周旋是非常不利。树小草丛多，行走缓慢，因此容易被追赶。大队向东北方向撤退约两个多钟头，大约是下午二点，就遇到群众的小路。在准备利用突击小

路时，尖兵组就发现前方山有敌军声音，於是大队又向山脚“蒙枝”芭前进，这就大大影响了撤退速度。原来敌军发现我们住营地，估计是领导机关，就飞电增兵，利用空中优势调兵遣将，在我们撤退方向布下了数股敌军，企图一举歼灭我们。当我们越过山脚，准备绕过拦兵，并利用群众路迅速撤离，可是这时尖兵组就与敌遇上而驳火，大队不得不撤向内侧。这时后追兵迫近，前路又有拦兵，情况相当危急，当大队撤到群众收割过的旧稻芭时，后方又与敌驳上火。这时老班长挺身而出，闪进身旁大树头，命令大队向高地撤，绕过前方，插入追兵后方，而他利用树头坚持阻击。这时华姐、伍乐都身受重伤，老班长果敢的命令身旁同志掩护领导快撤，不要管他。勇敢的老班长利用手中的史登枪，坚持阻击敌军的迫近，而英勇的付出了生命。过后，我们在老班长阻击的树头上，发现了他扫射过的子弹壳，以及几乎被打烂了的树头，可见老班长临危不惧与敌周旋到底。大队撤上高地，避过了前敌，向左插下，正好切入追兵后方，这就模糊了空中的指挥官，不易区分敌我，乘这空隙，大队利用暮色来临而避开了“围剿”，安全的撤离了危险地带。

据过后的研究，敌军这次的“围剿”，动用了至少五百兵力，他们利用空中的优势指挥作战。由於我们都在群众的“子青芭”转，空中容易侦察，有利指挥地面调兵遣将。当我们后撤时，前方至少就有三股兵在拦阻我们。当我们的尖兵组及阻击组都先后驳火，就与大队脱节而各自突围。因此，我们发现，在麻罗坡和东来坡都有敌军在巡逻，而诗巫路方面，如楼路口，加拿逸路口以及大路上，兵车往返巡逻。

在这次的反“围剿”斗争中，我们深有体会到，直线式的后撤是非常危险，特别是在混合区“子青芭”地区，更要机智灵活应付情况。事后证明，我们改变撤退方向，向来路方向转移，就没有再发现敌踪，有利我们安全撤退。

得不偿失的一次地雷仗

在泗里街牙兰坡某路旁的一间矮楼空屋，敌方经常扎营其间，我们侦察到这情况，认为是一个良机，于是在数月前就偷偷的把土雷土炮埋在屋下。进入七月份，敌军不断的向兄弟单位进行“围剿”，同志们都积极去创设战机以支援兄弟单位。

10月26日，我们得知有一股敌军进入牙兰坡，27日我们侦察敌军进住空屋，认为时机来到，决定给予来敌狠狠的一次痛击。指挥部立即召集战斗队和民运队的战斗组人员投入战斗。午夜，战斗人员摸进战地，并积极部署。

凌晨战斗终于打响，打得敌军有点晕头转向，而我们的火力也不断地射击。许久敌军才组织火力还击。由于我们没有在清晨，敌军援兵到来之前结束战斗，结果战车、炮车的投入战斗，使我方处于不利的局面。在这混乱的战斗中，我方的战斗员民军（张孔喜）、小平（卓天平）先后中弹牺牲，苦练（邓伦平）受伤，雄志（刘庆锐）在后撤过程抢救无效，双双遇难。葵花同志（李莲娇）手臂受伤骨折。林启钦（力争）同志身体多处受伤，在缺粮缺水又缺药的情况下，只身在芭里奋斗一周，伤口溃烂，奄奄一息，侥幸被同志们抢救回来。

这一仗我们犯上了兵家大忌，不知己知彼，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犯上了军事上的冒进错误，结果带来了损失。正如过后一位女同志在总结时说：“我认为土枪土炮一响，敌军死的死，伤的伤，我们再发挥火力，就可以解决战斗。”这就说明了我们在军事上的幼稚。如果这一战改为“麻雀”战或骚扰战，派战斗小组去进行，或者会更好。当然这只是事后“孔明”，也是我们一次的经验教训。

我们进入巴干小镇

巴干是如楼河上游的一个小镇，有陆路连贯泛婆大道，距离泗里街市镇有数十公里远。在革命小高潮时，为了扩大我们的影响力，以及发动宣传群众。71年某日，我们接到指示，向巴干镇挺进。

我们从泗里街某地，利用二个夜晚的急行军而进入巴干镇范围。我们的先头侦察小组却预先到达巴干镇，侦察掌握情况。巴干小镇只有数间商店，人口并不多，当天傍晚，我们就有秩序的进入巴干镇。当时吃饱闲情的商家和少数行人还在闲游，一见我们到来，一时感到突然与惊讶。我们在店屋前的场地，召开了巴干镇的群众集会。我们向群众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政策，使他们对我们的有了初步的了解。过后三五成群群众围着我们，希望能多听我们的故事。有的群众主动向我们反映情况，有的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和住宿，有的表示对我们安全的关心，有的给我们经济与物质的支援，一时热烈沸腾。

当时有两位青少年群众，一见我们就热情招呼，积极为我们召集群众集会，并详细反映我们需要的情况。当我们分散向群众宣传时，其中一位青少年却溜了回家，拿了一包东西送给同志们。他说，“我们很仰慕你们，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我们打开一看，原来是子弹。有数位群众走到桥头边，摸一摸我们架在桥边的“大家伙”一机枪，向我们了解它的威力与作用。另一位老阿母，拿了一包饼干，拉着同志们的手说：“快吃，饿坏了，你们还要赶路”。群众的关怀给了我们不少力量，不眠的夜行军，疲劳的赶路，却在数句钟时辰的军民交融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当晚我们也宣布戒严，希望镇民群众不要乱跑，以免发生意外，这是我们颁布的第一道戒严令。过后，我们与群众一齐高唱“国际歌”。与群众话别，群众依依不舍把我们送过桥头。

挥别群众，挥别巴干镇，迎着黑夜晚风，我们又拔腿起步。天破晓，我们在高坡上伏视着那繁忙的车道，一辆辆兵车、炮车疾驶而过，扬起了那阵阵尘沙，而在我们疲惫的脸上却浮现出了那丝丝的微笑。

重建边区基地的感想

1973年“斯里阿曼”行动的出现，跟我们以往没有解决

好边区的基地的这一战略问题，是有一些关系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把重建边区基地当作最重要、最迫切的战略任务来对待。实践证明，重建边区基地，可以一时消除了当时的消极思想情绪，且能为革命注入了一股强心剂，使队伍重新焕发出朝气，更好坚持斗争。

重建边区基地，是我们发挥主观积极性的一种体现。要重建基地，并不是说要做就能做的，而是要面对许多问题和困难。然而战士们就是不怕这些困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先遣突击队刘小雄队长的带领下，在领导同志和全体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下，终于披荆斩棘把基地重建起来。

重建边区基地，我认为有几方面是我们成功突破困难，取得成功的要果。首先，是同志们精诚团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重上边区，只能带上少许的菜种和粮食，就果敢的开荒种芭，向森林要粮。口粮的不足，辛勤的劳动，就更体现战友们的一心一意，心甘情愿的艰苦奋战。我们利用果子鱼猎来解决口粮，这是森林的有利条件，但是果子是有季节性的，因此不能长期利用。然而同志们就是善于利用这个季节来为我们的长期生活所用，因此就有各种方法去储存这些物质。没有装用的自己做，要远行运输自己造船，要有活动中心，自己打瓦建屋。Engkabang 树积季节，就自制压碎机，把树积压碎制油，以及后来有压蔗机，压汁制糖，用藤制“勿约”、“实拉必”、“拉龙”等运输背篓，用“加龙”树皮制索，甚至试验用烧窑制碗碟……等等。从口粮到日常用品等都是靠双手，靠智慧自力更生去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坚持边区斗争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敢于创新、敢于反传统，这是同志们艰苦奋斗的又一表现。没有大米饭，就不能生活劳动吗？不，没有米，可以杂粮取代，杂粮有叶菜、薯、金豆、瓜等，照样可以解决饥饿。在我们最艰苦的时期，我们就提出了以杂粮代主粮的口号。就比如金豆为“饭”，木薯叶为“菜”，金瓜叶为“饭”，番薯叶为“菜”。所谓“菜”，就是有加点盐，所谓“饭”，就是谈的叶菜、豆、薯、瓜等，就是这样解决一餐。有咖啡嗜好的同志，利用金豆粒炒焦压粉，

开水冲泡加上数粒糖精，就是“咖啡乌”；利用伊班茄子煮熟煮透，就是上等“红毛桃”。总之，战友们就是善于利用有限的物质条件，多样化的去满足口欲，去增添生活情趣。《科学吃饭就是好》这首歌就反映了当时同志们的生活情况。敢于反传统，杂粮代主粮，金豆吃得饱，叶菜当饭没烦恼，肚子饱来力气大，树倒“噢呵（一种山鸡）叫，同志们拍手。

在建边区基地，我们对森林是更加有体会，更热爱森林，它取之不尽，用之不歇，我们生活在森林，更知林中宝。苍天的大树，粗俗的“板督”，小小的酸叶，大大的“比喝”叶，细长的“美藤”，苦苦的树根，陡壁上的“千斤藤”。奔奔跳跳的猿猴，苍天大树上的“大兄”，急流险滩的“白令”，成群结队的山猪，鹿湖“公园”的情侣鹿……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是我们思想中永不磨灭的烙印。在我们的革命斗争中，森林为我们做出了伟大贡献，在史册上应记上功名。

追忆无怨无悔的人生岁月

从离开学校参予革命斗争，到回返家园的华发班班，这个不长的岁月，为我的人生增添了不少姿彩。在枪林弹雨中，我们冲锋陷阵；在与大自然搏斗中，我们赤臂迎骇浪；在友情、爱情的人生经历中，我们也历尽了种种的磨练。《鲁宾逊历险记》中的主人翁历尽了惊险，体现出了主人翁的智慧与斗志。我们这批人正是当代鲁宾逊更有鲁宾逊所没有的伟大政治抱负、跟广大各族群众的血肉相连以及动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斗争事迹。我们不悔於岁月的流失，不怨於事业的未竟，而欣慰於追忆灿烂多彩的人生，让美好的追忆伴随着我走完人生的旅程。

转载

发扬六十年代精神

(摘自《横眉集》内二十五年的回忆)

一九八四年田绍熙口述

(一) 创党前的时代背景

砂拉越人民的政治意识，应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萌芽。一九四六年，统治砂拉越整百年的拉者布禄克王朝，正式把砂拉越让渡给英国，砂拉越从此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当时，英殖民主义者对砂拉越的统治形式，基本上沿用拉者布禄克王朝的形式，设有国会及最高议会。委员除官方代表外，也由总督委任一些平民参加政府。

由于战后全世界各地出现的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浪潮也冲击到我们砂拉越来。所以，英殖民主义者在一九五六年国会通过修改宪法，规定砂拉越国会由十四名官委议员及二十四名民选议员担任。而民选议员的产生是通过三级制选举，先由市、县议员选举，然后由市、县议会选出省咨询议员，最后才由省咨询议会选出国会代表。按当时殖民主义者的意图，是让砂拉越在他们安排下进行自治。

我记得在一九五五年，古晋各社团的主要负责人曾在王其辉同志住家（即现今拿督阿玛黄佛德寓所）举行一次非正式座谈会。当晚参加者除了我及王其辉同志外，尚有王钟元先生、陈桂春先生、陈木林先生、李子均先生及沈济宽先生等人。

当时谈到英殖民主义者要在翌年修宪，产生民选议员，是否有必要成立一个以华社为基础的华人政党。因为当时西马的华华已成立，正在争取马来亚独立，有前车可供借鉴。

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大部分出席者都不赞同成立政党，认为不好抵触英殖民主义者，所以没有结果。

谈到王其辉同志方面，由于王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受委为国会议员，与当时的国会议员如天猛公朱加、万高、邱炳农、拿督班达等时有接触。那时土著已有马来国民协会及达雅协会。在一九五五年酝酿修改宪法时，王其辉同志有问起拿督班达及天猛公朱加，他们都认为不适合成立政党，也认为他们的团体已足够代表土著的利益。

（二）筹组人联经过

记得一九五六年，黄增霆由诗巫来找我。当时在我的公司里面，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认为成立政党的时机已成熟，并问我会赞成吗？他建议我先找几个人谈谈，他将在两个星期后再由诗巫来古晋时才听取我的答复。

我在当晚就去《新闻报》找老陈（绍棠）古春辉和老文（铭权）几个人商量。他们都说应该成立政党。他们也说最好成立左翼的政党。

当时我有指出，目前一般人还很害怕政治，所经成立之政党不应太左，最好是中间偏左，而且一定要包括各民族在内；同时，争取目标是三邦联合自治（即砂拉越、汶莱、北婆）。

隔天早上，我去找杨国斯同志，也同时去找王其辉同志谈起组织政党这件事。那时我及杨、王同志都是古晋市议员。王其辉同志说慢点，等他去问过总督艾贝尔爵士的意见才作打算。过了一段时间，王其辉同志说已经问过总督。总督的意思是可以。因为英国的意思也是最终要放弃砂拉越这块殖民地，让当地人学会自己管理国家。

所以，我与杨国斯、王其辉同志分头进行联络工作，由我及杨国斯同志草拟章程。我们每个星期六都在王其辉同志的农场（朋尼逊路十二哩）集会，分头联络和召集更多人手参加。王其辉同志以国会议员的身份联络土著国会议员及领袖，我们也联络市议员及社会领袖、工运领袖等。而杨国斯同志也曾两次去诗巫找黄增霆及赵松胜同志。由他们推动第三省的活动。

（三）“六.四”建党

在一切都筹备就绪后，我们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四日，在杨国斯同志的住所召集发起人会议。出席大会者有来自第一、二、三省的各族代表，将近四十人。会议接纳拟就之章程草案，以及选举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并申请注册。

大约经过半个月左右，申请注册终于获得殖民地政府的批准。杨国斯同志当时在诗巫料理业务，於获悉注册获得批准后，即在诗巫环球书局（赵松胜同志之店）内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公布党的宗旨与目标：从此，作为第一个成立的政党，我们人联党为砂拉越的政治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建党初期，我们租森林公司做临时的党所，只有一个小房间。过了几个月，又搬到目前的丽华戏院隔壁杨清河的住宅。那时，我们差不多每晚都开会，叫人来研究政治课题，解释为什么要争取自治独立。直到第二年，才在各地党员的募捐下，购置现在位於中央路西段的党部。

党最初成立时，大家都很辛苦，因为人民大都害怕政治，必须费唇舌去说服；且党又没有钱，一切都是义务的。当时党在城市的干部许多都是义务的。当时党在城市的干部许多都是职工会干部，他们的思想较左倾，不过肯刻苦耐劳，埋头苦干，对党的城市基层组织工作，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人联党成立大约十个月后，以拿督班达及天猛公朱加为首的国家统一党成立了。接着成立的是砂华，而国民党迟至一九六一年四月才成立。由于国家统一党内的马来人以第一省的支持让渡派为主，与第三省反让渡的马来少壮派不合，所以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左右，反让渡的马来人成立了砂拉越国民阵线。直至一九六六年，国统党又与国民阵线合并成为土著党，这就是现在的土著保守统一党前身。另外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保守党也宣告成立。所以说，人联党的成立，对砂拉越的政治起着催化的作用。

（四）建立党各级组织

从一九五九年建党至一九六二年是党的蓬勃发展时期。在短短的四年多里，党员由最初的三十多名发起人增加到五万人左右，在各主要市镇及农村都遍设支部。那时的形势非常的好。

我记得马当分部是党的第一个分部。在一九五九年中，我们在马当路六哩召集会议。那次开会有三十多人参加，我有在集会上讲话。以后陆续成立了三哩分部、七哩分部和石角分部。

我们时常在傍晚五点钟开车去农村活动。由我开车载几位同志去。我们时常去西成路十七哩、二十一哩活动，招收党员，进行宣传。那里的客家人很多，我不会讲客家话，只好用华语交谈。后来陆续成立了十八哩分部、二十四哩分部、二十九哩分部、西连支部等。

我也有去达雅甘榜宣传，收党员。像西连一带及打必禄，达雅人很多，我用英语和他们交谈，因为甘榜年轻一代都是在教会开设的学校接受教育，所以他们的英语讲得很好，也很会发问。他们曾问过我，为什么要争取自治呢？他们还说人联党是华人的政党吗？如果英国人走了，他们达雅人会不会变成第二等国民呢？

我告诉他们，好像新加坡、马来亚一样，英国人准备走了，我们殖民地人民最终是要自己管理这个国家的。人联党的章程规定它是多元民族的政党，我们照顾的是各族人民的利益，达雅族有穷人，华族也有穷人，我们应当合作，才能治理好这个国家，这样对各族都能公平照顾。

我们去成邦江和板督活动时，因为车路很坏，我们乘吉普车去。我们也去石隆门设立支部，用船去伦乐。我们召集的会议，参加的人一次比一次多，大家都很兴奋。我记得我们去到安拔梯头设立分部，我们由西成路二十七哩步行，翻山越岭，足足走了五个多小时才抵达。

随着党务的日渐扩展，我也去过泗里街、民那丹、诗巫、加拿逸、加帛、沐胶、民都鲁、美里以及林梦，足迹几乎遍布全砂拉越。不过，王其辉同志跑过更多地方。

后来，我也有去海口区活动，在巴哥找到苏海里及砂米等马来同志。他们到今天仍对党忠心耿耿。

（五）面对殖民主义的压迫

我党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四日成立，直到一九七〇年七月七日参组联合政府，一共当了十二年的反对党，这期间除了遭受殖民主义者的摧残之外，也面对当年砂拉越联盟政府的压迫。

一九五九年古晋市议会选举，我党派出的人选赢得了二十四席的半数。我、杨国斯同志、王其辉同志都获中选。其他中选同志尚有巴巴拉丕女士、宋天祝同志、马里干沙里同志及陈若志同志等。

由于党的势力迅速发展，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恐惧，因此在一九六一年十月的立法会议上，通过了“限制居住法令”，用来对付反殖反帝人士及我党的领袖。我们曾在党部召集上万人的“抗议民主死亡”大会。

这时候，“大马计划”已经被提出来。我记得在一九六一年中，当时的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提议由五邦合并组织“大马来西亚计划”。那时我们认为原则上支持大马概念，不过应由殖民地人民先获得政治上独立才商讨合并，反对由英殖民主义者包办一切。

由于英殖民主义者积极推行大马计划，因此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党召开的中委会上，公开表明反对大马计划，并在联合国调查团抵步时发动请愿与和平示威。当时人联党员及支持者“反大马计划”的情绪普遍高涨。在诗巫的请愿与和平示威时，不幸酿成严重冲突。古晋方面，党也发动数万人的请愿行动。队伍由七哩机场一直沿两旁排到三哩，人潮汹涌，群情激昂。

在一九六二年六月，殖民主义者开始采取逮捕行动。我党中央助理秘书长黄纪作、文铭权，以及中委雷皓莹、陈绍棠等同志被逮捕，并驱逐出境。到了七月，殖民主义者又逮捕了我党中

委张荣侨、雷皓明、田文和与陈景益同志，并把他们限居在偏僻地区。

当时的形势已经日益紧张，我们也感觉到殖民主义者在不久将来，必定会逮捕更多人，以压制反“大马”斗争。不过党仍将继续坚持反大马立场，并准备派代表团赴联合国陈情。

不过，赴联合国代表团尚未成行，却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爆发了汶莱人民党武装起事。那时我正在木中，隔天听电台报告才知道发生了事情，于是我由木中赶到成邦江，然后到西连回到古晋，心想殖民主义者已找到大逮捕的藉口。

果然不出所料，汶莱人民党起事被救平不久，殖民主义者即大逮捕我党的党员干部。由六三年至六五年是大逮捕的高潮，被捕者多达数千人；也由于党在各地的组织倍受摧残，处处呈现出真空状态。

那时候印尼宣布对抗行动，在边界地区常发生印尼军与英军驳火。在国内，持续不断的逮捕行动使到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不安。有不少同志由于对宪制斗争失去信心，再加上不走就要面对逮捕的抉择，只好越界去印尼，拿起枪杆子对抗。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十月斯里阿曼行动出现，整十年的动荡才逐步结束。其间发生了无数家破人亡，生灵涂炭的悲惨事件，是罄竹难书的。

我记得那时尽管形势是多么坏，党部每年都有举行茶会，纪念党的成立。那时参加人不多，大约二、三十左右，大家喝茶、吃糕、演讲，只有一年因逮捕行动太厉害才没有庆祝。

在一九六五年，因为西成路十八哩警署被印尼兵攻占（也称做十八哩事件），导致宁甘的联盟政府采取“铁锤行动”，把十四哩到二十四哩的华族居民围困在三个“新村”内。我曾经发表声明，指控当局“围集中营”而被限制不准踏入三个“新村”，也不准进入由十八哩至西连一带；同时被限制的还有丁秋明、林金声等同志。

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六哩政治扣留营的政治拘留者为了改善待遇，举行无限期绝食斗争。在七月间又举行第二次绝食行动。我党曾代表政治拘留者家属向联邦秘书交涉。

总的来说，处在反对党时期，时刻都要面对执政党的高压，而且个人随时要准备牺牲。那时候，除了一小撮投机分子跳槽、变节之外，绝大部分同志仍旧忠心耿耿地和党站在一起，这是难能可贵的。

（六）砂拉越第一次普选

一九六三年六月，砂拉越举行第一次普选。首先是各市、县议会的议员选举。我党在古晋、诗巫及美里市议会获得压倒性胜利。在古晋市议员竞选高潮时，我们在宋庆海球场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参加的人非常多。我是最后一个演讲。开票结果，我们赢得十八个议席，只有六个被马来人获得。

那时候殖民地政府采用三级制选举，也就是说先选市、县议员，然后由市县议会推派代表参加省咨询议会，最后再由省咨询议会推派代表进入立法议会。换句话说，谁能控制多数的市、县议会，就有可能执政。那时和我们对垒的是砂拉越联盟（由国民党、保守党、国民阵线及砂华所组成）。选举结果，由于民那丹县议会一席之差，使我们不能控制第三省咨询议会，以致功败垂成，由联盟执政。否则的话，砂拉越的历史极可能改写。

我及王其辉、杨国斯同志当时都获中选为立法议员。我记得在立法议会中曾和当时的首席部长拿督加隆宁甘激辩过。

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砂拉越终于加入大马。联盟政府在当时的动荡局势中也互相倾轧。在一九六六年出现联盟危机，由于权力斗争，保守党及国民阵线的所有部长辞职，并由二十一名议员联名向联邦请愿，要宁甘下台，甚至闹上法庭。最后由联邦召开国会紧急会议，修正砂州宪法，迫使宁甘下台，改由达威斯里任首长。

尽管首长换人，我党所遭受的政治高压仍旧一样。

（七）团总风波

我党在一九六五年，因为“团总风波”而出现危机，那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创组“马来西亚团结总机构”，这个组织类似反对党联合阵线，以联合东、西马的各反对党。

党曾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是否要参加“团总”。我记得参加者有四、五十人。当时王其辉及杨国斯同志赞同参加团总，而我及一些同志却极力反对。因为我认为人联党当时的立场仍然是反大马的，目标仍应先争取砂拉越本身的独立，因此不能参加接受“大马概念”的团总。

在会上双方激烈争辩，由于参加“团总”的动议被大会否决，王其辉及杨国斯同志离席，并宣布辞退党主席及秘书长职位。这件事几乎闹到党分裂。

过了五、六个月的沉寂，后来由福建学校的校长林从周先生以及沈济宽先生进行斡旋，复由中央常务会议通过挽留，王、杨二同志才打消辞意，重返党的岗位。

（八）“五·一三事件”及其余波

我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早上，在公司被政治部人员逮捕，警方并引用公安法令将我扣留。我在吉隆坡是被单独监禁。

一九六九年四月，杨国斯同志来吉隆坡探问我，并说全国大选即将举行，问我要不要参加竞选。我认为不知要关到何时才能获得释放，就算中选了也无法为人民服务，等于失去作用。我告诉杨同志，等我获得释放以后，继续留在党内，一样能为人民做事。

“五·一三事件”发生时，我还在吉隆坡政治拘留所里。那天晚上七点多开始听到枪声，一整夜都传来枪声。隔天早上才听说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全市戒严。

“五.一三事件”导致全国行动理事会接管政府，冻结国会民主。而砂州的选举才进行一半，也被中止。由联邦秘书成立州行动理事会接管州政府。

我在一九七零年一月获得释放，总共被扣留了十五个月。

（九）组织砂州联合政府

据我们估计，如果砂州大选不是被中止的话，我们党获得执政的机会很大。经过一年多的间断，党的力量又再次受到摧残，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过，砂州在一九七〇年六月重新恢复选举，我仍有信心党将赢得十八个席位。

选举结果，我党赢得十二席，保守党八席，砂华三席，土著十二席，国民党十三席，没有一个党能单独执政。当时国民党与土著党形同水火，使联盟不能获得超过一半的席位，所以州政府处于难产阶段。

在投票前，据王其辉同志说首相敦拉萨曾探询过人联参加政府的可能性。在开票前一天，首相找到王其辉同志，正式表达联邦政府的意愿，说大马成立已是既成的事实。尚若人联答应参加联合政府，将能协助早日恢复州内的和平。

开票之后，由于出现了新的局面，为此，王其辉打电通知诗巫、美里、民都鲁等各地同志来召开紧急常务会议。当时共有十三、四人在杨国斯同志家里开会。大家原则上同意参组联合政府，由我草拟参加联合政府的条件，其中包括释放六哩政治拘留者、解除新村、土地开放、教育、地方发展，以及砂华不允入阁等，大约有十项之多，同时也要求内阁部长人联占四人。

在草拟协定时，也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两三天大家都彻夜未眠，奔来奔去，非常辛苦。

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当时宁甘有打电话叫杨国斯同志去磋

商，杨同志邀我一齐去，我们抵达中央医院对面天猛公朱加的官邸，当晚在场者有国民党及保守党的党要，我记得见到黄金明，还有宁甘、旺阿威，以及一些生疏面孔。

当时我表明，若人联与国民党合作，内阁只有一个马来人，州政府的代表不平均。当时古晋已有局部的紧张气氛，如慕娘公司的玻璃被打破，政府的迎宾馆被人纵火。我说尚若发生种族暴乱，遭殃的首先是华人，人联是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当时阿旺阿威虽然有叫老杨草拟协议，我们说目前不应签，等回去交由中央常委决定。当晚我们在老杨家开会，大家都认为不应与国民党单独组织联合政府。

隔天早上，我们派出王其辉同志、杨国斯同志、沈庆鸿同志做谈判代表。在公园蓄水池旁的官邸（Bunga Raya）与敦拉萨、嘉花巴巴及敦拿督巴丁宜阿都拉曼耶谷继续会谈。最后签署协定，在一九七零年七月七日成立砂州联合政府。

后来国民党人有批评人联党“毁约”。我想是不公平的。尚若州政府没有各民族的代表性，就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州政府，恢复和平将遥遥无期。我们不应该忘记砂州联盟争权夺利历史事实，更不应忘记“五·一三”的血腥教训。

（十）发扬六十年代精神

自联合政府成立后，直至党加入国阵，我们得到的评语可说毁誉参半。当然，我们不否认人联自参加政府以来，在许多重大课题上表现得“力不从心”，我们的一些议员缺乏据理力争的勇气。我希望大家在二十五年建党周年纪念中能够加以检讨。虽然说参政以来，砂州终于恢复和平，释放全部政治拘留者，以及解散新村，同时州内的发展也逐步有些成绩。不过，我们不应自满，应该看得更长远。由于外面的形势日益在变，华族人民日益感到各种权益遭受侵蚀，我们党完全有责任重新检讨我们在政坛上所扮演的角色，如何维护各族权益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如何利用在政府中的地位，以纠正施政的偏差，最终实现我们建党时所订下的长远目标。

我们应关注，巫统的许多领袖常常在谈话中提到斗争！斗争！而我们党内有某些同志却认为参加政府之后，不必再有斗争，以为靠执政党的地位，党已经巩固了。其实这是错误的。

我认为在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里，始终应坚持国家应容纳多元种族，多种语文，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的发展。坚决反对一个种族，一种语文，一种文化，一种宗教的极端言论和措施！

我要促请同志们，我们应该继续完成党的目标，为建立一个各族平等、公正与合理的社会而斗争。

过去，我在党内常提起，党领袖也许有的身家很多，但不应该忘记贫苦的党员群众，他们应以身作则，对党多做出贡献。

我也要提醒大家，做部长、当议员或法定机构的成员是一种责任，并不允许当作个人寻找财富的捷径。我们更应反对贪污和争权夺利！

从六十年代年代创党直到一九七零年组成联合政府，我们当了十一年的反对党，人联一直不被摧毁，是因为有无数忠贞的党员干部的牺牲和奉献，以及广大人民的支持。

我希望大家在庆祝建党二十五周年之际，应保持六十年代精神，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坚决向一切不正的风气和不合理的现象作斗争，让正义长存。这样，人联党必定能够继续壮大。

总括来说，何谓六十年代精神？包含以下几点，那就是肯为党牺牲的党性；坚持集体领导和走群众路线；以及坚持多元种族路线。

最后，我也要促请大家注意的，那就是对于区域性观念问题，我们不否认这几年来，人联党内新人辈出，新的领袖正在出现和接班。我希望大家谨记，区域性观念只有破坏团结，分裂党的力量、基于选贤选能的原则，我们应大胆提拔有才德之士。当然，身为领袖者也有责任维护整个党的利益，从整体利益考虑问题和决策。

在目前，上述毛病在我们党内还不太严重，但是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要特别提请新一代的接班人和年轻党员同志注意，党的前途将肩负在你们身上，愿你们把党带到更光辉的道路上。

砂哈地！

（此文曾发表於一九八四年《二十五周年党庆纪念辑》）

人物介绍

传奇性人物 — 布鲁诺·曼舍

(一)

布鲁诺·曼舍(Bruno Manser)——这个世界著名的人士并不像一般西方人那样长得高头大马，也不像报上刊登的照片那样满脸须髯，凛凛威风。实际上他是中等身材，随和、风趣和健谈的人。他那三十几岁的脸上除了让风霜过早刻下明显的痕迹外，并不见须髯的踪迹。

一个北欧的牧羊人，为什么会单枪匹马来到地球东南这荒凉的一隅呢？从图书馆里，他得知了南美洲的阿马逊河流域和加里曼丹的大片森林里住着原始的民族，而加里曼丹的游牧民族是世上仅有的、没有从事任何耕耘的原始民族，于是他选择了砂拉越。

要不是有个高鼻子，在芸芸众柏南族人中，真分辨不出布鲁诺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他的发型是地地道道的“朱加”装（柏南族男人多是此发型）。经常裸着上身，只着上缠腰布，其实即使是未定居的土柏南族，像他这样年纪的人还没有看到着缠腰布的。除外，他仅拥有一套衣裤、一条内裤。他肘间、腕间套满藤圈，他没戴腕表，没有穿鞋。他的背篓里除了书籍、录音机、照相机外，同样是制作野硕莪粉的工具，如刀、斧、藤席之类。最初来到时，柏南人是有特殊照顾他的，可是被他拒绝了。他不但没有抽烟，甚至连嗜酒的习惯都改掉，柏南人吃糊糊、薰肉，他照样吃糊糊、薰肉，柏南人吃野果，他照吃不误。与土柏南族相处的日子里，他不但与文明隔绝，甚至与他们一样数个月粒盐未尝。在同命运、共患难的日子里，他已深植在柏南人的心田中了。

数年的林中生涯确是个不小的考验，衣食住行是那么原始简陋，原始甚至挨饿，加上政府兵经常搜捕他，可谓艰、险均俱了。

布鲁诺可谓是个坚强、勇敢的人。他曾在这陌生国度的茫茫林海里整一个星期独自一人找不到族人，也找不到吃的。而远在他的祖国时就曾绝食二十一天（原因不详）。他只身孤影攀上姆禄山和巴都拉威山，这两座山峰可谓一高一险，又都耸立于渺无人烟的林海中。他在这热带雨林里用手活抓过一百多条蛇（其中不少是毒蛇），有时甚至是一手抓蛇，一手为它的“美姿”作速写。他先后被蛇咬过五次，最后一次最为严重，给毒蛇咬过的地方两个多月了，伤口恶化、腐烂，有两寸多长，两寸多深，疼痛难忍，脚不能着地，身体因此瘦削下去，然而他还是坚持拒用止痛剂，依然拄着双拐，一步一咬牙，上山下河寻觅果子、狩猎。

最为艰险，最能体现他的勇敢精神的莫过于两次“遇兵”事件。第一次，当警察以查他的过期护照为藉口将他带走。当车行至半途，他向长官要求去小解，可一离开车，没戴手铐的他瞄了一眼那长官的大肚子，认定对方不是对手，就没命的向陡直的山坡冲下去，直冲到山脚边的林梦河。停住脚步回头发现没有人追下来，他就小心地循着河石过对岸，然后又折回来，再往大路爬回去，就在先前停车点不远处越过马路，跃进丛林。这时他疲惫已极，可身上只着一条长裤，连件上衣都没有，幸好口袋里还有一把多用途的小刀子。在往后的三天里，他就靠这把小刀切一点棕榈树芯生吃。当他出现在另一个寨子里时，不但，满脸倦容，而且满身都是荆棘划出来的伤痕。

第二次，正当布鲁诺背着满篓的“家产”，手提喷筒在河边蹀躞时，他发现一艘长舟，正疑惑间，猛然看到了一群荷枪实弹的大兵就在近处。走是来不及了，他只得就地蹲下，可周围光秃秃的没什么遮掩。一个东张西望的兵走过来，只差那么两三步远了，大概是第六灵感告诉他脚前不对劲，垂低眼皮瞧了瞧，不看犹可，一看之下灵魂可出了窍，怎么竟是一个人？！而且还是……难道是从地底钻出来的？！他下意识地倒退几步，大声惊呼：“阿-布鲁诺！”其余的兵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懵了，一时愣在那儿，说时迟，那时快，布鲁诺毫不犹豫地利用大兵的“心慈手软”的机会，箭一般地射了出去，沿着河岸狂奔。

身后传来了刺耳的枪声和慌张的拉挂尾车声。布鲁诺只好忍痛把沉重的背篓甩掉（编好的柏南字典和许多文件就在里面），奋力向对岸游过去。所幸挂尾车一直没有拉响，所以他还能从容地向林海深处遁去。这顿虎口逃生甯提消耗掉多少体力和精力了。可当晚他照样倔强地与群众会面、商量事宜，直至深夜。

布鲁诺——他不但领导柏南族为保卫森林而斗争，而且在收集有关柏南族的资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他踏遍各个柏南区，包括定居和未定居的，对于柏南族的部落，长屋分布状况及人口数目、生活习俗等一切，一点一滴都不放过，真是了如指掌，堪称权威。他编创了世界上第一本柏南文字典（译为德文），共五至六千个字，真可谓是柏南专家。他还充分发挥他的专长，把森林里的许多动、植物画下并加以注解，还制作了一些标本。他甚至把柏南族特殊的背猎物法和钓钩缚法都画下图解。几年的林中生涯已把他锻炼得像柏南人那样，不必靠指南针在层层叠叠的山峦林海间来去自如，而且学会了靠山吃饭的利用自然的生活技能。

其实，布鲁诺并没有上过大学，可他除了瑞士语、柏南语外，还会德、意、英、西班牙、法等国语言，就是马来亚也会些许；他的足迹遍及欧洲，真可谓是个传奇人物。

雁飞

于一九九〇年八月

（二）

— 向忠

本对着大自然事物的无限向往，和探索着大自然奥秘的浓厚兴趣，1984年布鲁诺·曼舍进入砂拉越，和柏南人生活在一起。在砂拉越柏南人口约一万多人，他们是亚洲硕果仅存的游牧民族，他们不耕种，把森林当作是他们的家，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他们依靠采摘森林里的野果、野菜和猎取动物为生。随

著森林逐渐地被砍伐，使他们濒临灭绝的边缘。为了生存，柏南人抗拒伐木活动，布鲁诺·曼舍就多次领导柏南人展开反伐木斗争。他替柏南族写抗议信给政府和伐木公司，带领他们封锁木山路和伐木营。这样，政府宣布布鲁诺为敌人，下令逮捕他。他曾两度被捕，也两度逃脱。在柏南人保护下，6年里他跟柏南人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

在深入柏南人当中，布鲁诺注意了解和记述着这一民族的一切，他难过的看到他们吃不饱，营养不足，以及疾病缠身。不过，他认为，柏南族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跟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他没有看过他们吵架过，或者大声骂人过，或者粗暴插咀加入讲话。在原始森林跟柏南人在一起，他就像躺在母亲怀抱中一样幸福。

在引导柏南人进行森林斗争的时后，布鲁诺主张不付诸暴力，也不要伤害任何人。他是个非暴力主义者，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环保积极分子。

在1990年，布鲁诺·利用假护照离开砂拉越，回到瑞士。之后，他发动了一项禁止砂拉越伐木活动与拯救柏南族的国际运动。他曾在瑞士的国会前抗议，他的抗议也起了一些作用，使得一些欧洲国家的热带硬木减少进口了。他巡回全世界演讲及出版几本有关柏南族的书籍。1992年，他出现在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重申类似的课题。

1997年，他和一位朋友计划趁共和联邦运动会在吉隆坡举行，计划乘着滑翔机，由新加坡飞入马来西亚，但在边界被发现而被遣回。过后，他们俩计划由新加坡游过24公里宽的柔佛海峡，还有经过一大片沼泽地带，他估计难度很大，便放弃计划。后来，他们俩又萌生一计，打算从印尼一个小岛乘搭一个橡皮艇潜入，但是，设在欧洲的布鲁诺·曼舍基金会接获大马大使馆的警告后，他们便放弃这一计划。

在1999年，他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顺利进入古晋。然后於3月29日，在古晋上空进行跳伞，并靠着身上背着的推

动器在空中滑翔，引起了人们的瞩目，重新唤回世人对柏南人的记忆。

后来，布鲁诺·曼舍从印尼的加里曼丹边界进入砂拉越，从此再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很多人相信他已不在人世了。

布鲁诺·曼舍一生为环保而斗争，一生为柏南族的利益而努力。他的努力，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造成了对我国政治的一些影响。砂拉越政府也成立特别工作小组，以研究柏南人的福利与发展，逐步带动他们走向文明的世界。

按语：《新海峡时报》新闻工作者 - James Ritchie 写了一本内幕故事 - “Bruno Manser” 的书，并于 1994 年出版。在这本书的第 14 章里有写到布鲁诺·曼舍跟东北突击队的事。我们发现其中有些出入，在此给予澄清。

在其中一段该作者写到：“1985 年 3 月，刘华荣跟两位同志在姆禄 (Mulu) 跟 Manser 会晤。在半小时的会谈中，他们谈到土著人民的斗争。Manser 兴趣要了解为什么 CTS (即共产恐怖份子) 会得到土著的支持以及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在谈到巴南森林归属课题时，双方出现了意见分歧。Manser 认为森林应归属于柏南人 (Penan)，相反的，刘认为森林应归属于人民 - 砂罗越的每一个人。会谈就这样悻然结束。”

根据当年东北突击队负责人之一的俞诗东说，跟 Manser 会面的是他，而不是刘华荣；他不是带 2 位去，而是带了 5 位 (即梁娇芳、武波、兰青、一位普南同志和 Ah Hing - 一位柏南同志)；会面地点不是在 Mulu，而是在林梦河的河尾；会面时间也不是在 1985 年 3 月，而是在 1989 年 12 月；他们会谈并不是只有半小时，而是跟 Manser 一起生活了一星期。当时 Manser 在第四省与第五省边界一带发动柏南人开展反伐木的斗争。他们会面肯定交换了双方关心的“土著斗争”的意见，但没有像作者所说的什么“森林归属”的分歧。

他们的会晤与会谈，有时通过翻译，有时梁娇芳用英语跟他直接谈。梁写的《森林之子》(参看《林中猎奇》)，主要还是从 Manser 那儿听的，还有上述 (一) 一篇，是梁见过 Manser 后写的。致於生活起 7 天还谈了些什么，就要请问有参加会面的 7 位同志了。



摄于 1989 年 12 月於林梦河河尾。

左 Ah Hing（柏南同志）中俞诗东，右 Joe（普南同志）



布鲁诺·曼舍摄于柏南人的小棚

献身於交通战线的东兵同志

— 根据东兵前战友口述，求实整理

东兵烈士（余清寿）出生於诗巫下游二十四甲坡一个农民家里。后来在中华小学、公教中学受教育。早在小学时期就参加学习小组，中学时代就积极参与当时学生运动，成为中坚骨干。1968年8月，刚缴了要参加高三会考费用的他，为了响应上边区的号召，毅然离开身患重残疾的父亲和最疼他的母亲，下乡来到拉让江中游乌鲁达地区的红旗山。他和洪楚廷、Ubong 及兄长求实等四十位“新兵”在叶子华（江先芳烈士）和杨会强（温贤定）的带领下，爬山涉水走了二十多天，於九月初到达马罗河“老新点”的人民军总部



东兵烈士是在1970年10月间牺牲的。他在1968年8月参军（时年十八岁），9月到边区，10月离开第三支队马罗河基地，跟随田主任（黄纪作）去中部后，就一直在“10.26突击队”参加交通工作。

从人民军总部潜伏点的 Bugau 地区，到第二省的 Lubok Antu 下游的 Ng. Sam 交通线，已跑了整两年，印尼境内交通线是交通人员自己走出来的的，砂国内是沿老路走。那时国内交通工作转由亚里（李运河，前些年已病逝）负责，共七、八人。东兵负责政治工作、队员有李方雄、范梅芝（小圆）、余玉辉等。

在东兵他们发生事情出发之前，领导上已有召集他们开会，叫他们开新路，不可再跑老路。可是，这次回来路途中，就在快要进入大森林边之前经过 Sungai Antu 的长屋地区，在天亮前要经过长屋外面的一段路，因刚下了雨，地上踏了许多痕迹。

当时驻扎在那里的印尼“红帽兵”在天亮后，看到有痕迹，就问长屋的人，昨晚有没有人出来跑动，长屋的人说没有。於是就宣布戒严，并开始跟踪。

东兵他们一直冒雨走到天亮八点多，加上余玉辉脚痛，就随地在一个地形不好的“子青芭”山边近水沟处扎营煮饭。因为大家跑了一整个晚上，太疲倦了，吃了饭，大多数同志还是在休息。东兵是站岗回来，还在擦枪，整支枪还拆得散散的。大约上午十一时“红帽兵”跟踪来了，听到树枝被踏断的声音，正在站岗的李方雄说：“是山猪”。小圆听到声音就起身，第一声枪响就牺牲了，李方雄身中六枪还侥幸脱身，东兵却不幸和小圆（范梅芝）一起牺牲了。

东兵烈士是一个乐观、勇敢的战士，他思想积极，很吃苦，没有畏惧战斗的锻炼和危险，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战士。有一次，一队同志在买稻米的最后一趟回程中遇到印兵埋伏。总部决定及时还击。东兵自动报名参加回击埋伏。八个战士在印兵必经的路上埋伏了三天都不见踪影，第三晚已没有粮食了，战斗组组长就叫 5 位同志先回，他自己和东兵及刘邦官三个继续摸索前进到长屋与冲凉河边的中间树胶芭地带就地埋伏。天未亮，一个伊班妇女就下来要到河边洗濯，因狗儿嗅到我们的味道而唔唔叫，伊班妇女以为遇到什么异物，不敢再走，赶忙回去。过不多时，天蒙亮，一个印尼兵，穿着短裤，带着一支苏式 AK 半自动步枪来到我们埋伏点面前。指挥员一声喊打，东兵和刘邦官（官东海）马上开枪把这个印尼兵打倒了。这个印尼兵倒下前还击了一枪，但因枪卡壳而打不出。回到营地将这把缴获的枪清洗检查时，发现是因为久无擦枪，枪管生锈，以致卡壳。

东兵烈士在 1969 年曾数次从第二省边界受人民军总部委派为交通员，来马罗河尾的人民军第三支队指挥部进行联络工作的交通员。

东兵烈士也曾受总部委派从边区进鲁勃安都、英吉利里，并三、四次化装成为非武装身份，来到第三省进行联络工作。第一次是在 1970 年二、三月春节期间，到泗里街再坐快艇

上来到宋溪美禄，洪明的家里，通过群众联络上四分区领导同志。东兵带去了人民军总部的文件和指示，也带回了四分区战友们所准备好的各种药品、帆布等军用物资。那时，每隔一个多月，他就会来往一趟交通，是边区总部与三省国内交通联络保持较频密讯息往来的时期。东兵同志最后一次去到船溪美禄联络，大约在1970年8月初（即四分区74天戒严前）。当时曾带一位来自英吉利的年青小伙子李汉辉同志，在东兵牺牲后，他也受边区总部委派，独自从Engkilili去诗巫宋溪美禄或哥乐多联络了几次，一直到1971年9月他在Engkilili被捕。在1973年，范子香牺牲前也曾派另一个姓余的Engkilili青年来三省联络协助携带物质及做掩护工作。那时的三几次联络，船溪美禄地区领导都是特派新毅同志负责掩护和护送工作。

随后当局在船溪美禄地区施行持续长期的戒严时。于同年9月和10月间领导派李玉和同志（木桂兰民运组同志），前后三次机警的从罗马安出发，前往第二省英吉利与人民军总部联络。根据李玉和的回忆口述，第二次带了二位新兵（黄互福烈士和徐道文同志）到第二省边界参军。第三次约在10月底，领导上派钢铁同志与他一同前往。这也是最后一次由四军分区出发前往二省边区与人民军总部的联络工作。

东兵同志和钢铁同志是同坡邻居，自小认识。他们十分高兴能有机会在二省边区会面言欢。可是，就在这次联络后不久，东兵同志就不幸牺牲。

人民的好子弟，东兵同志为了祖国献出了他那年轻的仅二十个春秋的宝贵生命，历史将记着他的英名。

（注）：由李玉和同志在1970年9月间送去二省边界参军的二位同志，在较后的一次边界战斗中，黄互富同志不幸的牺牲，徐道文同志受伤被印尼军俘虏。徐道文同志在印方长期监禁虐待下精神崩溃，释放回家时，已是精神恍惚，长期医治无效，不幸于前年在诗巫市区行走时被车撞死。

献身北加革命事业的民族英雄

～ 悼念印尼边界塞奴都甘榜头 Uh 烈士～

— 许贵仁

Uh, 这一简单的称号, 隐寓着边区苦难人民的志向, 闪耀着民族的光辉。

Senutu, 这座多灾多难的印尼边界民族长屋, 曾经为了北加革命, 大力支援和协助北加革命者, 得以驰骋在辽阔偏野的山林, 走遍士加央河的四方八面, 为整个地区的村民, 埋头苦干; 为北加的民族解放事业冲锋陷阵。她 - 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的重要据点; 她 - 就是 Uh 的家乡。

一九六三年, 一批北加革命者, 为了祖国的独立解放, 长途跋涉, 奔赴边疆, 走遍士加央河(Sekayam)两岸, 奔腾在巴拔山、双公山地带, 与民族兄弟缔结了深厚的情谊, 汇成一股坚强的力量, 坚持长时期的、不妥协的战斗。

Senutu (塞奴都) 甘榜, 原属“双公”区范围 (“双公”区计有七个甘榜), 位于 G. Nigut 东面山脚下。那里有三十一户人家。Uh, 就是这个甘榜的甘榜头。他体型魁梧高大, 肌肤白皙, 双目光亮, 一口整齐成锥形的牙齿, 在乌黑卷发的衬托下, 展现出“双公大汉”的英雄气魄。

这位充满活力, 殷勤喜客, 热情忠厚, 认真职守的中年甘榜头, 在一九六四年初才开始接触北加革命者。

第一次见面, 他就热情相待, 虚心听取意见; 也勇于提问或说明自己的讲解, 似有一见如故之慨, 大家越谈就越感亲切、融和、投合。针对边区人民的生活实际、健康状况、风俗习惯、货物交换以及各个甘榜的关系……等等问题, 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北加革命者也略谈了到边区的目的, 建立人民武装工作以及我们的奋斗目标。特别详谈工作者与甘榜人民的鱼水关系, 强调联合起来的巨大作用。

经过多次交谈，掌握了甘榜的情况，进而想尽办法为群众解决一系列的实际困难。诸如，按甘榜群众的需要办来货物，以实价计算，处理“物物交换”；带动群众种菜，种杂粮（豆类等等）、烹饪、卫生和治疗疾病等等。

讲道理、再实践。Uh 受到很大的影响，认识有了提高，对甘榜的落后状况，对奸商的剥削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打从心底里，他确认北加革命者是好人、爱甘榜人、肯帮人、又有办法。于是他号召甘榜人坚决和北加革命者站在一起，并给予支持和帮助。

Uh，很快就成为开展民族工作的好帮手。

若要召开甘榜长老会议，全甘榜群众会议或其他的集会，只要通知他一声，他即能准时集合有关的人，有秩序地等着开会。他在自己甘榜内，主动动员甘榜群众尽力送米粮、猎物等支持我们；特别是一九六四年种稻季节，他动员群众为我们特别开辟一块面积相等於甘榜每户所拥有的田地，并规定从劈芭直至收割全由甘榜群众负责。到收割时，北加工作者“拥有”的此一芭田共收获统计一万三千筒谷子，（算是丰收年，一筒容量为二十牛奶罐等量），还安排分别藏在甘榜群众之货仓。

甘榜计划创办一些供学语言、认简字，也兼谈实际问题的“学堂”。Uh 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带动群众劈场地、制阿答、砍竹、找藤……，大家心连心、齐动手，苦拼一周，一所纯“藤、竹”料盖成的“学堂”就矗立在甘榜右旁的山岗上。从此，增添了甘榜的新气象—孩子们兴高采烈，唱起歌、跳起舞，青年以上的成年人更不含糊地学了马来语（可通印尼语）、客家话，学写简单的字，也学阿拉伯拼音简法。

Uh 不仅热情积极、亲善待人；更可贵的是他勇敢、坚决、敢于牺牲自己；同时头脑敏捷、处事灵活、肯吃苦、有办法、理解能力和应变性强，实是一位难得的革命群众。为了开辟“双公”区的工作，张同志找他商议，争取意见，也要求他带领工作者到“双公”去工作。他毫不迟疑地满口答应，而且

在出发之前，就主动找了工作者，介绍“双公”的情况，各甘榜主要人物的性格、关系等等。看！他不但无愧是一个民族工作者，尚具有领导人的风度。就这样，工作者一到“双公”区，就有栖身之处，工作也从此开展开来。

一九六五年底，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正式建立，Uh 参加了成立仪式。他看到全副武装整齐的队伍，绿色军服，佩上武器，神气昂扬，肃静竖立、聆听政委的报告。此情此景，给他极大的鼓舞，增强了他支持北加革命的决心。几天后，他与甘榜中的五个青年，到营地找张政委。他情绪激昂地表示决心要参军。政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但，向他们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暂时不宜全职入伍，随部队活动。要求他们以部队成员资格承担甘榜的群众工作，掌握敌情，随时与部队联络。Uh，深明情理，乐意接受。此后，部队允准 Uh 及 Bangan（Uh 的外甥）二人可知部队的营地，随时可到营地。“信任群众”也是对群众最有力的鞭策和激励。二人自豪地、积极地履行不应负的职责。

一九六六年中，第二支队 B 处人员，在抢收农作物时，遭敌人袭击。事后，Uh 即主动去了解情况，并毫无惧怕地长途跋涉赶到部队营地向政委报告。他清晰地说明：“那是一股即将被派往 塞奴都 驻扎的印尼兵，是驻军的先头部队，约五十人，他们从 Makau 出发，执行侦察任务。据知大军团近日就会驻入色奴都。请格外小心，暂时不宜到甘榜去！”由此可知他是一位观察细致，警戒性强的好骨干。

印军驻入塞奴都不久，就发生了二个妇女被强（轮）奸事件，恶魔是一小队印尼巡逻兵。甘榜群众受尽凌辱，无比气愤；特别是 Uh 更感愧对于民，羞愤填膺，决心为甘榜百姓讨回公道。此念挂心，他和外甥商议后，趁深夜敌军不备，潜逃急行赶往部队营地，找政委报告此事，并献意提出决心消灭这一小队巡逻敌军的计策。政委听后，一面赞赏他敌我分明、大义勇敢的爱民壮举，一面担心处事不当，泄漏机密，危害甘榜群众的安危。故建议由 Uh 等引敌军到指定地点，由部队战士一举消灭之；若此事不能实现，才由 Uh 选择好甘榜人去实行这一计

策。议决停当，分头部署，依计行事。

狡猾的敌军，有人领路，不走偏野，专择群众多的地方活动。部队埋伏不果，只好回撤。半个月后，Uh兴致勃勃地到营地报告，“大仇已报，十三个恶魔已在‘Batek’瀑布深潭长眠不起。只可惜，经验不足，性急乱了手脚，武器也一并被抛入潭中。”原来他们以“美女灌酒”计收拾了敌军（在旧的Palaman处）。政委听完报告，虽感得不到武器是件憾事，但仍然欢快地赞扬Uh等的勇敢果断、谋略周全。

一九六七年中，Uh了解到一股约三十多名的敌军，准备从芒高调往波(Pol)驻扎，其步行的“山路”必经一处弯曲的大山沟，两边高山环绕，而且河弯两端均有一道长二十多尺的“独竹桥”，是一个理想的伏击点。他立刻赶到营地作报告。

部队也立即派出侦察组赶往该处作实地调查，摸清地形，随后依时调动人力，出发去埋伏。眼见时辰已迫近，一块肥肉几可举手得来，岂料偏偏在此时一位战士的枪“蓬”地一声巨响，枪走火了。惟恐遭到敌人“反包围”之被动局面，政委只好痛下撤军之令。过后，Uh，再行了解，证实敌军当时已逼近，听到枪声，立即拐弯打远途而走，并企图增多兵力去“包围”伏击点。Uh的细心、及时、准确掌握敌情，实给部队巨大的帮助。

敌军在搜索寻找十三人小队失踪无果，又发现我军的伏击点后，更加疯狂地四处活动，纠结强大兵力，妄图一举把我军吞掉。显然，二支队的局面益形凶险。

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余白日和沙克在执行任务途中，路经恩加笃，遭敌袭击，当场牺牲；沙克被接应回营，治疗中因破伤风而逝。Uh得此消息，也不顾自身安危，前往探望。并在政委的安排下，通过甘榜群众，搞来木板，制成棺木，安葬二位烈士。

同年六、七月间，艳阳高照，入夜一轮浩洁明月在晴空云朵中轻盈穿梭。寂静荒凉的山林间，一座荫蔽营房深居山岗

上。时过二更，突闻营前在低浅沟处，似有步行溅水之声。营内指战员迅猛跃入战壕，做好戒备。约莫过了十分钟，就清晰地听到“De Kiti”的达雅语说话声；又闻击掌讯号声，……。说时迟那时快，一声“Comandan”称呼，后 Uh 和 Bangan 已趋向营前。政委忙从营前岗哨的壕沟里站了起来，就嗅到一股焦臭难闻的气味，再趋前迎向二人。虽处深夜，但，月光透过林中密叶的隙缝下，仍可见到二人疲惫不堪，额头、双臂、膝盖均有烧焦的伤痕。政委忙把二人引入营内，一边安排治伤、进食，一边了解事故的经过。

原来，敌军四处搜索，仍找不到我军的踪迹，遂把二人强捕捆绑到“波”甘榜。

在那里，敌军把二人绑紧高吊在木架上，脚不着地，敌军拳打脚踢，用着火的木往他们身上烧，强迫他们供出二支队的营址。但，忠贞不屈，与部队生死与共的好战友 - Uh 和 Bangan，始终站稳立场，只字不泄，守口如瓶，强忍肉体的疼痛。在第二天深夜，趁敌不备，脱绑而逃，经过三天的痛、饥、寒的折磨，才到达部队的营地。

经过治疗、调养，康复后，他们又想回甘榜去工作。只是此一次政委坚决反对，只允许他们荫蔽在甘榜群众活动范围的四周，伺机联络甘榜人，并通过群众了解敌人的情况。

局势越来越紧，困难与危险益形严重，二支队正面临一场生死搏斗的严峻考验。政委召集了二支指挥部全体会议，深入研究局势，寻求制订可行的策略，克服困难，坚持斗争。

会后，B 处领导决定先转移营地，留一部分有战斗力的成员由张政委带领，寻机在敌之活动区伏击敌之小股巡逻兵。其他较弱的人由副政委小杨率领做长途转移兼建营地。A 处成员转返原处活动。就在此时，Uh，匆忙赶来，告知敌已集结了数千兵力在“波”，估计必有所行动。

次日凌晨，小杨一部先行撤走，战斗队则准备午后撤向相反方向的士加央一带掌握情况准备打埋伏。不料早上近九时，敌军即从正面、左、右三面开火强攻，自动步枪、机关枪、迫击炮齐发。一时枪林弹雨，地震山摇。我军三十个指战员，精神抖擞，稳占战壕，迎接战斗。Uh 紧跟张政委。半小时后，在辨清敌之方向后，我军从营后山谷突围，撤往南面山峰，便停下隔山观战情。临走前政委托 Uh 点燃营边备好的“生竹堆”（烈火可发巨响）。下午二时，敌军才冲入营地，又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期间还夹有地雷爆炸声。地雷开花了，这是献敌之厚礼。Uh，回去后了解到敌军死了二十六人，伤多人，我军毫无损伤，一弹未发，只献出六个地雷和一堆生竹筒。

敌情十分紧，情况越来越复杂，危险性也越来越大。A 处的 xxx 回去后就带了几个贴身离队，二支的 A 处、总部、三支的战友也无法给予我们支援，……。真是乌云密布，在这非常时刻，一迟疑，可能即遭损失；一失误则必遭灭亡！战场上的指挥员，是昂首向前，还是缩头乌龟紧藏不露？二支队的领导，二支队的指战员，二支队的民族工作骨干 Uh 等都没有屈服。

为着部队的生存，为着西部人民武装得以有效执行战斗使命，1969 年初，二支决定派出副政委杨贤华（小杨）同志带领几个战士打回国内，找领导人联系，解决西部问题。不幸在布置工作过程中，杨同志牺牲了，张同志也受了伤不能走动。

多事之秋，不幸接踵而来。正当张政委负伤，又疼惜副政委的牺牲而追思的当儿，Bangan 克服重重困难到营地找张同志，一见面，他便嚎啕大哭，告知甘榜头 Uh 已被敌军射杀，全身弹孔，惨不忍睹。张同志一听，哀伤悲愤！过后他决心打回老家去，跟国内同志与群众战斗在一起。

Uh，坚决勇敢，无私奉献，埋头苦干；在艰险时刻，不怕苦，不怕死，坚持工作，完成任务；在危险关口，他坚贞不屈，忍辱受刑，勇敢果断地摆脱敌人，并直接回到心中惦记的

部队中继续战斗；险境当前，仍不顾自身的安危，以至中弹牺牲。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北加的革命事业！

Uh，是士加央河竖起的一面民族光辉的旗帜；Uh，不愧是一位献身北加革命的民族英雄！

安息吧！尊敬的战友，甘榜头，Uh 烈士！

许贵仁

07-04-2002 於古晋

编后话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朋友们的积极来稿、各编委认真提意见，以及逐句逐字认真推敲修改之后，第四辑《友谊丛书》总算付梓出版，又与各位朋友见面了！

尤为高兴的，此辑有几篇文章是由第一省朋友写的。这样，可以使《丛书》更能反映地区多层次当时不同阶段的历史事实，使她加辉生色。

另外，本书所叙述之每个历史事件始末、人物、地点及时间是个别朋友或几个朋友共同凭记忆口述或写下的，其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立场、观点，不一定代表《友谊丛书》编委会的立场、观点。本编委会为了反映当时历史的客观性，都尽可能予以刊出，以供大家参考。

回忆的骏马把我们带回了当年风风雨雨的年代，也难免带来了一些历史事件的争议。我们应本着“向历史负责、共同向前看”的态度，和在“只有历史错误，而没有错误历史”的原则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共同解决历史问题，让历史重现在人们面前，留传后代子孙。

既然我们已开辟《友谊丛书》这块大家共有的园地，让我们大家齐心协力辛勤耕耘，让历史之花和友谊之花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永远芬芳！

编委会

2002年12月3日

友谊丛书

1. 往事
2. 林中猎奇
3. 悠悠岁月话当年
4. 风雨年代

《友谊丛书》之四
《风雨年代》

出版：诗巫友谊协会
No. 31, Lanang Road,
96000 Sibul,
Sarawak, Malaysia.

印刷：诗巫联成印务公司

初版：2002年12月21日

定价：RM16.00

国际书号：ISBN983-40483-3-5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ISBN 983-40483-3-5



9 789834 048334